



SAIAS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 闻道

2012年第3期

总第7期



- ◎学人访谈 于向东老师访谈录
-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是“例外”的吗？
- ◎学术随笔 “孔门高弟”专题
- ◎天下 奥运这一年，世界看英国

靡不有初，维志有终。

冯绍雷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与“闻道”学子共勉

林礼云

2011年3月10日

# 闻道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2012年9月



S A I A S

主 编： 吴逢勇

副主编： 叶小娇 李 洋 孟维瞻 曾乔圆  
崔 攀

编 辑： 陈安龙 武亚宁 许子兰 章航翔  
周生升 朱承璋 朱永福

设 计： 章航翔 崔 攀 叶小娇 朱承璋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  
理科大楼A座410室

邮 编： 200062

邮 箱： ggwendao@gmail.com

网 址： <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 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 ■ 卷首语

# 致国关院新生

曾乔圆

眨眼间，酷热暑期的尾声已停奏，新学年的帷幕悄然拉开。华东师大国关院舞台上，新的主角——2012 级的学弟学妹们即将闪亮登场，而二年级的我们将退居幕后，抑或成为台下一名普通的观众。

人们说，经历是久酿陈香的美酒，沉淀过后才能品出芬芳；思想是岁月磨砂的珍品，不断传承才会熠熠生辉。面对新来的你们，已算“老生”的我们，只能拿出一年以来在国关院的种种经历和切身体会，虽略显单薄，但无意于炫耀或教导，仅是一份责任和期许——新人们能够了解这段与你们息息相关的历史。从中也许你们有所体会或收获，我们会关注而不苛求。

作为国关院正式“教改”的第一批学生，我们深感幸运。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啃读一本本厚重的西方思想经典译著，课堂里聆听一名又一名老师的理论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国际法、世界经济，复性读书会我们思索讨论孔孟圣贤之道，爆米花沙龙我们畅聊天南海北……只觉一幕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图景在眼前呈现，犹如穿越过千年时光隧道，倏忽降临在政治起源的那个世界。

作为《闻道》编辑部的接班人，我们是幸运的。从 2010 级学长们手中——是他们披荆斩棘创立了国关院第一份学生刊物——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我们夙夜诚惧，唯恐这个脆弱的新生儿得不到悉心呵护……新一届编辑部成立后，我们既承继了创刊时的理念、风格，又同心协力、集思广益对之进行了局部调整和再设计，于是有了此刻放在你们手中的《闻道》。我们期待，经过一届又一届“闻道人”的传承，《闻道》能探索出更理想和成熟的模式，更能担当起其作为院刊的使命——传承我院的学术研究传统，助力学生学术研究，展现国关院师生风采！

真诚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者加入《闻道》队伍中，并且相信，新人的加入定能为编辑部注入新鲜血液、强劲活力，使之如阳光微雨下之新苗，茁壮成长！





道不遠人，遠人  
非道也。

姜浩 二〇二二年五月







## 卷首语

致国关院新生/曾乔圆

## 学人访谈

于向东老师访谈录 1

##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是“例外”的吗？——基于对古代中国与陆地邻国战争规律的分析/孟维瞻 15

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非基建合作——治理视角的分析/祝鸣 37

## 国际法专题研究

探析袁世凯的国际法观/许子兰 52

海洋法历史与实践中的大陆架权利制度与中日东海划界问题/李洋 60

## 学术随笔

“孔门高弟”专题/叶小娇等 75

“美国建国思想”专题/杨紫翔等 82

## 天下

奥运这一年，世界看英国 90

## 话语·幽默 100

## 流年

夏日香气/崔攀 102

子尤/尹汝涛 105

## 专栏

信，或不信，皆在你自己——《It's a Wonderful Life》影评/许子兰 107

两性视角下的巴达维亚/高笑红 110

读《光与影》之随想/曾乔圆 114

## 国关要闻

### 院系来音

第二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专题报道 117

2012年第三届两岸青年学术交流论坛纪实 124

院外播报 130





## 于向东老师访谈录

## 学人小传

于向东老师：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大国际院理事，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副院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对中共党史、非洲问题、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有深入研究，学术观点主要见于《两个局外人的对话录》、《中国将是现代化传统范式的终结者》、《中国外交的形式主义与神秘主义》等。



在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如何在国体上容纳西藏新疆这样的边境地带，对中国的政治来讲，肯定是个考验。

《闻道》：于老师，您刚从西藏回来吧，那先讲讲您在西藏的一些事情吧。

于：我们去的是中印边境一些地方。中国有一个县叫墨脱县，过去讲一直没有通公路，我们这次去就是看看这个县。

《闻道》：您之前在新疆工作过，那新疆对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于：它是我的家乡，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就相当于陕西、江西对你们一样的，对我来讲就是家乡。它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超过一个家乡的印象，（我）在那里出生、工作。

《闻道》：记得朱小平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讲过，现在我们还是一个中华帝国，有着西藏、新疆这样一些地区。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于：朱老师是从一个可能存在的情况来看，这没错。它在实质上应该是一个帝国体制，但我们没有实施一个帝国体制，我们实施的是共和体制。在

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如何在国体上容纳西藏新疆这样的边境地带，对中国的政治来讲，肯定是个考验。只是这个问题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前沿问题，只是部分学者在思考。但中国现在在边境问题上会出现很多挑战，这些挑战都跟我们刚刚讨论的国体形态有关系。中国的共和政体是否适合边境地带的管理和统治？这是一个疑问。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先例表明，在共和体制下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区域的统治是可能的。在中国是否就不行，这个还不能下结论。朱老师比较倾向于认为，现在的共和体制不一定适应现在的大版图国家的管理。但，是不是能够探索出一些新的政体，我现在还没有看出来。这肯定是个问题，这是个真问题。

**《闻道》：**那中国现在这个政体算不算一个很严格的共和体制？

**于：**中国肯定不是一个严格的共和政体。从规范上、从宪法等各个角度来讲，它是（共和政体）。中国的政治是双层的，一个出于宪法书面文字上的共和政体与实质上运行着的中国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实际运行的政治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排他性直接管理的政治，这个与共和政体没什么关系。

**《闻道》：**那宪法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对实际运行的政体有何种影响或者有何规范作用？

**于：**目前为止这种规范作用还是不够的，应该讲前者对后者的规范作用比较弱，相反地，后者对前者的扭曲作用可能更大一些。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今天的中国，那么今天中国的性质是未来定义，只能在未来加以确定，不是它的历史能够定义的；作为历史的中国已经消失不存在了。*

**《闻道》：**现在中国有一种重述国史的运动，尤其是近代史已经让大家认识到这样一种运动，古代史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下很多的努力。这使得我们对“中国”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那在您眼中什么是中国？是什么使得中国成其为中国？

**于：**这个（我）也说不上来，不好说。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今天的中国，那么今天中国的性质是未来定义，只能在未来加以确定，不是它的历史能够定义的；作为历史的中国已经消失不存在了。现代思想界读历史是倒过来



的，他们想（通过）重新叙述中国的历史来确定今天的中国，在我看来，这不会有成果。尽管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尽管绝大多数的民族在确定它当下位置的时候，都通过重述它的民族智慧来叙述它今天的状态，大部分民族都是如此。但对于中国来讲，不成立，历史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读历史有两种作用，一种是仅仅了解它的过去，一种是为了把今天的中国说清楚，第一个目的在我看来更成立。如果要掌握当下的中国，我的办法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去看看中国可能的状态，尽管它是不确定的，但我可以发现它可能的状态。

**《闻道》：**现正逢奥运会，很多人在评论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人民日报有社论说“中国的金牌是由举国体制支撑起来的”，所以有必要加强举国体制，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于：**举国体制本身并不是错，但它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一部分项目像中石油、中石化一样是国家垄断的。如果垄断被打破了，有一些项目适合举国体制就实行举国体制，不适合举国体制就不要用举国体制的方法。比如羽毛球完全可以不用举国体制，全运会谁得了冠军，那个省就代表国家队去打，不是很简单就解决了吗？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省最好的运动员放在一起，这种情况就有问题。体育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事。

*革命党都不是精英，而是问题青年，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闻道》：**最近想读中共党史，在念张国焘《我的回忆》。我读的时候感觉自己很迷茫，找不到读的方向。您当初读党史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说您觉得应该怎么读稍微好一点的书。

**于：**现代史有个特点，史料很多，也没有公认权威、系统的（论著），这也不可能。张国焘的回忆录肯定是非常好的一本早期的史料性著作。当然他老了，记忆力都是靠不住的，而且都是选择性记忆，所以回忆录里有一半内容靠不住，但是张国焘这本书仍然是一本很好的书。因为张国焘当时是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而毛泽东又不作这些回忆，其他几个人都不在世了，他讲的事情相对来讲可能靠得住。史料还是杨奎松做得好一些吧，算是国内学术界做得最好的。他的著作虽然不多，能仔细读完也就可以了。

**《闻道》：**在读张国焘的时候，感觉当年那帮青年热血沸腾，也有宏伟的

梦想。但在后来革命过程中发生了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杀人、肃反、党内斗争，都很难想象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一个人在权力机制下，他就扭曲了？政治的环境使人变残忍了？

于：没有扭曲，这是人的正常状态，每个人都有阴暗之处。如果处在阴暗的历史场景里面，你可能变得自己都不知道的残暴。我们所有善良的老革命们，都曾经残暴过，都很正常。就像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学生去打人一样，十六七岁可以把老师打死，他就处在那种场景中，人就发生了变化。这是种群体性心理状态，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什么神秘。

《闻道》：那么个人就不能做到不随外面环境而改变自己吗？

于：极少数人能，所以他就自我边缘化了。我们早期党内有这样的人，很快就不愿意这样子的。大汉奸陈公博就是一例，他参加了第一次会就不再参加了，他说这样的党他不想参加，他要过我自己的日子，就走了；周佛海也一样，他更愿意过中产阶级的、小资的生活。汪伪政权有很多高官出身中共。

《闻道》：很多应该是个人原因吧？比如个人性格、思想。

于：这是一个道路的选择过程，他选择的时候他并不认为他选择了做汉奸，他可能认为他确实在救国。

《闻道》：共产党在早期是如何调动到那么多精英在里面？

于：早期他们没有调动那么多精英啊，早期他们是一批问题青年，他们在中共早期根本算不上精英。他们大概是社会的弃儿，都是边缘人。他们之所以愿意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有固定的财政来源的党政组织。中国以前没有这样子的（党政组织），中国以前的政党都是跟某个政党某个大财主有关。中共有固定的财政来源——共产国际，大家过集体生活。当时生活问题可以解决，同时又可以过集体的、相互依赖的生活，这个对社会边缘的青年来讲是莫大的吸引力。他们不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都是大有问题的青年，只有张国焘称得上在各方面都是精英，但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具备巨大的个人能量、敢于冒险、敢于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舍不得放弃的东西。

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也有大量的问题青年，只是我们不再有一个那样的机构把他们吸引过来。还有一部分问题青年，像你们一样到了大学，慢慢地被平复掉了，把问题慢慢地平庸化了。我们刚刚去了西藏，碰到骑了两



个月自行车去青藏游荡的青年，也是大学生啊。他们就是自我放逐，这些人都具备巨大的能量，尽管他们的学校、专业不怎么样。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很难为这些人提供释放的空间，如果他们要是在二十年代，那他们会很幸运，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

《闻道》：那是不是这些青年后来把自己的问题带入了他们所铸造的体制当中了？

于：对啊，他们放弃了自我，用革命代替了自己的人性，所以才变得彻彻底底与革命化身，才会非常得坚定、勇敢，对他们来讲革命就是他们的生命。因为如果不革命，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连垃圾都不是。那时的精英是去国民党，去北洋政府，精英不会去搞革命。革命党都不是精英，而是问题青年，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闻道》：那您说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未来的可能空间在哪呢？刚才讲到一些边缘青年，或不正常青年，他们现在发挥（能量）的空间在哪里？按照您这么说，好像挺悲观的。

于：没什么悲观的，你们现在很好啊。你们规划自己的职业，努力做一个很好的职业者，这就很好了。至于说你们会不会遇到其他的机会？你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遇到，遇到了你们也不会做出反应，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做出反应。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职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职业化社会。我们刚才说的时代只对极个别的人是个幸运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那是悲惨的时代；而一个职业化的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个适宜的时代，实际上你们很幸运。

*谈话是个很好的（表现）方式，你可以看到它思考的过程，有手工制作的痕迹在里面，至少可以证明它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闻道》：您那篇《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很多人都看过，您当时出版这个著作的时候有怎样的背景？您当时怎么会想到用对谈的方式来表达观点呢？

于：那是关于中国政治史思考的一个结果，它用对谈的方式来表达比较方便。第一，因为我们确实是个对谈，跟一个朋友，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有人替我们做笔录，也有人来听。第二呢，因为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在中国属

于敏感课题，它以正式的论文方式事实上也不可能被发表。而以对话的方式使得解释起来伸缩性稍微强一些，以适应现在的政治管制格局，这是主要原因。你们知道，古典著作中最好的部分往往都是以谈话的方式，而不是以写作论文的方式（呈现）。很多话题写成论文以后，绝大多数都失去了思考的痕迹，它仅是个成品。谈话是个很好的（表现）方式，你可以看到他思考的过程，有手工制作的痕迹在里面，至少可以证明它不是机器做出来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机器出来的。

**《闻道》：**您采取这种对谈、跨学科思考的方法，跟您之前的阅读经验、生活经验有什么关系？

于：有没有（关系）只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关。

**《闻道》：**所以您是以问题为导向的。

于：那也未必，我有时候可能以兴趣为导向。比如说我谈到一些农村的问题，那是我个人的兴趣；有时候我谈到一些党内政治斗争，那是因为我的问题；那么还谈到其他东西是因为我的知识。

**《闻道》：**我发现，您对农业史、经济学都很了解，让人很讶异。

于：对，农业发展史曾经是我下过很大功夫的一块，那是我的兴趣。

**《闻道》：**您提出一个“农户效率假设”，我觉得很有冲击力，还被人写入了硕士论文的前言。这是不是跟您在新疆的生活经历，比如说参加过劳动、观察过这样一个具体过程有关呢？

于：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去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政治组织，在它的执政过程中，却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而告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才去思考。比如说，为什么要搞土改？我们认为，土改以后劳动效率会提高。那我们又要问，土改是什么？土改是把地分给个人啊。那么我们一套逻辑是认为，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就拥护共产党，生产积极性就高，生产粮食就多。但接着我们又搞集体化，把农民的地又收掉了，那我们这套逻辑怎么又转了，又转化成集体规模经营效率更好？尽管我们知道，土改也害农民，集体化也害农民。那么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事实上农民对于土地的生产劳作的产出效率与这块土地的归属权本身无关。当我发现这个之后，那我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从而我也可以解释今天的很

多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农村问题，像农业土地问题、农业生产问题，包括温铁军、李昌平这些人讨论三农问题，他们在我眼里讨论的都不对。不对的重要原因是，他们都有一个暗中的假设，认为土地产权的归属与在这块土地上农业生产劳动的组织效率成正比关系。而我认为，这个关系不存在。

**《闻道》：**就是说中共在革命、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在损害农民的利益，但它最后又能取得成功，那这个奥秘又在哪呢？

**于：**这个我谈过，关键在于它的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你损害一个人，你才能够控制一个人，而不是相反。这是人最常见的心理状态：你被损害了，你才能被控制；你被控制了，所以你应该被损害。这是所有政党、政治的秘密，但是这个秘密早就在心理学分析当中被解释清楚了，只是没有人把这个知识用在政治现象分析当中。

**《闻道》：**您说中国将会成为制造业的一个“成本洼地”，可能是现代化传统范例的一个终结者。您也提到产业转移。但是以后产业转移就不会进行了呢？还是中国以后的产业升级不会把一些产业转移到非洲、拉美，而是就停留在中国？

**于：**它还是会有些溢出，但它会形成螺旋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制鞋工业，就向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转移。但是你只要去越南观察一个鞋厂，你就会注意到它并没有真正地转移出去。做一个运动鞋需要很多的配件，这些配件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它一个产业即便是转移出去，往往还处在中国大陆的物流供应体系当中——这叫供应链系统——它还是在这个供应链系统当中。其次，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一个产业就转移了，因为中国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也在提高。有些产业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去了，但是由于生产设备的效率提高可以抵消劳动力生产成本的增长，因此它依然可以不用出去。第三种情况，会有一部分（产业）转出去，但是非常少，主要原因在于成本。就是说在非洲生产一个杯子的成本，无论如何比在中国生产的成本高——即使加上运输成本——那么在非洲就不可能持续地生产。由此我们就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使得比中国落后的国家的现代化传统道路被堵住了，从而中国就负有一项特殊的使命——帮助这些国家寻求新的现代化的道路。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博茨瓦纳，都走出过新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不需要加工业，仅靠第一和第

三产业照样可以达到现代化。这是能做到的，我们大有作为，而且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事实上只有中国才能做到，别的国家起不到这个作用。

《闻道》：是因为中国自身转型的一些经验，还是特殊的历史原因？

于：不是，就因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贸体系。它们要达到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这个经贸体系下才能成功，只有中国才能帮助它们。正如同澳大利亚当年只有英国才能让其变成现代化国家一样，因为它跟英国经济是互补的。今天非洲经济和中国经济也是互补的。

《闻道》：您怎样看待民企的作用呢？您在《两个局外人的对话录》里讲到未来的社会结构，是大的国有企业才有竞争力，而这些民营企业是依附于它们而存在的。但是您又和一些民营企业家走得最近，替他们出谋划策。这是为什么？

于：这几年中国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逐步地选用了一种方式，就是强化国有企业，用国有企业来抵抗外来经济上的冲击。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由于占有大量的资源，使得民营企业依附在国有企业身边。是它调动的资源使得民营企业都依附于它，并不是说它有竞争力，而是指它是唯一被选出来竞争的。

《闻道》：那这种垄断可以被替代吗？

于：当然可以，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垄断程度，人家都做得很好啊。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谁说只有垄断企业才能做到？只是眼下它是唯一在运行中的体制，唯一运行着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正确的东西。

*教育的本质不是这样把人谋划化。*

《闻道》：于老师，您原来是学理工科的，但您又进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是怎样的经历使您有这样一个转向？

于：没有转向，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讲这很正常，学理工科和学社会科学都是一回事，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区别。只是看我们工作的时候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它是技术问题，那我们就发挥我们的技术知识；如果它是一个社会问题，那我们一定会去补充我们相关的社会学知识。不存在选择问题。



《闻道》：您那个时候的教育体制与现在的教育体制应该是大同小异，为什么在那个情况下就会产生您这种思维，而现在理工科与社会科学就区别很明显？

于：那时候的教育体制与今天区别很大，不是“大同小异”。那时的教育体制还未成型，没有一套像现在这样的考核体制。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更能显示出一个问题，教育的本质是学生自身的成长，在于你自身的选择，而不在于周围的约束条件如何约束你，把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教育的本质不是这样把人谋划化。对于研究生来讲，最重要的在于你们自己，在于你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你自己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将自己转化成一个形态，今天是A，明天是B，后天是C……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教育应该去办的，这不是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够办到的，而是取决于个人。

《闻道》：我们几个在读您那个《两个局外人的对谈》时，发现在您的思考中，学科之间的区别好像不明显。是不是说，如果有足够的头脑和做学者的耐心的话，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

于：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如此，但他需要有足够好的智力资源，还需要很多（其他）条件。这个不可能成为当今青年人的方向，因为现在大家都专业化了。

《闻道》：那您觉得这种转化的要素、素质应该是怎样的？

于：个人的努力，只有一条。个人要努力，愿意去读书愿意去想问题。如果你还不够解决一些问题，或者你的能力还不够强，说明你书还没有读够，要继续读。

*眼下这几年，你们获得见识的主要方法是读书，因为你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社会实践。*

《闻道》：您的读书方法是细读少量经典，还是泛览各类书籍？您觉得哪种方法更适合？

于：哪种方法都很好，取决于你个人的智力结构，每个人的智力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种读书方法不存在好和差的问题。老师也一样，有的老师比较倾向于教经典，有的老师比较倾向于希望大家读更多的参考书籍。这次我们国关院做的教改当中，我们采用了大量教经典著作的老师，是对过去你们学院的学术传统的矫正。（如何）矫正呢？我们希望把深度加深，

这就是以读经典为主。但它并不代表唯一的读书方式，你们完全可以有新的读书方式，这只是针对我们学院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个学院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学风，而不是大家都去写一些很浅显的政治评论文章。

**《闻道》：**有人说，实践才能获得见识，您怎么看？

**于：**人获得见识不仅是通过实践，通过读书、通过思考也可以获得见识。通过这三种方式获得的见识之间，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安排和兴趣。只是从这个学院来讲，我推动教学改革是希望学生出来以后，第一个做到的是不要很傻气。我看过你们学长写过的一些东西，很肤浅，没有知识深度也没有思考深度，所以说学院的教学体系大有问题，因此我决定推动教学改革。我希望你们出来以后，不管你读A类还是B类，都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有自己的看法，不要浅显、人云亦云。眼下这几年，你们获得见识的主要方法是读书，因为你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社会实践。你们即使参加一些所谓的社会实践，也都谈不上是有什么实践，获得不了什么社会见识，最多就是增加点见闻而已。见闻你们每天都有。

**《闻道》：**上学年我们读了一些经典，但读完后，脑中并没有形成什么印象，就知道写得好。那您觉得，应该如何自个儿读那些经典，毕竟由老师带着读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于：**老师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和你们一起读，告诉你们讲的是是什么。他告诉了几次以后，可能新的书他就不需要再带着你读了，你自己也能读。这些书的内容其实都很简单，过去的世界是很纯净的，没有今天我们想象得那么复杂；人们想事情也很简单，他们把问题的本质提出来了。为什么说看问题要看本质？因为有太多的假象盖在上面，可是过去，在《理想国》时代，甚至马克思时代，没有那么多现象，本质是直接裸露的，这就是读过去经典著作的好处。但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于这样的思维了，我们已习惯于在烟雾重重中看书，所以说我们读完后不知道（书中）说了什么，因为脑中放了太多的东西。

*A类和B类学生，在基础理论学习上的要求是一样的，你们都要学。只是到最后，有些人着眼于教学和研究岗位，有些人可能着眼于公司的管理岗位。*

《闻道》：我们院的教学改革已正式进行了一年，您对这一年来的改革如何评价？

于：局面打开了，但还不够满意，学生、老师及学院工作几方面都还不够满意，我们可能还要两三年才能做到基本令人满意。

《闻道》：那您是不是可以具体讲一下，我们未来会有什么改变？或者说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于：你们要知道，在毕业之前，你们获得见识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读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专心致志于通过读书来获得知识和见识，而不是去想其他方式。以你们的年龄，把你们丢在任何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中去，你们获得不了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孔化结构，你一（被）扔进去就会渗进去，你可以参与到很多很多活动；现在的社会是个致密结构，你一进去，看你（好像）是附着在上面，实际你是附着在表面上，你进不去的。所以你们的时代不是一个好时代，确实如此。因此需要你们的思想用读书来穿透这个致密的结构，你们才能进去。对一个有见识的人来讲，所谓社会实践有半年就足够了，就一下子可以获得很多见识。眼下对于你们最重要的，还是去读书。

《闻道》：我们院现在分为A、B两类学生，A类学生侧重于思想史经典的阅读，B类学生更多的是国际政治的研究，这种划分是不是会对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于：肯定会造成影响，我希望的就是造成影响。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有能力的人，往往他的理论思维能力也是第一流的，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的。我们之所以把它分成A类和B类，主要是考虑到大部分学生是要从事职业的。我们希望这个学院今后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押在一个方向上，就是大中型企业的涉外高级管理岗位上。

那这个业务需要什么能力呢？需要具有能够分析你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能力。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方向。对个人来讲，无论从经济、社会地位，都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几年的培养，让这个学院的学生逐步在

就业市场上、职场上让大家知道，华东师大国关院培养这样的人——涉外管理人员。当然还需要具备很深的基础理论知识。

A类和B类学生，在基础理论学习上的要求是一样的，你们都要学。只是到最后，有些人着眼于教学和研究岗位，有些人可能着眼于公司的管理岗位。A和B没有高低之分，如果真是孰高孰低的话，从社会的效果上来讲，那肯定B类最好——收入高，如果你能干成的话。所以A类一定是少部分，他确实有学术兴趣，又具备学术研究能力，那么我们倾向于（把）他留下来，培养更多的人，以后当老师当研究人员，培养更多的人。当然A类的人走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也可以回到B类，这都没有问题。所以A类和B类的在职业选择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闻道》：**现在就发现，把A类B类分开吧，我们A类要选B类的课程难，B类选A类的课程也难。基本上就不可以选，很难选。

**于：**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很容易解决的，你们可以跟老师商量。如果你愿意多学习不要学分，所有的课程你都可以听。你们现在的课程在我看来太少了，但你们现在不肯读书，也没有办法，

**《闻道》：**那您能不能根据您的经验，对下面的A、B两类同学接下来的读书和学习，提一些建议？

**于：**你们任课老师（会）跟你们讲，这确实要从任课老师那里学到东西，但这也需要很强的能力，因为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言善辩，也不是每个老师都是天生的教师。本科生期间学得好坏取决于老师，研究生学得好坏取决于学生本人。到了博士生，老师基本不上课，就在家里头吃着饭跟你聊几句。有些很优秀的学生不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我看过你们以前提过的一些问题，你们有些人太注重方法，总认为学习存在着某种最佳路线。没有的，学习（方法）只有一个，读书。

**《闻道》：**现在很多人都想，一上来就问老师“你有什么经验”“你有什么技巧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提问题之前还是得自己先读。

**于：**对啊。如果你们不能够事先对于要提的问题本身进行思考，就学不到东西。但是这需要什么？你怎么才能思考你要提的问题？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给任何人提问题之前我们都会想过，我们以我们的问题真正把回答者难住而感到自豪。对任何一个问题，你读足够多的资料，你自己会感觉到那个坎的存在。读上五六本，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坎，这时候你



自己都会知道，要过那个坎；再读三本，你就过这个坎了。当（跨）过那个坎的时候，这个主题就被你消化了，你会感觉到，你的知识才真正上一个格。

*我们的专家都不务正业，这是体制造成的。他们热衷于开会、弄课题，那他们就不会做专业研究。另外，我们不是第一流的头脑在这里边，我们第一流的头脑没有进入这个领域……*

《闻道》：那我们院现在的国际政治研究情况，您怎么看待？

于：做得一般化吧，只能说是在勉强做。

《闻道》：这和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性？

于：因为整个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本身就很弱，全部都很弱，北大也很弱。在我看来，都乏善可陈。

《闻道》：但之前他们也在提要有自己的方法论，要自己的理论创建。

于：对，他们都在努力，但努力的效果不是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关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各种文章都写得非常一般，看不出有特别优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了，脑子中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想听听谁的意见，你能想出来是谁啊？不知道，对吧。但在日本在美国，它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业内人士总是知道，这件事情需要听听某某的意见，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对这个研究大家是公认有水平的。但现在研究钓鱼岛问题公认过谁？我们研究印度问题公认过谁？

《闻道》：出现这样一个状况的根源何在？或者说原因在哪？为什么每天投入这么多钱，专门去搞些研究，但又没有什么成果，在某方面又没有某个权威的专家？

于：因为我们的专家都不务正业，这是体制造成的。他们热衷于开会、弄课题，那他们就不会做专业研究。另外，我们不是第一流的头脑在这里边，我们第一流的头脑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可能去搞经济学了，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最好的一批头脑的人能够进入这个领域。比如刘擎老师，他是第一流的头脑，但他不是搞国际政治的，他是搞政治理论的；立波老师也是如此，他是搞政治理论的，搞法学的，都是被我劝说进来的。

《闻道》：那您刚刚谈到，中国的很多学者热衷于开会、做课题，美国的学者也热衷于课题，他们有基金会支持做课题。这两者间肯定有区别，那么区别在哪里？

于：我不清楚，但一定有人在做着有效的研究，至于说有没有很多人在做无效研究，也一定有。问题在于比例——它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四十的人在无做无效研究，但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在做着有效的研究；我们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做无效的研究，大概还有百分之十的人做有效的研究。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区别了吧。我们经常进行中美对比，中国有很多弊端在美国同样有，但是我们都忘了比例。它一百个案例当中这种比例有多少，我们一百个案例当中比例是多少？我们经常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美国也有人权问题啊。美国在警民冲突的时候，警察动手打黑人的比例有多少？在我们这种警民冲突中，警察动手打了老百姓的有多少？它都该按比例来分析。

《闻道》：在您的眼中，目前的国关学术界，谁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于：没有，你们就自己读书啊，谁都没有。



### 对新生的期待

于：我就希望新生能够专心地读书，从每一个老师身上去挖掘老师还没有说出来的那些知识。告诉你的是一部分知识，其实老师还有很多都没有告诉你，所以能不能学到知识，以及包括毕业以后能不能做得好，都取决于学生自身。我们唯一创造的条件，就是尽可能的将国内最好的青年教师调进来。教学方法、课程设计都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尽可能为你们调来好老师，来改变这个学校和这个学院的状态。我希望我还能再用一年时间再推动一些优秀的老师进入你们学院。

（采访：吴途勇、李洋、曾乔圆）

（整理、编辑：曾乔圆）

## 中国是“例外”的吗？

### ——基于对古代中国与陆地邻国战争规律的分析

孟维瞻\*

**[摘要]** 中国古代的对外战争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律。一方面，从纵向历史上看，等级制体系中的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小国间的关系，处于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之中；从战争数据上统计，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中，防御性战争占多数。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逻辑同样支配着古代中国的战争行为，就某一个特定的朝代而言，其强盛时期恰恰是与周边政权间战争的频发期，而衰落时期的战争频率反而会大大下降；并且古代中国对周边小国使用武力的倾向，要强于对周边大型政权。此外，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之间形成的两极格局中，战争频率较低，但两极体系并不易维持；而在二者力量的不对称格局中，战争频率较高，但这种体系相对容易维持。通过对战争趋势、战争频率和战争偏好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结论未能支持“中国例外论”的命题，更多地反映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共性。

**[关键词]** 古代中国；陆地邻国；朝贡体系；战争趋势；战争偏好

“中国例外论”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而判断中国“例外”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古代中国使用武力的特征是否具有特殊性。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朝贡和平”都是描述古代中国战略特征的最著名的观点，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相关表述。西方学界中，康璨雄

---

\* 孟维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感谢第十一届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会务组、第十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12 年）学术年会会务组、清华大学 2012 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务组对笔者的帮助。由衷感谢清华大学陈琪老师、孙学峰老师、杨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方银老师、徐进老师，复旦大学唐世平老师，上海交通大学瑞典籍特聘教授林瑞谷（Eric Ringmar）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金应忠老师、楼项飞老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包承柯老师、杨成老师、李洋同学、李沛同学等对笔者提出的重要修改建议，以及质疑和批评，文中的错漏之处完全由笔者个人负责。

(David Kang) 是“朝贡和平”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他认为, 古代东亚国家间关系是显著稳定的, 冲突只是偶尔的; 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上的欣羡 (cultural admiration) 是导致没有形成针对中国的联盟的原因, 文化是导致东亚等级制的重要因素, 并且朝贡体系的稳定性不是由权力导致的, 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国家间行为规范导致的。<sup>①</sup>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历史学界中, 长期以来这样的表述更多。如, 李少军认为, “古代中央王朝对周边的朝贡国家多数情况下坚持的是不征讨原则; 中国古代王朝对朝贡制度的坚持, 尽管有不平等关系的一面, 但一直是以和睦周边为目的, 不倾向于对外干涉和使用武力, 而主要强调的是运用道德的影响力。”<sup>②</sup> 历史学家何芳川认为, “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 要求帝国周边及远近各国, 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 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在历史上凡是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 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 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sup>③</sup> 韩昇这样表述, “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 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 因此维持了整个体系的秩序与和平。”<sup>④</sup>

当然, 也有学者提醒, 古代中国在“朝贡和平”之外也存在一种进攻性取向。例如, 时殷弘强调古代中国存在“朝贡和平”之外的另一类战略传统, 他认为这是被当代大多数中国战略研究者“轻视甚而漠视的古代传统, 即彻底歼灭和旨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sup>⑤</sup> 甚至有一些学者完全否认“朝贡和平”, 尽管这种观点完全居于少数。江忆恩通过对明朝军事奏

<sup>①</sup>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66-67;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3-44, p. 49. 此外, 历史学家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也曾解释过中国的防御性战略。Prasenjit Duara,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99. 卫思韩 (John E. Wills, Jr.) 也认为中国的“中心主义观”并未怎么转变成为征服和支配劣等民族的冲动。John E. Wills, Jr.,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Qi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Neptune*, Vol. 48, 1988, p. 226.

<sup>②</sup> 李少军:《中国的战略文化》, 载《当代亚太》, 2009年第1期, 第27页。

<sup>③</sup>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6期, 第37、40页。

<sup>④</sup> 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载《学术研究》, 2008年第8期, 第97、99、107页。此外, 张小明认为, “在相对独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际体系中, 当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国力强盛之时,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则比较稳定。”见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 模式与过程》, 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6年第1期, 第60页。类似的文献不胜枚举。

<sup>⑤</sup>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 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6期, 第6页。



折的分析,认为中国存在着“居安思危”(parabellum)的“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sup>①</sup>

上述观点可以总结为关于中国和平性与战争性的争论。和平性是“中国例外论”各种观点中的一种,它“被当作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对立面”。<sup>②</sup>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上述观点缺乏充分的数据支持,无法验证其可靠性。历史研究者、国际关系史研究者对朝贡体系常常是通过考证、查阅文献的方法给以论述。具体而言,笼统的和平性抑或战争性的观点,至少不能对以下问题给以回答。例如:“朝贡和平”这一命题是否存在边界?历代王朝对外战争的趋势、频率和偏好是什么样子的?古代中国对周边大国与小国的政策有何不同?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是进攻性战争居多,还是防御性战争居多,进攻性与防御性战争之间相互影响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每个朝代对外战争的频率与这个朝代的国力等因素有无相关性?能否将国际关系理论迁移到古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中,以探究古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演变规律?对古代中国战争倾向的研究,对研究当代中国有何启示?如果只是通过定性的笼统表述,无法对上述问题给以回答。必须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特别是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才能给以部分解释。

本研究是一项社会科学研究,而非历史研究。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分歧的普遍存在,强调历史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sup>③</sup>但历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历史归纳总是有限的。<sup>④</sup>历史学研

<sup>①</sup> 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a's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又如,王元康(Yuan-Kang Wang)认为只有现实主义而非儒家和平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对外行为,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中国倾向于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乃至霸权,见 Yuan-Kang Wang, *Power Politics of Confucia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李巍在2012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提醒到,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政治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赵可金指出,中国根本不存在外交例外论,那只是一种被夸大的特色论。<http://cnpolitics.org/2012/08/chinese-exceptionalism/>。

<sup>②</sup> 张锋:《“中国例外论”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88页。张锋指出,中国例外论的明显特色是对干涉主义的拒绝,对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的追求。张锋:《“中国例外论”刍议》,第83、97、98页。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例外论”有多重观点,并非只是和平性与战争性的争论,但本文只讨论有关和平性与战争性争论中的“中国例外论”问题。

<sup>③</sup>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11.

究的往往只是微观史实，强调对文献的精细解读，不重视对宏观规律的把握。历史学长期以来一直比较排斥定量研究的方法，即使是在计量史学领域，笔者也没有见到用定量方法研究古代中国战争倾向的相关成果。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学界，长期以来定量研究也非常之少；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尽管重视统计学的应用，但也缺乏以定量研究对古代中国战争倾向的宏观把握。笔者需要声明，笔者不是第一位试图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人。此前也有学者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研究，但极少看到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但另一方面，纯粹的定量研究也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区分不同的周边政权，比较其特征，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用定性研究指导定量研究。

要想研究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的特征，不应仅关注某一个方面，而是应该做整体性的宏观实证研究。第一，我们应该研究整个中国历史，主要是秦朝之后的所有统一王朝，而不应该仅仅关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者少数的案例。<sup>②</sup>第二，克服“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sup>③</sup>探寻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特征；第三，新的范式应主要体现为一个政治模型，以解释中国的对外战略，而非是一个经济模型<sup>④</sup>或文化模型，<sup>⑤</sup>并且不应仅仅关注朝

<sup>①</sup> 唐世平：《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d/sxyj/2012/0210\\_53384.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d/sxyj/2012/0210_53384.html)。

<sup>②</sup> 中外历史学家往往侧重于个案研究，而非整体研究。研究古代中越关系的，如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研究中朝关系的，有 M. Frederick Nelson, *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6；Hugh D. Walker, *The Yi - Ming Rapprochement: Sino - Korean Foreign Relations, 1392 - 1592*,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1；研究中泰关系的，有 Sarasin Viraohol, *Tribute and Profit: Sino - Siamense Trade, 1652 - 18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等等。

<sup>③</sup> 费正清等西方学者大多持“西方中心论”。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持“中国中心论”，典型的有，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中、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4年版，1995年版；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但也有西方学者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基于中国视角进行研究，如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④</sup> 例如，日本的滨下武志重点研究的是朝贡关系中的经济关系。他将维持朝贡关系的基础看作是经济关系，而非政治关系，认为朝贡体制的根本点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见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有学者指出，事实上中国和周边国家都未从朝贡贸易中真正获得多少实惠，例如经济决定论不用于解释朝鲜的朝贡行为。[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73—74页。

<sup>⑤</sup> 很多学者侧重于从礼仪角度研究朝贡体系，例如，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贡这样一种行为；<sup>①</sup>第四，这个范式应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解释的是古代中国的对外行为规律，而非以周边政权为研究对象。<sup>②</sup>

最近几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很多中国学者也在尝试从新角度系统地分析古代中国国家间关系，努力构建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很多外国学者也对研究古代东亚的国家间关系特征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些成果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注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对照性试验。<sup>③</sup>但很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依然局限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之内。<sup>④</sup>很多中外学者有一种研究倾向，即预设了中国的特殊性，认为基于欧美历史和文化的西方学术不适用于研究中国。实际上这是一个颠倒的逻辑，我们应该是先对一些较有共性的现象——如权力、安全、战争——进行观察，进而寻找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而不应预设中国的特殊性。而且，古代中国与周边政权间的单极格局（等级制体系）、两极格局和不对称格局<sup>⑤</sup>曾经多次反复出现，这有利于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国家间关系中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和不对称格局各自的特征与变化规律，

<sup>①</sup> 费正清等人，以及英国学派学者过分关注文化在维系朝贡和平中的作用，而不怎么关注各种非和平行为，对古代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行为缺乏研究。

<sup>②</sup> “周边决定论”可以算是近年来的一种流行的系列观点，它以周边政权的各种需要，来解释中外关系的变化。例如，日本与中国的朝贡，是源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需要。朝鲜与中国的和平关系，是朝鲜维护自身在东亚既有地位的需要，以及确保其国内安全，和政权的正统性的需要。见[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75页。蒙古与明朝，无论是何解还是战争，都是蒙古为了建立草原霸权的需要，蒙古可以利用与明朝的朝贡，壮大经济力量，以便消灭其他部落，然后实力壮大以后再向明朝挑衅。见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4, 2009, p. 565. 周边决定论的优点在于，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影响朝贡关系发生变化的直接变量，并且可以解释多样性。但其问题在于，它最多只适合于个别国家的个别案例，在整体上没有说服力，无法真正形成一个代替朝贡的新的范式。能解释这个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道理，不能用于解释另一个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周边决定论”关注的不是中国的行为，把中国这样一个中心行为体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sup>③</sup> 唐世平指出，如果只是从一个事实中发展出一个（所谓的）“理论”，而不用类似（但不同的）事实来对其进行检验和比较，这样的“理论”很容易陷入循环解释和论证，根本谈不上有所谓的理论突破。唐世平：《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5期，<http://www.csstoday.net/Item/9822.aspx>.

<sup>④</sup>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11.

<sup>⑤</sup> 不对称格局即指，国际体系中有一个最大的行为体，并且有一个实力位居第二的行为体，且这个实力位居第二的行为体要明显弱于最大的行为体，且明显强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行为体。

并将其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以及 19 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国际关系史进行比较。但比较研究的前提是，首先是我们先透彻了解中国自身。本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的比较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并且本研究建立的数据库可能有助于学界以后的研究。

## 一、 假设的提出与细化

我们设计了以下七组假设，以便后文对中国战争规律与特征进行细化分析，这样能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更清晰的把握。

### 1. 中外战争的整体演进趋势

中外战争的整体演进趋势，或者整体战争频率变化规律，是我们先要探寻的问题。中国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发展是否只是一个没有规律的过程，或者只是循环往复的历史？这只有通过历史事件进行数据分析才能看出来。为此笔者设置了本研究的第一组假设。

假设 1：历代统一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存在一个进化趋势，即战争频率整体上呈降低趋势。

### 2. 中国权力变化与体系稳定性的关系问题

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真的能够给中外关系带来稳定？很多学者的观点是臆想的，缺乏量化及实证研究。例如，康璨雄认为，历史上当中国软弱时，亚洲就会混乱；而中国强大和稳定时，亚洲的秩序就会保持稳定，<sup>①</sup>等级体系中的小国没有必要发动战争。<sup>②</sup>他认为，东亚主导国没有战争的必要，而二等国家又没有战争的欲望，因为文化和理念支撑了这种稳定的等级制，周边国家与中国建立臣属关系所获得的好处，就是确保和平。<sup>③</sup>

笔者认为，中国对力量不同的周边政权，政策可能也不同，因此可以区分为对小国的政策和对大国的政策，而战争可以区分为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sup>④</sup>而对于为何要区分周边政权中的小国与大国，笔者下文将会做出解释。但我们这里要做的假设，肯定要与中国的国力变化情况有关。

<sup>①</sup>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sup>②</sup> Ibid. p. 67.

<sup>③</sup>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1.

<sup>④</sup> 本文中，防御性战争即中国所遭受到的进攻。



假设 2a: 古代中国对周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与其国力成反比, 即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它对周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将会减少;

假设 2b: 古代中国对周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与其国力成正比, 即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它对周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将会增多。

同时, 中国也有遭受进攻的可能。而这可能也会与中国的国力变化情况有关。但需要注意, 在一场战争中, 谁是进攻方, 谁是防御方, 谁先挑起的战争, 本身就是非常难以判断的。有时一方向另一方进攻, 可能是以防御为目的的进攻。还有时, 一方向另一方进攻, 可能只是为了夺回或收复失地, 或挽回上一次战争失败的损失, 因此并不具有主动扩张性。如何区分进攻性战争与防御性战争, 笔者将在研究设计部分对其设定标准。

假设 3a: 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遭到小国的进攻相对较少;

假设 3b: 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遭到小国的进攻相对较多。

同理, 以下两组假设涉及中国与较为强大的周边政权间的关系, 主要指对中国威胁较大的游牧民族。

假设 4a: 古代中国对周边大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与其国力成反比, 即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它对周边大国的进攻性战争将会减少;

假设 4b: 古代中国对周边大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与其国力成正比, 即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它对周边大国的进攻性战争将会增多。

假设 5a: 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遭到周边大国的进攻相对较少;

假设 5b: 在一个特定的朝代中, 当中国相对强大时, 遭到周边大国的进攻相对较多。

笔者认为, 中国与不同力量的周边政权间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国家间格局, 彼此有何不同? 是否有可比性? 下文中笔者也会进行分析。

### 3. 古代中国基本战略取向的问题

此外，在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中，是进攻性战争居多，还是防御性战争居多？能否通过数据进行统计？为此，笔者设置了如下一组假设。

假设 6a：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整体上以防御性战争居多；

假设 6b：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整体上以进攻性战争居多。

中国对大国与小国的政策，是否有差异？<sup>①</sup>古代中国是对大国更易于使用武力，还是对小国更容易使用武力？二者都可以通过现实主义解释。如果中国对威胁性较强的大型游牧政权更易于使用武力，说明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征表现为抵御威胁的现实主义；如果中国对小国更易于使用武力，说明中国的现实主义更多地取决于权力分配。笔者设置了如下一组假设。

假设 7a：古代中国对周边大国更易于使用武力；

假设 7b：古代中国对周边小国更易于使用武力。

## 二、 研究设计

### 1. 研究范围的限定

本文研究的是古代统一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规律，因此对于先秦时代诸侯国的国家间关系以及秦朝之后的分裂时期（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笔者不做研究。对于秦朝之后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笔者仅研究中原王朝统一时期的对外战争的规律。这是因为，笔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而一旦涉及了对分裂时期的研究，任何人都无法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在中国分裂时期“谁是中国”、“谁能代表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都宣称自己是中国“合法的”、“正统”的代表。而中国对周边政权的战争，与分裂割据下中国内部的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二者有完全本质的区别。如不将二者区分开，我们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将研究范围严格限定为古代东亚体系内中国与周边陆上邻国构成的国家间关系。在宋朝及其之前，中国所处的国家间关系体系，为东亚

<sup>①</sup> 很多学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卫思韩认为，中国统治者的行为，往往是由具体情势及其逻辑决定的，而不是由其独特的世界观、价值理念决定的。John E. Wills, Jr.,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Qi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Neptune*, Vol. 48, 1988, p. 226.

大陆国家间关系体系，即使唐朝与日本曾经发生过战争，也是发生于陆地之上，并未有过海战。而从元朝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逐渐纳入另一种国家间关系体系之中。<sup>①</sup>而且这时出现了之前没有遇到的情况，如倭寇的骚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战，以及非东亚体系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等。为了保证我们的研究能够对古代中国史做前后纵向的对比，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将研究范围严格限制在古代东亚体系内中国与周边陆上邻国构成的国家间关系，保证前后研究内容的一致，防止将古代东亚体系与古代世界体系混淆。

## 2. 变量的确定

本研究的特点是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外关系中涉及实力变化、战争频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既有研究中，主要是从文化、贸易、制度以及中国国内政治需要、周边国家政治需要的角度来解释中外关系的形成与演变。但绝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实力、战争等问题的重要性。

为何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一是因为既有研究对古代中国整体战争情况的规律性总结较少。二是因为战争是体现国家间关系的最关键指标。本文将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政权间的各种关系样式抽象掉，即不考虑诸如联姻、结盟、和约、册封、朝贡、赏赐等各种形式，不考虑各国外交政策的复杂多变的动机，只以战争为唯一的分析指标。如果双方战争少，或没有战争，不论双方是通过什么动机、什么方式、什么代价实现的，都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事实。如果双方经常发生战争，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这是一个糟糕的关系。注意，笔者在这里需要区分进攻性战争和进攻性能力这两个概念。本文研究的只是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行为，而不探讨国家的进攻与防御能力，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sup>②</sup>如果根据本文的界定，两个国家中，

<sup>①</sup> 元末及明朝，日本倭寇常骚扰沿海地区，发生了多次小规模或大规模战争。但倭寇的骚扰只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事件，在其他朝代并未发生。如果将倭寇对沿海的骚扰列入统计范围，则会导致明朝与前后朝代之间的战争频率难以比较。而且倭寇本身不能代表日本政权。而对于中国与日本政权之间在陆上发生的战争，则应该列入统计范围。元朝之后中国与日本及欧洲国家之间发生过数次海战，对于元、明与日本、葡萄牙、荷兰之间发生的海战，本文不做研究。本文也不对清朝晚期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海战进行研究。如果将海战列入本文的统计范围，会导致与之前的历史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另外，元朝的海战仅有2次，而与陆上国家的战争有12次；明朝的海战仅有7次，而与陆上国家的战争却有214次。这并未对本文的统计造成太大影响。而且这种做法与本文结论完全不矛盾，清朝后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只能说明，弱国易于遭受侵略。

<sup>②</sup> 例如，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并没有实际发生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进攻性意愿就很低。又如，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的高峰结束后，并不能说明西汉

如果一国或两国的进攻性能力很强，但两国没有发生战争，没有造成民众伤亡，我们依然认为这是和平状态。

我们可以将权力分配作为自变量，将战争频率作为因变量。对于同一时代的体系权力分配，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常识估算出来，尽管不能完全准确，只要能保证不与历史常识相悖即可。就某一个朝代来讲，其国力变化情况并不复杂，一般可区分为建立及上升时期、鼎盛时期、衰落及灭亡时期，尽管具体的变化趋势各有不同。<sup>①</sup>对于战争，我们可以通过研读史料，进而判断战争的规模、进攻方、防御方，可以通过对历史战争数据的统计，计算战争的频率、集中程度等等。这些均属于可观察和计算的范围。

### 3. 数据库的选择与制作

笔者所使用的研究数据，基本来源于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以下简称《年表》）。<sup>②</sup>和其他的相关文献相比，《年表》对中国古代战争史所做的统计最为全面，不仅完整地制作了历代王朝的作战次数统计表，而且按照时间顺序统计了每一年的作战次数，并且还根据 25 部正史的叙述对每次战争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详细归纳，因此《年表》大大方便了笔者的研究。我们能够通过《年表》对战争的描述，区分进攻性与防御性战争，笔者以 10 年为标准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即一个行为体对其短于 10 年的失地的争夺行为属防御性战争，而一个行为体对其长于 10 年的失地的争夺行为属进攻性战争。

然而，《年表》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并不能直接作为本项研究的数据库。例如，年表没有区分历史上中国的对外战争与内部战争；没有区分中国周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政权，也没有明确区分战争的规模；此外，

---

不再想攻打匈奴，高峰期过后进攻性战争减少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此外，笔者也不讨论中国是更多地具有战争性文化，还是更多地具有防御性文化，因为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棘手问题。笔者并未试图用进攻性与防御性战争来衡量国家的战争性文化与防御性文化。与中国战略文化相关的研究，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0 期，第 66~76 页；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up>①</sup> 因为尽管历代不同朝代的疆域变化较大，但对于周边小国来说，中原王朝永远占据完全绝对优势。因此对于周边小国来讲，不同中原王朝的实力变化可以忽略。而对于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的关系，后文已经就实力对比进行了详细分析。

<sup>②</sup>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年版。《年表》最初的编写工作是 1964 年在叶剑英元帅的指示下开始进行的，历时 27 年编写完成，并已修改、再版多次，因此其内容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权威性。

有的战争历时两年，被统计为两次战争，但应该将其合并，实际上只应算一次战争；还有的战争，在表格中仅仅显示为一次，但内部又包含了多次小规模战争。还有的战争仅是中国周边的政权或部落之间的战争，与中国无关。鉴于上述问题，如果直接使用其提供的数据会导致定量衡量的失真性，因此需要仔细分析《年表》正文的解释部分，在《年表》的基础上进行再整理，制作本研究的直接数据库。<sup>①</sup>通过对直接数据库的统计，我们再研究战争规律。例如，尽管每次战争规模的大小无法从《年表》中直接看出来，但通过《年表》正文的叙述可以对战争规模进行区分，而且《年表》正文中已经列举了大规模战役中的小的战争，我们可以直接统计分解后的战争，避免不分战争规模大小的情况。

#### 4. 对周边国家类型的区分

很多既有的相关研究忽视了国家规模的不同，没有对不同的权力结构进行区分，也未注意到国际体系的复杂演变。沃尔兹之后的大多国际关系研究，都将权力分配作为首要关注的对象。而对于中外关系的研究前提，就是根据权力大小区分周边政权的类型。<sup>②</sup>物质权力常常首先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作用，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邻国。本研究区分了中国的强大邻国与弱小邻国，也区分了中国的强大时期与衰落时期，并关注其变化过程。因此，不是所有的邻国与中国都构成了“等级制”或“非平等”关系。<sup>③</sup>本文将讨论两类关系，一类是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的关系，另一类是与周边小国或部落的关系。

很显然，“等级关系”这一范畴应该排除那些与中国实力相当的周边政权，以及那些实力接近于中国的政权，而仅仅将其限定为中国与周边小国（不一定是对中国服从的小国）的关系。为此，笔者引入了“陆上大型周边政权”这一概念（以下简称“大型政权”）。“大型政权”即古代中原王朝周边的规模较大的政权，而“规模较大”可以有三种情况中的至

<sup>①</sup> 读者如果需要查阅数据库，可联系作者索取。

<sup>②</sup> 很多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非常注意对大国和一般国家的区分。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③</sup> 这是笔者对费正清观点的纠正。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2.

少一种：面积广大、人口众多，能对中原王朝的生存或安全明显构成威胁。如果原来的朝贡国变成了大国，且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它们和中国的关系，与小国和中国的关系大不相同。<sup>①</sup>笔者这里列出了中国古代史上全部的与中国接壤的“大型政权”：秦、西汉时期的匈奴；东汉时期的北匈奴；隋、唐时期的东突厥、西突厥；唐朝时的回纥（回鹘）、吐蕃<sup>②</sup>；北宋<sup>③</sup>时期的辽、西夏、金；明朝时的蒙古诸部、后金；清朝时的沙俄<sup>④</sup>。

此外，本文的研究需要有三个假定。一是假定中原王朝和周边大型政权间战争频率的变化，对中原王朝和周边非大型政权间战争频率的变化没有影响，反之亦然。二是本文研究的是中外关系变化规律，因此我们假定中原王朝与周边各个小国之间的关系，彼此互不影响，并且对于周边小国之间的战争忽略不计。三是假定周边小国仅与中原王朝构成等级制体系，忽视历史上周边小国与除中国外的其他大型政权构成的等级制关系。<sup>⑤</sup>

###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下文将通过对直接数据库的分析，并结合历代王朝国家实力的变化情况，分析古代中国战略行为的一些特征和规律。

#### 1. 中外关系的进化趋势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到底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还是能够

<sup>①</sup> 大型政权多指游牧政权。费正清认为，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不得不向其战斗力妥协。”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古代中国有时会基于平等原则处理与邻国的关系，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p. 8。

<sup>②</sup> 这里需要对吐蕃给以解释。吐蕃在唐朝中后期，特别是在赤松德赞为赞普时，曾经极盛一时。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786年吐蕃两次进攻长安周边地区，使得唐朝丧失西域、河陇之地，一度掌握了对唐战争的主动权。此时吐蕃领土已经大大扩展，而迫使唐朝领土大大收缩。吐蕃在7—8世纪盛期，人口有1000万左右（包括本土藏族人口和吐蕃新占领地区的非藏族人口）。王克：《藏族人口史考略》，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62—72页；朱悦梅：《吐蕃王朝人口研究》，载《中国藏学》，2012年第1期，第80页。而根据《旧唐书》的统计，代宗时期唐朝的人口数也只不过1692万。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本纪第十一（代宗李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7—318页。

<sup>③</sup> 但本文并不研究宋朝，因为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宋朝并未统一中国。

<sup>④</sup> 沙俄尽管是清朝时期东亚体系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但同以往的大型政权明显不同，它并未对清朝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它在250多年间，对清朝边疆的进攻只有6次，频率很低。在本文第3部分中，它可以忽略。

<sup>⑤</sup> 例如，高丽曾向辽朝贡，也与北元保留过朝贡关系。

具有一定的进化<sup>①</sup>特征？有些学者将朝贡体系看作是“静止的”、“不变的”体系。<sup>②</sup>从表面上看，古代中国一直经历着治、乱、兴、衰的循环，而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则可以用费正清的朝贡范式一而概之。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只能通过对战争频率进行统计，找出其变化特征，才能得出结论。这里，我们设计了另一套统计标准，即将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一个具有等级制特征的体系之内，即只研究等级制体系中的统一王朝与周边小国或小型部落间的关系。统计如下：

表 1 历代统一王朝与周边陆上小国的年均战争频率

朝代	中原王朝与陆上周边小国间的年均战争频率
秦	0.2
西汉	0.13
东汉	0.52
西晋	0.44
隋	0.32
唐	0.32
元	0.13
明	0.12
清	0.05

从新的统计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从东汉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原王朝与周边陆上非大型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率，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尽管就中国与所有周边陆地邻国之间的战争频率变化来说，我们看不出非常明显的变化规律，但东汉以后的古代东亚等级制体系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进化的过程。而且这一进化过程不受古代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间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尽管古代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间权力结构历经多次复杂变化，但与周边小国却始终呈现类似于单极体系或等级制体

<sup>①</sup> 这里的“进化”，应该对应于英文的“progress”一词，而非“evolution”。后者包含了“progress”与“regress”。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参见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sup>②</sup> 张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见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4, 2009, p. 605.

系的关系，一直很稳定，而这种进化关系就存在于这个稳定的等级制体系中。

为了保证这个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这里还使用了另一种统计方法。我们以百年为统计单位，对中国历史上 1500 多年的统一时期的对周边陆上小国的战争频率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表 2 中国统一时期与周边陆上小国的战争次数变化

时间（以百年为单位）		战争次数
秦、西汉、东汉	I：221 B.C.—122 B.C.	7
	II：121 B.C.—22 B.C.	22
	III：21 B.C.—78 A.D.	15
	IV：79 B.C.—178 A.D.	82
	V：179 B.C.—220 A.D.	7 (17) <sup>①</sup>
西晋	VI：265 A.D.—316 A.D.	23 (44)
隋、唐	VII：581 A.D.—680 A.D.	42
	VIII：681 A.D.—780 A.D.	49
	IX：781 A.D.—907 A.D.	14 (11)
元、明、清	X：1279 A.D.—1378 A.D.	11
	XI：1379 A.D.—1478 A.D.	8
	XII：1479 A.D.—1578 A.D.	6
	XIII：1579 A.D.—1678 A.D.	2
	XIV：1679 A.D.—1778 A.D.	3
	XV：1779 A.D.—1878 A.D.	9
	XVI：1879 A.D.—1911 A.D.	0

由于受到费正清的影响，美国对古代中国外交模式的研究均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费正清等人只是强调西方的入侵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sup>②</sup>费正清的历史观，等于默认了古代中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停滞的社会，而朝贡体系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没有进步的体系。费正清的

<sup>①</sup> 这里的 7 次，是指公元前 179 年到公元 220 年的战争次数。但由于这段时间不够 100 年，所以需要按比例换算为 100 年的战争次数（即括号里的 17 次），以保证统计的有效。

<sup>②</sup>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



中国观可以上溯到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他今日的情状……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sup>①</sup>黑格尔将皇权的更替仅仅看作是一种循环，本质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sup>②</sup>

事实上，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中外关系的发展情况并非如此。朝贡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并非没有创造性，而是具有进化的特征。正如李扬帆在对“冲击—反应”模式进行批判时指出的，“作为一个可以和西方文明等量齐观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到来前一直是独立地发展，其内在的规律和自发的秩序并不因为西方的冲击而彻底地改变。”<sup>③</sup>费正清“朝贡范式”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古代中国朝贡体系自身的进化特征。费正清将朝贡体系与以条约为主要特征的主权体系对立起来，预设了主权体系相对于朝贡体系的进步性，较为低估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过程中的逐渐自我进化的能力。尽管费正清看到了中国“在十九世纪早期是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应”，<sup>④</sup>但他并未注意到，清朝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的能力本来就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之上的，并且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要想令人信服地展示中外关系是一个历史过程，仅有简单的描述是不够的。本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小国间战争频率变化趋势的观察，证明出了等级制体系的进化特征，而且这一进化过程不受古代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间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只存在于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稳定的等级制体系之中。

等级制中中外关系的进化过程可能是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中国历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不断增长的经验；二是因为周边原有的分散部族、蛮族逐渐整合为成型的政治实体后能够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三是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原来的国家间关系逐渐变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sup>⑤</sup>但这

<sup>①</sup>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sup>②</sup>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sup>③</sup> 李扬帆：《晚清对外关系研究若干问题再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6页。

<sup>④</sup> 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sup>⑤</sup> 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页。

里只是给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暂对其机制和过程没有做实证研究。从《年表》及本文数据库中可以看出,在东汉、隋、唐三朝,中国边疆之所以冲突频繁,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部落林立,而明、清两朝的周边政权则以成型的政治实体为主,冲突频率降低。

## 2. 历代王朝与周边小国间战争的变化规律

古代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国家间关系结构,一直是稳定的,始终是单极体系或等级制之中。对周边小国来说,中国始终具有绝对的权力优势。而对等级制中的权力结构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中国自身权力的消长。在不同的时期,例如建立、鼎盛、衰亡时期,中国的权力变化依然是很大的。因此,考察中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我们只需要关注中国的权力变化情况即可。<sup>①</sup>

### (1) 西汉

西汉一朝对周边非大型政权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与其国力变化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西汉建立后,一场大规模战乱刚刚结束,国家贫穷、人口稀少,因此实行了约 60 多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从公元前 202 年到前 141 年(汉高祖到汉景帝时期),对外进攻性战争非常少,近乎为 0。而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前 140 年到前 87 年),国家富足而强盛,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明显增加,为  $10/54=0.19$ (次/年),其中前 112 年到前 108 年这五年是汉武帝扩张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争频率一度高达  $6/5=1.2$ (次/年)。汉武帝之后,是大臣霍光摄政时期(前 86 年到前 68 年),这一时期西汉国力尽管与汉武帝时期无法相比,但依然比较强盛,这一期间进攻性战争频率为  $4/19=0.21$ (次/年)。霍光之后,国家衰落,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又减少到近乎为 0 的程度。

我们再来看西汉一朝防御性战争(遭受小国进攻)频率的变化趋势(这里依然只针对周边非大型政权)。西汉建国初期到汉武帝之前,遭受周边小国进攻的次数为  $2/63=0.032$ (次/年)。而到了汉武帝统治时的鼎盛时期,为  $1/54=0.019$ ,这是整个西汉一朝防御性战争频率最低的时期。到了霍光摄政时期,国力缓慢衰落,但依然比较强盛,而这一时期遭受进攻的频率却突然增长至  $2/19=0.105$ (次/年)。霍光之后,西汉继续缓慢衰落,这一时期的防御性战争频率比之前稍有降低,但远高于汉武帝时期,为

<sup>①</sup> 在这一部分中,由于秦朝的时间实在太短,只有 15 年,如果按照每 5 年一组统计数据,完全看不出任何趋势,而且秦朝的对外战争只有两次。因此在本文第 2、3 部分中,秦朝可以忽略,但在本文其他部分则需要详细研究秦朝。

$5/76=0.066$  (次/年)。

### (2) 东汉

东汉刚刚建立后，鉴于国家刚刚经历过大的战乱和破坏，汉光武帝和汉明帝两朝（25 年—88 年）实行了“修养生息”的政策，造就了“光武中兴”的局面。到了从汉和帝到汉顺帝时期（89 年—144 年），国家的实力与之前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没有经历过西汉武帝时期那样的鼎盛局面。但这一时期东汉遭到了周边小国及部落的频繁进攻，导致了东汉的进攻性战争频率随之大大上升。汉光武帝和汉明帝时期，东汉遭受小国进攻的频率为  $5/64=0.08$  (次/年)，这一时期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为  $11/64=0.17$  (次/年)；而从汉和帝到汉顺帝时期，遭到进攻的频率上升至  $26/56=0.46$  (次/年)，同时这一时期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也上升至  $27/56=0.48$  (次/年)。之后，到了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151 年—189 年），是东汉最为腐败、衰落的时期，尽管东汉遭到了大规模进攻，但却没有什么能力抵抗。这一时期遭受进攻的频率为  $24/39=0.62$  (次/年)，而进攻性战争的频率则为  $8/39=0.21$  (次/年)。东汉末年尽管国家继续衰落，但黄巾起义后地方军阀实力都非常强大，地方军阀而非朝廷成为了巩固边防、抵御侵略的主体。在东汉统治的最后 30 年，由于国家整体实力衰落，基本没有进攻能力，但边疆也极少遭受外敌入侵。

### (3) 西晋

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只存在了 52 年。我们可以将西晋分为两个阶段，晋武帝时期（265 年—290 年），和后晋武帝时期（291 年—316 年）。在晋武帝时期，西晋国力还较为强盛，对周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为  $5/26=0.19$  (次/年)。而晋武帝之后，由于受“八王之乱”影响，国力衰落，频率降至  $2/26=0.08$  (次/年)。而西晋遭受进攻的频率，从一开始就比较高，这在历代统一王朝中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是受到了“五胡”内迁的影响。

### (4) 隋朝

隋朝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历时只有 37 年。由于时间较短，国力变化不明显，我们难以发现其战争频率的变化规律，比较困难。但整体上看，隋朝遭受小国进攻的频率始终并不高，约  $4/37=0.11$  (次/年)。隋文帝时期（581 年—604 年）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为  $1/24=0.04$  (次/年)，隋炀帝时期（605 年—617 年）的频率较高，为  $6/13=0.46$  (次/年)。

由于版面有限，唐朝到元朝的具体情况不在这里刊登。

### (5) 小结

通过对七个主要统一王朝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历代统一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对周边小国进攻性战争的频率取决于它的国力强弱。西汉、东汉、隋、唐在刚刚建立时，国力较弱，对外战争频率较低，随着国力增强，进攻性战争的频率也上升。逐渐加强了对外进攻战略。而西晋、元、明在刚刚建立时，国力强盛，至少军力是强大的，对周边小国进攻性战争频率从一开始就较高，而随着这四个朝代国力的逐渐衰落，其对外进攻性战略也大大减弱。而历代王朝刚刚建立时，无论国力是强大还是虚弱，都会较少遭受周边小国的进攻。<sup>①</sup>而历代王朝遭受周边小国进攻，主要集中于各自的中、后期。<sup>②</sup>

第二，在两种情况下，中原王朝对周边小国的进攻性战争频率会较高。第一，中原王朝对小国的进攻频率与其国力呈正相关关系。一代王朝鼎盛时期，往往也是对周边小国进攻性战争频率最高的时期，而无论它是否遭到了小国的进攻。<sup>③</sup>而后，当这个王朝由强盛突然转向衰落时（西晋和唐朝），对外进攻性战争频率也会突然降低。但如果这个朝代是由强盛逐渐转向衰落，对外进攻性战争频率将会在一段时期内依然保持较高状态，之后会逐渐下降，到这个朝代完全衰落时进攻性战争的频率也会逐渐趋于0。第二，在一个朝代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如果这个朝代并未完全衰落，那么当它遭受到非大型政权较大规模的进攻的时候，会进行反击，使得进攻性战争频率升高。而中原王朝完全衰落之时，一定是其进攻性战争频率最低之时。因此，进攻性战争的频率的变化取决于两个变量：第一变量是国家的实力，第二变量是国家遭到进攻的频率。

第三，一代王朝遭受小国进攻的频率，与其国力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一代王朝在由盛转衰的变化期间（无论是突然转向衰落还是缓慢转向衰落，只有元朝除外），最容易遭受外部小国的进攻。随后尽管其继续衰落，但

<sup>①</sup> 历史上几个超过100年的统一王朝，各自建立后的前70年，遭受进攻的频率依次为：西汉每年0.03次、东汉每年0.07次、唐朝每年0.07次、元朝为0、明朝每年0.01次、清朝为0。都处于很低的水平。短命王朝隋朝建国初期遭受进攻的频率也不高，而唯有西晋是一个例外。

<sup>②</sup> 历史上主要的统一王朝各自的中、后期时间（按后2/3的时间算）遭受进攻的次數占整个朝代的比例，依次为：西汉为80%、东汉为91%、隋朝为60%、唐朝为57%、明朝为88%、清朝为100%。秦朝、元朝从未遭受过进攻。只有西晋是例外，只有44%，这可能是与当时的“五胡”内迁有关。

<sup>③</sup> 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强盛时一定会发动大规模对外进攻，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及康乾盛世期间。

遭受进攻的频率并非逐渐增加，反而是会比之前稍有减少。

### 3. 历代王朝与周边大型政权关系的演变规律

古代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的关系，与前面对小国研究过程大致相同。除了检验第 4、5 两组假设外，我们还需要比较不同国际权力结构下国家间格局的不同特征。<sup>①</sup>但由于版面有限，这一部分不在这里刊登。

#### 两极格局与不对称格局的比较

通过上面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间战争频率的变化，同样遵循了最基本的权力逻辑。一代王朝对周边大型政权进攻性战争频率较高的时期，一般正好处于其国力强盛时期，这与古代中国对周边小国的战争特征基本相同。<sup>②</sup>

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间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二者共同决定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变化，只考察中国或只考察周边大型政权都是不行的，这与中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不同。中国与周边大型政权间的权力结构，可以分为两类：两极格局与不对称格局。两极格局即指，体系中有两个最大的行为体，且两者实力基本对等，很难分清楚谁强谁弱。<sup>③</sup>而不对称格局即指，体系中有一个最大的行为体，并且有一个实力位居第二的行为体，且这个实力位居第二的行为体要明显弱于最大的行为体，且明显强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行为体。通过前面对西汉、东汉、唐、明这四个持续时间较长的统一汉族王朝与周边大型政权间关系的研究，我们将数据统

<sup>①</sup> 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东亚国际体系是完全的单极体系或等级制体系。这两个朝代的周边没有出现大型政权。在这一部分，由于隋朝时间只有 37 年，且只与突厥发生过 4 次战争，难以看出战争频率变化规律，因此隋朝在这一研究部分中可以忽略。

<sup>②</sup> 此外，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对此进行证明。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内战的频率（当然这不是唯一指标）。以 20 年作为一单位，衡量历代统一王朝的内战频率变化与对外战争频率变化的相关性，会发现除唐朝之外的其余朝代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而西汉、东汉两朝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p$  值分别为 0.065 和 0.067，显著性较强。这基本否定了费正清的观点，中国“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这也否定了张小明类似于“中国例外论”的观点，“在中国王朝衰落、自顾无暇时，原先的朝贡国往往摆脱中国的影响，甚至向中国挑战，包括进攻中国；当中国国力强盛之时，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则比较稳定。”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60 页。因此中国对外行为的现实主义逻辑比较明显，不能支持“中国例外论”。

<sup>③</sup> 注意，这里的两极格局，涉及的都是作为整体的中国，与另一个游牧政权之间的关系，而不包括古代中国内部的分裂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三国时代三个政权间的关系，南朝—北朝关系，北宋—辽关系，南宋—金关系。

计结果制作成如下表格。

表3 主要的统一汉族王朝与周边大型政权间战争频率的变化  
(单位: 次/年)

	西汉 vs. 匈奴	东汉 vs. 北匈奴	唐 vs. 突厥	唐 vs. 吐蕃	明 vs. 蒙古
两极格局持续阶段	0.18	0.06	—	—	—
两极格局受冲击阶段	0.35	0.29	—	—	—
两极格局解体阶段	趋于 0	趋于 0	—	—	—
不对称格局持续阶段	—	—	0.27	0.23	0.71

比较数据中的第2行与第5行,我们可以看出,两极格局持续阶段中的战争频率,总是要小于不对称格局的持续阶段。在历代王朝中,两极格局持续阶段的战争频率值不超过0.2次/年,而不对称格局持续阶段则大于0.2次/年。

此外,对于历史上某个特定的两极格局来说,两极格局的持续阶段战争频率是最低的,一般小于0.2次/年;而两极格局的受冲击阶段的战争频率则明显要高很多,一般大于0.2次/年;而当两极中的一极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它已经没有多少还击之力,因此两极格局濒临解体,此时战争频率趋于0。

不对称格局的主要特点是双方战争持续不断,但它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双方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一方击败并消灭了另一方,从而终结了不对称格局,如唐与突厥的关系;另一种是尽管双方战争持续不断,但强方并不能完全击败和消灭弱方,而是弱方由于内部因素自己灭亡,如吐蕃,或者强方在第三方的打击下灭亡,如明与蒙古关系中的明朝。

从上面对战争频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极格局下的战争频率要比非对称格局低很多,而非对称格局下的战争是最为频繁的。但从体系维持的角度上看,两极格局又是最不易维持的,“两极”中总是至少有一极具有打破两极格局的意愿,如两汉。<sup>①</sup>尽管两极格局中的两大行为体都在努力

<sup>①</sup> 沃尔兹所说的“稳定性”(stability),我们可以理解为体系的和平性、战争频率低,或者不易导致世界战争。但根据沃尔兹对两极稳定论的表述,“稳定性”又包括了

维持自己的权力，但双方权力增长的速度总是难以完全相同的，一旦权力增长速度不均，或者一方预期有机会使得另一方削弱，那么强的一方就会对弱的一方发起进攻，进而加速两极格局的解体。与此相比，非对称格局往往是以一方自行灭亡而结束，而非以一方消灭另一方而结束。

如果两极格局中权力结构能够维持，那么这一时期战争频率是较低的。但两极格局又是不易维持的，一旦权力增长速度不均，那么战争频率就会迅速增加。而当一方被明显削弱后，两极格局就不复存在了，进入“后两极格局”时期，这时战争频率会回落至与两极格局维持时期差不多的程度。

#### 4. 古代中国的整体战略倾向及使用武力的偏好

从整体上看，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是进攻性战争为多，还是防御性战争为多？我们需要统计历代统一王朝的进攻性与防御性战争频率，由于版面有限，这一部分不在此处刊登。

中国对不同的周边国家使用武力的偏好是否有不同？中国更易于对什么样的国家主动使用武力？这里将前两个表格做了进一步整理。

表 4 历代王朝对大型政权与非大型政权的进攻性指数比较

朝代	历代王朝对大型政权的进攻性指数	历代王朝对非大型政权的进攻性指数
秦	100%	100%
西汉	42.9%	63.0%
东汉	60.9%	45.1%
西晋	—	30.4%
隋	50%	63.6%
唐	33.3%	75%
元	—	100%
明	29.5%	37.5%
清	—	10%

因此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周边非大型

“持久性” (durability)。详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6-183。由于本文这一部分讨论的是体系的战争频率与体系持久性的关系，为了避免歧义，这一部分避免使用“稳定”这一词语。但本文其他部分所说的“稳定”都是指战争频率较少。

政权更易于使用武力，而对大型政权则相对不易于使用武力。<sup>①</sup>西汉、唐、隋、明四朝皆是如此，唯有东汉是一个例外。<sup>②</sup>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古代中国对周边的小国或弱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这是一种由纯粹的权力逻辑导致的现实主义战略，而非是一种以消除威胁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战略。古代中国的战略特征可以归纳为一种“基于权力逻辑的现实主义战略”。

####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战争趋势上看，历代王朝与周边小国间的战争频率呈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古代中国与周边小国间的“和平性”是一个逐渐变得明显的过程。但我们还是能够从古代的中国中找到现实主义的行为逻辑，因为从战争频率上看，如果我们仅关注一个朝代的兴衰变化，就会发现，“彻底歼灭和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sup>③</sup>只会发生在中国强盛的时期，几乎找不到反例。并且历代王朝中，中国强盛、稳定时期的对外战争频率一点都不比衰弱时代低。从战争偏好上看，古代中国更倾向于对周边的小国或部落使用武力，而对周边大型政权则较为慎用武力。而且当一个与中国势均力敌的周边大国出现时，恰恰是双方战争最少的时期。笔者将这些特征归纳为一种“弱式的基于权力逻辑的现实主义战略”，或许这里更多地体现的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共性。笔者从战争趋势、战争频率和战争偏好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未能支持有关和平性与战争性争论中的“中国例外论”的命题。

（责任编辑：陈安龙）

<sup>①</sup> 注意，这里的统计结果，与周边政权的数量无关。尽管周边小国的数量一般远远多于周边大国的数量，但本文比较的是历代王朝所有的进攻性战争与所有的防御性战争的比值，因此与周边政权的数量无关。

<sup>②</sup> 东汉对北匈奴使用武力的倾向，远远高于其他朝代对大型政权使用武力的倾向。笔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和历史上的其他大型政权相比，北匈奴的力量相对要弱很多，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也弱很多。因此这一现象也符合上面所述的古代中国对周边的小国或弱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这一结论。

<sup>③</sup>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6页。



## 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非基建合作 ——治理视角的分析

祝 鸣\*

**[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中非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双方合作的逐渐深入,中国与非洲的基础建设合作也取得了日益丰硕的成果。但是就基建合作的可持续性与更高质量的要求而言,中国还需要在国家政策、企业治理、国际与非洲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等方面加强政策协调与顶层设计,以更好地提高中非基建合作的规模与质量,达到更好的互利效果。

**[关键词]** 中非关系; 治理; 基础设施合作; 发展援助

基础设施建设一般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和完善。非洲大陆目前只有南非完成了工业化,它拥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充足的电力供应及发达的通讯业。但广大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来没有完成过工业化,所以其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据非盟统计,交通运输成本占非洲内陆国家总生产成本的 20% 到 4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 10% 的比例。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每年把非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降低至少一个百分点。<sup>①</sup>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权威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其下属的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从 2002 年起每年发布的《非洲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中开始逐年提到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并且比例越来越大。从 2002—2008 年这 6 年的报告总体基调来看,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对中国在帮助非洲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经济的正面推动作用体现在: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出口的多元化(有别于过去过度依靠美国和欧洲);中国从非洲的进口抬高了部分

---

\* 祝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sup>①</sup> 张忠祥:《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新特点》,载《亚非纵横》2009 年第 5 期,第 53 页。

非洲出口产品的价格。报告最后下结论认为：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已经成为非洲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sup>①</sup>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形象在继续逐步提高。国外诸多民意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非洲国家，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是正面的比例在 60%—70% 左右，认为是负面的比例则不到 16%。<sup>②</sup>

## 一、中非基建合作：成就与潜力

### （一）成果丰硕的基建合作

截止 2011 年，根据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谢亚静提供的数据：50 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为非洲援建了 800 多个成套项目，建成铁路 2000 多公里、公路 3000 多公里。<sup>③</sup>

中国帮助安哥拉、苏丹等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被人誉为“安哥拉模式”<sup>④</sup>和“苏丹模式”。2011 年，南非标准银行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2/3 的资金来自中国。<sup>⑤</sup>中国企业在电力、通讯、交通、能源等领域建设了大批有影响的项目，中非经贸合作使双方受益。中国的商品为非洲人民提供了多元化选择，中国商品

---

<sup>①</sup>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02: Tracking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Addis Ababa, Ethiopia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2), p.26;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04: Unlocking Africa's Trade Potential* (Addis Ababa, Ethiopi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4), p.28;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05: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 (Addis Ababa, Ethiopi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5), p.33;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07: Accelerating Africa's Development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Addis Ababa, Ethiopi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7), p.26; UNDP and UNCTAD, *Asi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owards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7);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08: Africa and the Monterrey Consensus: Tracking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Addis Ababa, Ethiopia: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8), pp.28-31.

<sup>②</sup> 例如 World Public Opinion, *Global Views of USA Improve* (April 1, 2008), p.14; BBC World Service Poll, *Views of China and Russia Decline in Global Poll* (February 6, 2009) p.7.

<sup>③</sup> 中国网 2011 年 10 月 21 日讯。

<sup>④</sup> 中国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约定用未来开采出来的石油偿付，以此启动了安哥拉战后重建，此模式被称为中国援助非洲的“安哥拉模式”。安哥拉模式主要以买方信贷的形式进行合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世界银行发表过一份相关报告，将中国和安哥拉的经济合作关系称为“安哥拉模式”，并认为“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做法在人类以往的采掘业历史上并不新鲜。可参考 Ian Taylor,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6), pp.90-91; 张宇炎：《中国对“安哥拉模式”管理政策变化分析》，载《国际观察》2012 年第 1 期，第 59 页。

<sup>⑤</sup> 报告见 The Standard Bank of South Africa Limited (21 July 2011).

经济实惠、丰富了非洲市场，降低了贫困家庭的生活成本，使广大非洲消费者，特别是购买力较弱的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越来越多的非洲商品以零关税进入了中国市场，既降低中国企业的进口成本，拓宽了中国的进口来源渠道，又增加了有关非洲国家的出口创汇。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的一批公路、港口、机场、电站、电信以及工业生产等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完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当地产业水平，扩大了当地的就业，培训了当地的人才，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sup>①</sup>

众多实力雄厚的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非洲国家开展了为数众多的项目合作（见表一）。2008年，中国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394.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9.9亿美元；年末在非经济合作人员14万人。<sup>②</sup>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已经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恢复中东，拓展欧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008年，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合同额与营业额计算，非洲所占比重分别为38%和35%。<sup>③</sup>2011年，虽然经历了西亚北非的乱局，使得诸多中国在当地的企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全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仍然达到了457.7亿美元，同比增长19.36%。<sup>④</sup>

表一：1999—2003年我国承包商在六大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营业额及市场占有率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
北美	0.94	0.5	0.86	0.4	1.235	0.43	1.8	0.58	0.9	0.4
拉美	3	2.8	1.686	1.5	1.383	1.3	5	5.2	1.8	1.8
欧洲	2.15	0.6	1.001	0.3	3.780	1.3	4.7	1.4	2.3	0.5
非洲	14.14	14.2	5.4	7.1	6.541	7.4	11	9.9	14.9	11.8
中东	6.65	6	4.9	4.8	8.08	9.5	7.3	7.5	9.6	5.9
亚洲	34.11	11	39.787	15.9	38.455	17.5	41.5	18.2	53.7	20.6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统计数据综合整理而成。

<sup>①</sup> 中国网2011年10月21日讯。

<sup>②</sup> 《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商务年鉴·2009》，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sup>③</sup> 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我国对外经济合作30年》，载张平主编：《中国改革开放：1978—2008·综合篇（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页。

<sup>④</sup> 贺小虎：《盘点2011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载《中国勘察设计》2012年第3期，第38页。

中国援助注重效率、决策迅速、向非洲的基础设施等倾斜的特点，得到了非洲政要和人民的普遍赞扬。中国对非援助与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援助方面更注重投入在所谓的“民主”、“人权”等“软件”上不同，<sup>①</sup>中国援助更加注重建设大量实实在在的民生基础设施，而且效率非常之高（见表二）。2008年2月，时任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帮助非洲方面，西方也应该向中国学习。”他认为：“与欧洲投资者、捐赠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缓慢而且有时带有施恩性质的后殖民主义方式相比，中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式更为适宜。事实上，刺激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模式可以让非洲吸取很多经验。”根据他的切身经历，瓦德总统还指出，“原来要花5年时间与世界银行探讨、协商和签署的合同，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只需3个月就能完成。”<sup>②</sup>

表二：中国与发达国家对外提供基础设施领域援助情况  
（单位：百分比）

	社会公共基础设施		经济基础设施	
	1986-1987年	2006-2007年	1986-1987年	2006-2007年
发达国家	25.3	36.7	19.8	12.0
中国	3.2		61.0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商务年鉴·2009》，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4月），2011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第22版。

数据说明：（1）中国数据为纯粹优惠贷款数据，不包括无偿援助数据。

（2）中国数据为截止2009年底的累计数据。

<sup>①</sup> 这方面在非洲比较新的例子就是：给埃及新政府与美国政府“惹出麻烦”在埃及进行“非法”活动的大量美国非政府组织。其中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埃及办事处负责人塞姆·拉胡德就是美国交通部长雷·拉胡德的儿子。其他涉案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全国民主研究院”和“自由之家”的头脑多为前美国政要，这些组织的很大一部分资金也由美国政府提供。详见黄培昭、廖政军等：《美国1.5万NGO撒在全世界》，《环球时报》，2012年2月27日，第7版。

<sup>②</sup> Abdoulaye Wade, Senegal's president, "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se What it Preache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9, 2008.

(二) 有待发掘的巨大合作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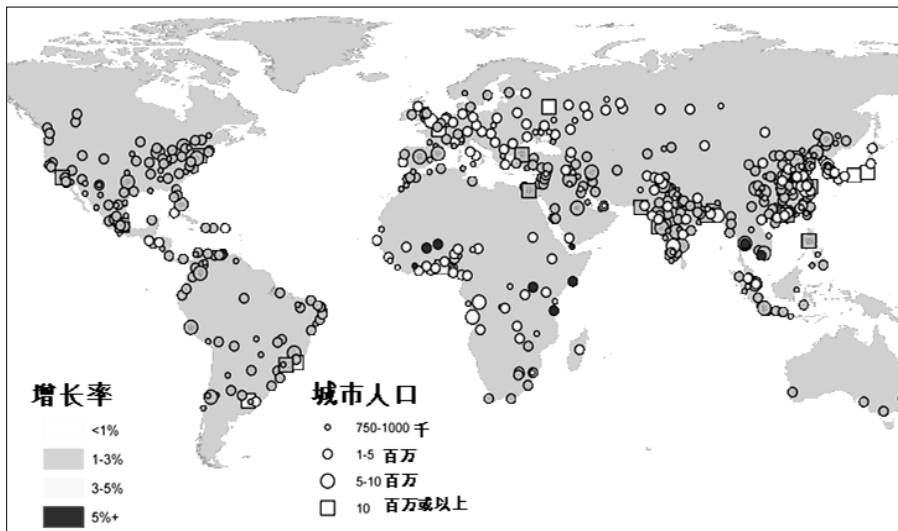
以上种种还只是目前中非在基建方面所取得成就，其发展潜力还颇为可观且有待发掘。这其中的原因有三：

**非洲的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将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基建需求。**

过去的十年，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里有六个来自非洲，其中有八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即便考虑到北半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预测今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为 6%，2012 年接近 6%，基本和亚洲持平。<sup>①</sup>

此外，联合国最新发布的 2011 年版《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说：到 2050 年，亚洲和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长将占世界城市人口总增长的 86%。到 2050 年，非洲的城市人口将从 2011 年的 4.14 亿增加至 12 亿，亚洲的城市人口也将从 19 亿增加到 33 亿，共占未来世界城市人口总增长的 86%（见图一）。报告还指出：因为人口的集中降低了成本，亚洲和非洲城市人口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将为亚非地区提供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新机遇。但同时，城市的就业、居住、能源和基础设施将在减缓城市贫困、贫民区扩大和城市环境恶化等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sup>②</sup>

图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趋势（2011-2025 年）



地图来源：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地图汉化：祝鸣

<sup>①</sup> “Africa rising”, *The Economist*, December 3<sup>rd</sup> -9<sup>th</sup> 2011, p.15.

<sup>②</sup> 详见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国内外形势的紧迫需求使得非洲国家需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地区一体化。

此次席卷全球且仍未消退的金融危机给非洲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不少非洲国家因为和欧洲国家过于紧密的经济关系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经济遭受重创。不少非洲精英对此进行了反思，摩洛哥大学教授 Larabi Jaidi 就指出：马格里布五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只占它们外贸的 1.2%—2%，所以大力推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摆脱北非国家对欧洲经济上过于依赖而导致的风险。<sup>①</sup>

非洲国家虽然近年来在基建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历史欠账太多、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sup>②</sup>所以非洲国家也将继续在基建方面加大投入。至今，非洲国家已经召开了 5 届城市峰会，商讨破解非洲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非洲联盟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将基础设施（包括水、卫生设施、交通、能源和通讯）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2009 年 2 月召开的非盟第 12 届峰会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表明了非洲国家希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愿望。非洲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在努力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2008 年 10 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东非共同体的负责人共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决定三大区域一体化组织共同打造北起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南至南非德班港的非洲南北经济发展走廊。<sup>③</sup>

**得益于中非之间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以及中国的综合实力，中国企业在非洲蓬勃发展的基建市场还将继续大有可为。**

中国目前是崛起的世界大国，非洲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大陆。过去的十年，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里有六个来自非洲，其中有八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

中国基建企业的实力也日渐壮大，具备了从事更多更大国际化项目的的能力。全球最大 225 家国际工程承包商排名中，中国企业从 80 年代初期

<sup>①</sup> Larabi Jaidi, “The cost of ‘non-Magreb’ is too high a price to pay”, *Europe’s World*, Volume 17, Spring 2011, p.119.

<sup>②</sup> 可参考舒运国：《非洲城市化剖析》，载《西亚非洲》1994 年第 1 期；张忠祥：《非洲城市化：中非合作的新机遇》，载《亚非纵横》2011 年第 5 期，第 43 页。

<sup>③</sup> 张忠祥：《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新特点》，载《亚非纵横》2009 年第 5 期，第 53—54 页；张忠祥：《非洲城市化：中非合作的新机遇》，载《亚非纵横》2011 年第 5 期，第 45 页。

的 1 家增加到 51 家<sup>①</sup>（见表三）。过去，中国为非洲建造了坦赞铁路成为一直流传至今的佳话，最近中国为非洲援建的非盟大楼成为一个新的中非基建合作里程碑。

表三：全球最大 225 家国际工程承包商中的中国企业（部分）

序号	排名		公司名称
	2011	2010	
1	11	13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	20	2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3	24	41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4	26	26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5	27	46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6	29	2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7	32	32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	33	5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9	54	89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10	58	79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
.....			
49	219	208	云南建工集团总公司
50	224	224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数据来源：2010 年美国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McGraw-Hill）数据统计。

说明：作者对原表中数据有所删减。

至于中非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非洲国家与人民对中国的高期望与美好感情更成为中国企业开拓基建市场的坚实保证。

<sup>①</sup> 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我国对外经济合作 30 年》，张平主编：《中国改革开放：1978—2008·综合篇（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061 页。

## 二、基建合作的问题及其治理维度：

### 企业、国家与全球治理

有目共睹的是：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来，中国内部的基建成果显著，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到了使西方发达国家都刮目相看、自愧不如的地步。2011 年 1 月 25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国会山发表国情咨文。在提到美国基础设施改造时，奥巴马用多国发展事实强调要想“赢得未来必须重建美国”。奥巴马说：“我们的基础设施曾经是最好的一一但是我们的地位已经下滑了。韩国的互联网建设已经超过我们。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对公路和铁路的建设投入已经超过我们。中国也正在发展更快的火车和更新的机场。”<sup>①</sup>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外开展基建合作面临的各种内外挑战也日益增加且复杂。历史上，中国同非洲国家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这是在民族独立和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一一中国既在思想上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毛泽东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其独立斗争与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在物质上，中国甚至超过当时的国力水平提供了为数可观的援助。这些援助是无私和国际主义的。非洲和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是同样在民族独立斗争和国家建设中相互支持和扶持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具有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后，中国和非洲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变化。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中国发展中国家战略正在经历从“老朋友”到“新伙伴”的转变。<sup>②</sup>

培养旧的感情基础所需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实际需要，中非之间新的感情尚处在发育时期，基础尚未巩固。飞速发展的双边经贸往来固然已成为双方新的利益纽带，同时中国企业和公民部分不检点行为伴随着部分媒体的炒做，反而成为损害双方感情的不确定因素。从较为全面客观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加以分析，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sup>①</sup> President Obama, “The 2011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hite House website*, January 25, 2011, 参见 <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2011/01/26/2011-state-union-address-enhanced-version#transcript>.

<sup>②</sup> 赵干城：《从老朋友到新伙伴：中国发展中国家战略的转变》，俞新天等：《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23—227 页。



### （一）企业的自身治理水平

目前中国作为非洲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已经客观上被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社会寄予了越来越多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更多地为当地创造就业、转移技术、环境保护等。在这些方面，不少中国在非企业还无法满足外界的急迫需要。

例如，就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为例。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一半的非洲人在 20 岁以下，仅仅有 10% 在 50 岁以上。结果是，在未来 10 年里寻找工作的非洲人的数量将以 7% 的速度增长，每年需要 1500 万个工作。失业问题对非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sup>①</sup>但是，目前中国在非企业和贸易在给非洲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 2006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前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由于大量合法和非法中国移民进入非洲，中国人是从非洲人手里拿走更多工作机会而不是为他们创造工作机会”。<sup>②</sup>中国在非洲的某些项目中，新来者引进中国公民从事建筑等非熟练工作，这种做法激怒了赞比亚人。赞比亚社会经济研究院主任、反对党领袖萨塔的支持者奇莱希·穆伦加表示：“我们需要资本，我们需要技术，但我们不需要引进劳动力。”<sup>③</sup>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印度在非洲的公司比中国公司雇佣了更多的非洲本地员工。<sup>④</sup>在 2006 年世界银行所调查的非洲 460 家企业所有者中，几乎一半人是印度裔的非洲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司里只有 4% 是华裔，有 96% 的中国人还保留了自己的中国国籍。在接受调查的印度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大约有一半人的国籍是在非洲。<sup>⑤</sup>这一“本土化”的措施在非洲各国当地失业率往往比较高的背景下，为印度在非洲的形象“添分”不少。<sup>⑥</sup>

---

<sup>①</sup> Nicky Oppenheimer, “Nicky Oppenheimer 'Why Africa will succeed'”, *New African*, July 2007.

<sup>②</sup> Elizabeth Economy and Karen Monaghan, “The perils of Beijing's Africa strateg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November 2006.

<sup>③</sup> 约翰·里德(John Reed): 《中国在非洲形象堪忧》，2006 年 10 月 8 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

<sup>④</sup> Alex Vines and Elizabeth Sidiropoulos, “Africa: 'Quiet' India Could Offer Lessons to Continent”(8 April 2008).

<sup>⑤</sup> Harry G Broadman, *Africa's silk road :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7), 中文概要, 第 17—18、23 页; Harry G Broadman, “China and India Go to Afric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p.99.

<sup>⑥</sup> 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往往给予其在非洲的企业诸多优惠政策，使其具有了不仅相对于非洲本地企业而且甚至对外国竞争者也具有的竞争优势。所以，

## （二）国家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

正如笔者所参与撰写的一份中非关系研究报告所指出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大国期待”正在提高，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大国要求”正在加码，而中国自身的“大国责任”也在增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社会也将更为广泛地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这样，外部世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期望值可能会持续上升。”<sup>①</sup>

因此这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要加强统筹能力和制度建设的紧迫需求。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进入了之前相对封闭的外援、外经等对外经济合作的领域。仅根据一项4年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大约有1000多家，其中有100多家是国有企业，900多家是私营企业（2006年数据）。<sup>②</sup>而根据最新的2011年数据，中国在非企业数量已经飞速发展到了2000多家，<sup>③</sup>在5年时间里就增长了1倍。这些中国企业龙蛇混杂，其中不少企业在非洲存在着劳工、环保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而我们国内的各种监督机制主要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无法对这些企业不良行为进行有限管理，原因包括：一是相关能力力度不够，<sup>④</sup>二是执法不严，三是“天高皇帝远”而鞭长莫及。

因此，中国政府要不断提高宏观的统筹能力（外经、外援、外资、外宣等宏观政策）与微观的统筹能力（具体的企业、个人等）。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才能适应现在中国外交进入了“外交行为体多元多体时代”的现实，防范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政府的“有形之手”

---

非洲本地企业面临中国直接和间接的竞争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可见 Raphael Kaplinsky & Dorothy McCormick & Mike Morris,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Saharan Africa”, *IDS Working Paper No.291* (Brighton, UK: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November 200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pril 2008), pp.126-127.

<sup>①</sup> 李伟建、张忠祥、张春、祝鸣：《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9期，第5—10页。

<sup>②</sup> Mauro De Lorenzo,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Volume 7, Issue 18 (October 3, 2007), p.6.

<sup>③</sup> Shan Juan, “China urged to help African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Daily*, 11<sup>th</sup> May 2011, p.3.

<sup>④</sup> 例如，中国驻非的外交机构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根本无法了解所管辖国内所有中国企业的情况。因此，也很难谈到有效监管。2010年1月和2011年10月，笔者访问肯尼亚期间和中国外交官的访谈。

和市场的“无形之手”应该取得更好的结合效果，使得“优胜劣汰”成为中国非洲经济合作的常态，从而不断优化双方经济合作的质量。

### （三）全球治理及其规范的挑战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政府及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过去在“硬件”方面投入较多，而“软件”方面相对不足。中国政府与企业对蓬勃发展的国际公民社会与不断涌现的各种国际规范还不太了解和适应。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则显得游刃有余且不惜血本。例如，他们在扶植本国和非洲的NGO方面就很舍得“真金白银”的投入。仅荷兰一个小国，在2009年对非洲重要的地区大国——刚果（金）的非政府组织上所投入的资金就达到了4000多万欧元。<sup>①</sup>

中国历来长期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被运用到中国在非洲开展援助活动时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足够理解。中国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的一段讲话被西方反复引用，其中提到：“商业是商业。我们尽力把政治与商业分割开来”。<sup>②</sup>有美国学者就批评：中国借贷给安哥拉大约60亿美元，却没有要求安哥拉在减贫和反腐败等问题上做出承诺，中国更没有在借款一事上和国际援助机构进行沟通，结果这样可能造成安哥拉旧病复发：依旧把大笔援助纳入自己腰包。<sup>③</sup>更有指责认为：那些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纷涌而来从中国获得援助。中国已经成为那些国家的保护伞了，因为他们在中国不会受到西方国家那样的人权标准的压力。<sup>④</sup>

2006年，法国《回声报》刊登了一篇对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的访问，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反响，成为日后被外界引用频率最高的一篇指责中国对非援助的文献。沃尔福威茨表示，中国大型银行无视所谓的“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结果极有可能会恶化非洲的债务形势。<sup>⑤</sup>

<sup>①</sup> 数据来自 Uitgaven NGO's werkzaam op Internationale Samenwerking in 2009 in Dem. Rep. of the Congo（2011年5月9日连接）。

<sup>②</sup> Peter Brookes, “Into Africa: China's Grab for Influence and Oil”,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cture*, # 1006 (March 26, 2007); Howard W French, “Letter from China: Growing Chinese trade with Africa a threa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6, 2006.

<sup>③</sup>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 Policy Brief* No. 47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006), p.6.

<sup>④</sup> Somini Sengupta, “Take aid from China and take a pass on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9, 2008.

<sup>⑤</sup> 《沃尔福威茨说：中国不应在非洲犯法国和美国犯过的错误》，[法]《回声报》

笔者整理归纳了最近 20 多年来, 在非洲具有相当影响和作用的国际规范,<sup>①</sup>发现: 其中几乎全部是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或非政府组织发起并培育出来的(见表四)。津巴布韦前驻华大使就对金伯利进程进行了批评——金伯利进程的原意本来是指对毛坯钻石进出口贸易所实施的一项监管制度, 其目的是为了根除非洲血钻的非法贸易, 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西方国家借此打压不受他们喜欢的津巴布韦, 以此限制津巴布韦的合法钻石出口。<sup>②</sup>

表四: 当前国际贸易、援助的主要新兴机制

机制名称	领域	创始人、国、机构	创立年份	成员数量
公平贸易 (Fair Trade)	国际贸易	Solidaridad (荷兰 NGO) 等	1988 年(第一个商标)	不详
国际刑事法院 (ICC)	国际司法	国际刑事法院 (荷兰海牙)	1998 年 7 月 17 日	60 国(签约)
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公司伦理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	2000 年 7 月	100 多个国家的数千家企业
金伯利进程 (Kimberley Process)	资源开采	南部非洲国家、 联合国等	2000 年 5 月	49 个公司 (涉及 75 国)
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 (EITI)	资源开采	时任英国首相 托尼·布莱尔	2002 年 9 月	17 国(无非洲国家)
赤道原则 (Equator Principles)	金融、环境与 社会保护	世界银行下属的 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 银行	2002 年 10 月	29 个金融 机构(截止 2005 年 3 月)

资料来源: 祝鸣 根据公开资料汇编整理 (2011 年 7 月)。

2006 年 10 月 24 日; 弗朗索瓦·克鲁伊尼奥和理查德·约特: 《世行行长: 中国给穷国贷款忽视人权和环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2006 年 10 月 24 日。

<sup>①</sup> 这些规范大部分属于国际法范畴内的“软法”(soft law)。

<sup>②</sup> 2011 年 3 月 16 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上海召开“中非中津关系与南部非洲区域合作”国际研讨会。津巴布韦前驻华大使穆茨万格瓦(Christopher Mutsvangwa)所做的题为“中非经贸合作与企业责任”的报告。

此外,一些欧洲国家还继续在这些制度上进行“创造”和“创新”,例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于2008年还发起了“布莱尔非洲良政倡议”(The Tony Blair's African Governance Initiative),该项倡议目的在于提高非洲国家领导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sup>①</sup>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国际规范,中国在筹划、实施、履行等各个环节上几乎都没有参与,于是只能面临要么主动拒绝从而被西方扣上“不和国际接轨”的帽子,要么被动加入其中而无法自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 三、政策与建议

总之,中国与非洲在包括基建领域的经济合作的大方向是好的,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和非洲双方之间得到了认可,甚至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点。虽然目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存在着夸大的成分),而且部分西方国家、媒体、非政府组织也不时炒做这些中国还做得不够的地方,但实际上中非经济合作的主流还是好的,大部分非洲国家和百姓还是从中得利的。有非洲领导人则表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非洲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非洲要真正赢得经济上的自主独立,需要与中国进行这种新型模式下的合作。<sup>②</sup>但在一些具体方面还有着可以改进的空间:

#### (一) 宏观外交政策的顶层设计

中国在推动非洲的地区一体化方面,还缺少从非洲全局的层次进行前瞻设计和谋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推动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方面就积极主动地多、手法上也更加成熟、成效也更加显著<sup>③</sup>——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积极借助东盟这个平台,让其发挥地区一体化主导力量的作用,中国作为地区超级大国,甘愿退居幕后,让东盟发挥“小马拉大车”

<sup>①</sup> “Blair Signs Pact With Elumelu Foundation”, *Daily Champion (Lagos)*, 16 June 2011.

<sup>②</sup> 2009年10月28日新华网文章:《专访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中国是真正的朋友》,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28/content\\_12347198.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28/content_12347198.htm)

<sup>③</sup> 早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十二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提议,“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商定《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优先项目,尽早就《中国—东盟海关合作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签署《中国—东盟区域航空运输协定》,构筑互联互通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中方决定将向东盟国家提供的150亿美元信贷中的优惠性质贷款额度增加到67亿美元,加大对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力度。”

相关文献可参考马嫒:《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的意义、成就及前景——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2期;周士新:《中国和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期。

的作用。

非洲有学者就反映：即使在文革那样困难的时期，中国都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坦赞铁路这样贯通非洲多国的大交通项目。但现在这种项目已经几乎没有，这和非洲所急需的地区一体化和次地区一体化进程很不相称。<sup>①</sup>中国政府、企业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仅局限于在非洲各个国家内部的国家建设层面，还应把眼光放到更高的次地区与整个非洲地区层面，通过建设一些跨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助推非洲的一体化建设。

## （二）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

大多数中国企业目前在非洲还只是勤恳的“老黄牛”，少数不良企业的行为则被大大放大。中国企业应该更重视国际交流和对话，从而在国际社会中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中国目前在非洲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奉行单边主义，即自己“独干”的比较多。目前对中非关系的诸多国外研究，由于中国相比于非洲的强势地位，于是诸多研究往往放在中国对非洲的影响上，并且这些研究往往一边强调非洲是个“无辜/无知的受害者”，同时淡化非洲与中国在飞速发展的中非关系中是个“互利共赢的伙伴”。<sup>②</sup>中国的这种“干多说少”的作风，实际上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客观地被外界所认识。

美国著名学者、“软实力”学说之父约瑟夫·奈所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但在信息时代，成功则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sup>③</sup>一位驻非的中国高级外交官曾经这样形容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中国总被看成是一头大象，当大象来的时候，人们往往感到恐惧。而实际上，中国人只是普普通通的商人。”<sup>④</sup>所以中国的政府、企业、个人在对外经济合作时应该考虑结合实际情况，注重和非洲当地企业和西方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合

<sup>①</sup> 2011年3月16日，津巴布韦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SARDC) 副主任 Munetsi Madakufamba 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所召开的“中非中津关系与南部非洲区域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题为《Some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的论文。

<sup>②</sup> 袁武：《21世纪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建构——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9期。

<sup>③</sup> Joseph S. Nye Jr., “Power Shifts”, *Time*, 9 May 2011, p.23.

<sup>④</sup> Alec Russell, “China's Jisco takes model approach to African project”, *Financial Times*, 2 August 2007.

作，这样可以减少外界的批评，树立中国开放自信的形象。

### （三）主动应对国际规范的挑战

近年来，中非经济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期，中国在非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安全、社会风险等也在同步上升。中国基建企业在非洲开展基建项目方面，无疑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但中国企业也需要善打“组合拳”——充分利用基金会、智库等从事风险评估、政策宣传、公益慈善等关联活动。正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你要走得快，就自己走；你要走得稳，就一起走。”中国企业在对外合作方面既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劣势。一切都“大包大揽”，往往被人借题发挥、遭人批评。最近就因中国公司承接了部分基础建设工，美国制造业联盟抱怨连钢材都要从中国采购，因此给加州政府兴建的新海湾大桥贴上“不爱国”标签。<sup>①</sup>

中国目前的对外援助好事做了不少，但有时往往不为外界所客观认识。不少中国企业在外界从事了不少公益事业，但很少得到外界的宣传和了解。这其中固然有我们政府、企业国际公关能力还相对不高的原因，但也有这些零敲碎打的公益活动的资源还没有得到集中使用，因此影响还局限在当地，而无法为中国企业的国际良好形象“加分”较多。中国可以逐步借助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乃至非政府组织，利用政府或企业的援助/公益资金集中使用设立有影响的国际性奖项。例如，国际知名品牌、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设立了欧莱雅基金会，并且在 1998 年设立妇女与科学奖。目前共有 72 位女性获奖，她们在科学方面的创新使全球受益。目前，每名获奖者可获得 10 万美元奖金。<sup>②</sup>这样借助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形式的公益/援助的国际宣传效果比较好（比单纯在受援国当地做公益慈善活动），而且通过这种“借船出海”的双边/多边方式也能减少西方批评的借口和理由。

此外，也可逐步探索通过学术研究的途径，让外界了解中国援助企业的活动。中国学术研究机构 and 国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国家/组织）开展联合学术研究，发表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中国援助等客观积极的评估报告，这种的国际联合研究，不仅可以有更高的国际可信度，也可以让更多的相关行为体帮助我们宣传中国在非企业的全面、客观和积极的形象。

（责任编辑：周生升、孟维瞻）

<sup>①</sup> 吴成良：《中美基建合作是大势所趋》，《人民日报》，2012 年 4 月 10 日，第 3 版。

<sup>②</sup> 可参祝鸣：《慈善也是一种软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 年 10 月 20 日，第 21 版。



## 探析袁世凯的国际法观 ——以“二十一条”签订为例

许子兰\*

袁世凯在与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因最终与日签约而备受诟责，甚至被视为“卖国”。但本文通过探究“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及结果，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格局下，“二十一条”的最终谈判结果——《中日民四条约》，实为袁世凯政府做出的最大外交努力。袁世凯对国际法“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态度则始终贯穿并指导着整个谈判过程，他一方面很重视国际法的规定与运用，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受限于国际法，认为国内法地位要高于国际法，这尤其表现在《民四条约》签订后，他对其种种“阳奉

---

\* 许子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阴违”的抵制，而这恰被日本看作是违反国际法的表现，并埋下了日后的隐患。同时，他的这种法理和人治相结合的国际法观念，也是当时“国民外交”的特殊产物，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外交谈判的筹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国际法的合法性空间。

## 一、与日艰难谈判“二十一条”， 不敢小觑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未事先通知中国政府就强行登陆山东龙口时，袁世凯的应对措施即反映了他对国际法的矛盾态度。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急忙召集会议，与会人员是所有内阁部长和三个参事。这三个参事，一个是曾就学于牛津，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的伍朝枢；另一个是曾留学日本的金邦平；再就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虽然有两位法学家明确提出，中国为了尽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然而当袁世凯从陆军总长段祺瑞那里了解到中国军队只可抵抗四十八小时，他“深深叹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他以为国际法是人制定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sup>①</sup>袁世凯聘请很多国际法专家，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可见他并非顽固不化、毫不重视国际法，只是在他看来，法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下已大打折扣；而且他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也使它很难理解为何要按照一套通用的国际惯例与准则行事。

作为幕后的真正谈判者，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袁世凯）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sup>②</sup>。在“历时84天，经过25次正式会商和20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120页。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1页。

次非正式会商”<sup>①</sup>的谈判过程中，一方面他故意使用“拖延”计谋，另一方面，他又务实、理性地全力与日周旋。

从整个过程和他的谈判策略来看，袁世凯对待“二十一条”是相当谨慎的。“他首先确定谈判的方针是正视劣势，认真应对。并定下了应对的方针：一个“拖”字，逐条逐项谈，争取最小损失。”<sup>②</sup>他指示外交部尽量拖长谈判时间，因为日本提出秘密交涉，袁世凯希望延长引起欧美的注意，争取国际干涉。他任命陆征祥取代孙宝琦担任外交总长，并交代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以达“尽量拖延”的目的。对此，陆征祥心领神会，想了很多拖延时间的妙招。<sup>③</sup>

他本人对条款也相当重视，亲自对“二十一条”作了逐条的批示。对“二十一条”中侵犯中国主权最多的第五号<sup>④</sup>，袁世凯曾多次手批：“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其第五号姑不议”；“五号必须声明不议”等，对第五号条款，要求在谈判中坚决不予讨论。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sup>⑤</sup>中国谈判代表“始终坚持以尊重中外成约、不损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违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为原则进行谈判，对日本所提各款要求再三辩驳”，<sup>⑥</sup>且每次谈判后都要向他汇报，并听取下次谈判的指示。

整个谈判过程历时三个多月，虽有袁世凯故意“拖延”的计谋，但也

<sup>①</sup>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

<sup>②</sup> 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sup>③</sup> “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然后侍者清理桌面，摆上茶点，又需中断三十到四十五分钟。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总长习惯于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总长言语，又需请他复述一遍。遇有困难时，陆总长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1页。

<sup>④</sup> 第五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详见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案，北洋政府外交部黄皮书《中日交涉始末》，转引自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页。

<sup>⑤</sup> 参见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编《北洋军阀档案史料·袁世凯卷》（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333页。

<sup>⑥</sup>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反映了他务实、理性的态度。袁世凯让其秘书曾叔度，前往其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处研究日本宪法。“他现在所想知道的，乃是外交真正决裂后，大隈应取何种态度，他能否奏请天皇即日派兵来中国。依日本宪法，天皇必须依他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此。”<sup>①</sup>他还派有贺长雄赴日摸清日本底牌，“二十一条”中最狠毒的是第五条，袁世凯派其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赴日联络日本元老，在得知日本其他元老对第五号条款亦表不满，袁世凯要外交部坚持在第五号条款上不要让步。

而且，他还内借民族主义力量，外求“以夷制夷”，增加谈判筹码。在他的授意下，中国的谈判代表将会谈情况故意泄露给国内报馆，希望用民气来削弱日本政府的立场，为政府交涉提供凭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力量历来是个双面刃，袁世凯虽企图利用公众舆论来向日方施压，但也担心激怒日本，或给国内反对力量落下话柄。事实表明，袁世凯动员起来的这股反日情绪，也几乎使他“玩火自焚”。另一方面，顾维钧、陆征祥等人以隐讳的方式将“二十一条”和会谈情况向英美等国家传达；又通过莫理循等将情况向英美新闻媒体透露。从而给日本方面造成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从袁世凯政府谈判的各种细节可看出，他们确实是在弱国外交的背景下已尽最大努力。他任用国际法专家，他重视谈判的每一细节，说明他还是寄希望于条约、协定的法律效力的。从“二十一条”艰难的谈判过程来看，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在签订条约后他亦痛心疾首地认为是“奇耻大辱”，要奋发图强，“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sup>②</sup>。

## 二、《民四条约》≠“二十一条”，

### 实为袁世凯政府艰难谈判的外交成果

在三个多月的会谈中，中方严格按照袁世凯的指示与日本交涉，远非一味让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的拖延相当不满，日本外相致电日置益称：“欲使中国政府轻易承诺我方认为最关重要之条项，殆已全无希望。”终于失去耐心的日本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收到最后通牒

<sup>①</sup> 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4页。

<sup>②</sup>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21页。

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sup>①</sup>为避免开战，乃接受日本条件。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sup>②</sup>

5月25日，陆征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所签条约“严谨之学术用语，应为《民国四年（或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可简称为《中日民四条约及换文》、《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及换文》，或可再简称为《一九一五年中日协定》、《中日民四条约》或《中日北京条约》等”。<sup>③</sup>《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sup>④</sup>相比较，危害最大的“第五号条文除福建一款外全被取消”；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sup>⑤</sup>

<sup>①</sup>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洋军阀 1912—1928》卷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821—822页。

<sup>②</sup> 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sup>③</sup>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sup>④</sup> “二十一条”共五号，一号共四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线的铁路等。二号共七条，要求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第五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详见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案，北洋政府外交部黄皮书《中日交涉始末》，转引自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页。

<sup>⑤</sup> “二十一条”与《中日民四条约》相比较，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袁政府确实通过各种策略的运用使中国的损失减少了很多。华盛顿会议时，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指出“《1915年之条约及换文》，每多谓为‘二十一条要求’，实与事实不合，且属极大之舛误。照此名词，皆以为日本力持原来之全部提案及中国接受其全部。实则日本之第一次提案中，除第五项外，尚有数条，业经完全取消，或大加修改，以应中国政府意愿，然后草就最后提案，交与中国而请其承受。”<sup>①</sup>

但是对国民来说，绝不会因为谈判过程的各种曲折艰辛而对袁世凯政府有所谅解。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直给国民留下了屈辱的烙印，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民国时期，这股悲情的爱国意识更容易被鼓动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也是所谓“国民外交”<sup>②</sup>在北洋军阀时期尤其显著的原因之一。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许多地方群众集会，向袁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惩办陆征祥和曹汝霖，称他们为“卖国贼”。不能否认《民四条约》也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彼强我弱”的实力对比下，任何一个理性而负责任的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争取将丧权辱国之条款降到最少，否则无力抵抗却盲目开战，只能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正如顾维钧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有百分之百的成功……”。<sup>③</sup>蒋廷黻也评论道：“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sup>④</sup>而“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sup>⑤</sup>事实上，袁世

---

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sup>①</sup>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sup>②</sup> 所谓“国民外交”是指“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罢工排货、通电宣传、示威游行等压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实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国家对外关系的趋向”。参见王立成：《中国历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sup>③</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6—397页。

<sup>④</sup> 蒋廷黻：《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大公报》，1933年9月18日，第3版，转引自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sup>⑤</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8页。

凯对《民四条约》的种种抵制，这股人民大众的压力正起了催化作用。

### 三、签约后的抵制与力求废除，国内法地位高于国际法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目的在对已获取权益要求肯定，及未获权益的进一步扩张。但《民四条约》签订后，日本人不仅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限。袁世凯制定了很多新的法令措施使《民四条约》形同废纸，《惩办国贼条例》规定“私与外国人订立契约，损害本国之国家权利者，处卖国罪，死刑”，“召开中日满蒙条约善后会议，确立东部内蒙古范围，并预先规划相关配套法令及措施，力图将日本在南满、东蒙所得权利尽可能限制于最小范围”。<sup>①</sup>而且还充分利用各种行政手段来抵制日本，袁世凯曾对其秘书曾叔度说道“(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sup>②</sup>曾任袁秘书的曾叔度在忆及此事时引日人言：“我等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民间持续抵制日货，东北张作霖也颁布各种法令限制日本特权。<sup>③</sup>而日本认为，“中国所拟之警察法令与课税须与日本协议后始为有效”，因此对中国限制日人权利的法令与条例均不承认。日本对张作霖漠视日本在满蒙条约上之利益，称之为“违反条约”，或“漠视条约”，<sup>④</sup>无法容忍之。这也为后来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患。

1923年旅顺大连租约到期，国会议决废止《民四条约》，但日本坚持该约有效，引发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何者优先的法理争议。中国否认该约之合法有效，依据“公理正义”、“情势变迁”与“武力胁迫”<sup>⑤</sup>等原则，屡

<sup>①</sup>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sup>②</sup> 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sup>③</sup> “日人尝胁迫霖履约（《民四条约》），作霖不应，急饬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厥后日人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由是二十一条等于废纸矣”金毓黻：《张作霖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45页，转引自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sup>④</sup>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sup>⑤</sup> 同上，第173页。

次在国际会议要求废止。但是法理基础不够充分，日本坚持条约有效，英美也只能对日妥协。法律途径有其限度，中国只有改走法理之外的途径。

#### 四、结语

清末国际法传入中国，中国从完全排斥、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引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再到因不平等条约而对国际法产生质疑等，袁世凯务实的国际法观念也是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一方面，他大批任用国际法专家，寄希望于更好地与国际对话，并在国际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列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不完全依赖于国际法，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袁世凯，甚至将国际法理解为“人治法”、“中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国际法”，即国内法明显要优先于国际法，袁世凯对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大加抵制，即体现了他法理和人治相结合的国际法观念。同时，“国民外交”的风起云涌和革命党人的反对，也“催化”了袁世凯的“爱国”情操——“消极执行”甚至阻碍条约实施，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外交谈判的筹码，也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国际法的合法性空间。但对日本方面来讲，这无疑是违反国际法的表现。

不过反观近代国际法，秘密外交、以战争为胁迫等强权外交已成当时国际法中的惯例，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威尔逊主义的出台，才逐渐改变了国际法原有的观念。“弱国无外交”，袁世凯或许早就看透这一点，国际法终归“可恃，但犹不足恃矣”。

（责任编辑：李洋、孟维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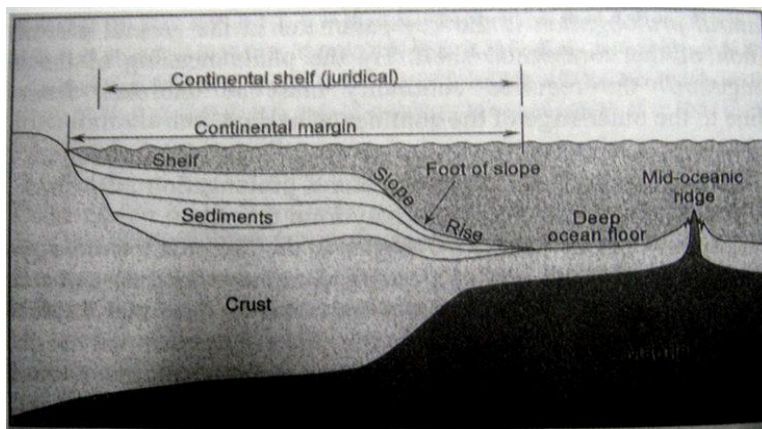
# 海洋法历史与实践中的大陆架法律制度 与中日东海划界问题

李洋\*

## 一、 大陆架法律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 1. 大陆架的地理概念

大陆架原是地质地理学上的概念，指的是从大陆陆块向海扩展的水平狭长台架。<sup>①</sup>在地理学上被视为陆地延伸并被海水覆盖的浅海地带。<sup>②</sup>在下图中被标为陆架（shelf）。现在一般认为这是对大陆架的狭义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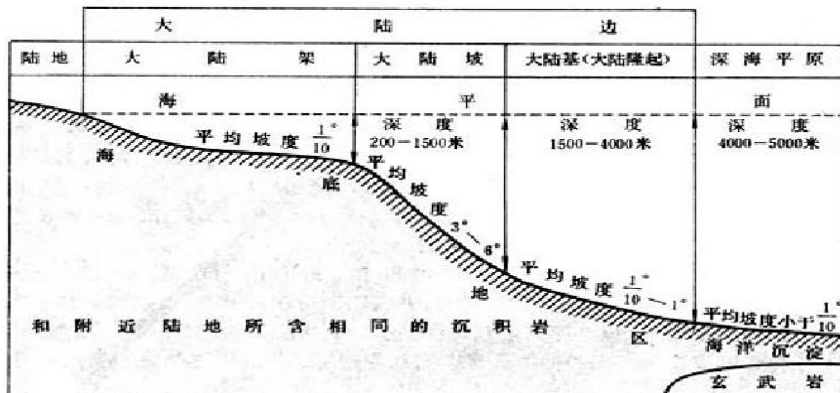


\* 李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李永晶老师、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李令华研究员、外交部条法司马新民参赞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文章观点及文中错漏之处完全由笔者个人负责。

① 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60 页。

② 薛桂芳、胡增祥著：《海洋法理论与实践》，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7 页。





大陆架示意图

## 2. 《杜鲁门宣言》与大陆架法律概念的起源

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各国开始为开发利用大陆架上的定居鱼类而宣布其对大陆架的控制权及主权。<sup>①</sup>

一般认为，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9月28日发布的第2667号《美国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自然资源政策的公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大陆架资源为沿海国所有的观念，<sup>②</sup>为大陆架方面实体法的起点。<sup>③</sup>

该宣言宣布，“鉴于养护和审慎地利用其自然资源的紧迫性的关心，美国政府认为邻接美国海岸处于公海之下的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归属于美国，并受其管辖和控制。”<sup>④</sup>同日，白宫新闻处宣布大陆架的范围自海岸至100呎（等于183米）的海底。<sup>⑤</sup>

这一公告被视为全球范围内对大陆架提出权利主张的里程碑，许多其他国家也相继发布了类似的声明。在后来的十年中，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国家实践在这一没有其他国家反对的领域里发展起来了。这是一条新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形成的经典案例。

《杜鲁门公告》措辞审慎，极力避免提及主权，只是提出对资源的管辖权。它集合了当时各方零散的意见，通过地理邻接原则，在国际法上代

<sup>①</sup> Tomas H.Heidar:《大陆架界限的法律问题》，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8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将《杜鲁门宣言》称为“为大陆架方面实体法的起点。” ICJ Rep.p.32.para.45.(February 20,1969)

<sup>④</sup> Shigeru Od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Ocean Development, Basic Documents,PP.341-342,1972.

<sup>⑤</sup> 转引自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替靠近领海的公海水、海床和底土，建立起新的法律概念；指出了开发大陆架资源的技术能力以及对这些资源建立公认的管辖权的必要性，并宣布实施这种管辖。

### 3. 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创设——1958年《大陆架公约》与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急速发展的近海石油工业彻底打破了传统公海自由制度坚信的所谓资源不可能枯竭的假设，使得各沿海国顿生对大陆架资源的危机感。随着技术进步，控制领海界限外的大陆架资源所带来的利益增加了，因而也带来了海洋法的迅速发展。

《大陆架公约》是被 1958 年日内瓦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采纳的四项公约之一。公约指出，沿海国具有以勘探和开发大陆架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性权利。第一条明确大陆架谓：“邻接海岸但在邻海以外之海底区域之海床及底土，其上覆水深度不逾两百公尺，或虽逾此限度而其上海水深度仍使该区域天然资源有开发之可能性者。”<sup>①</sup>这包含有两项标准，即 200 米水深标准和可开发性标准。第六条规定了争端具体解决的办法——“中间线”，及两个常被忽略的必要条件：同一大陆架和非特殊情况。

由于与发展中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相联系，这个定义可伸缩性极大。正如国际法院法官 Oda 在“突尼斯/利比亚案”中的长篇反对意见所言：“因此不言而喻地，根据《1958 年大陆架公约》全世界所有海底区域都被沿海国瓜分了。”<sup>②</sup>

1958年公约有51个缔约方，因此偶尔依据争端双方均为公约缔约方的事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sup>③</sup>就相向或相邻国家大陆架区域的划界而言，国际法院及其他国际法庭从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判决开始逐步确立起国际习惯法。

1969年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将自然延伸概念正式地引入到大陆架法律制度中，并将其作为沿海国对大陆架的唯一权利基础。“比邻近概

<sup>①</sup> 维基百科大陆架公约条目，<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9%86%E6%9E%B6>。（最后上网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

<sup>②</sup>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a/Libya Arab Jamahiriya)1982.ICJ Rep. 18(February 24,1982) ( hereinafter Tunisa-Libya,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Oda, para.46.11. 转引自 David A.Colson:《大陆架原则之简要回顾》，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310 页。

<sup>③</sup> 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等译：《国际公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90 页。

念更加重要的似乎是“……领土的自然延伸或延续原则……”。<sup>①</sup>大陆架的权利基础如今被视为地理标准，而并不依赖诸如占领或有效控制。

国际法院在该案中明确指出：“国际法之所以在法律上赋予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有关海底区域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该沿海国已经拥有统治权的领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区域虽被海水覆盖，但却是该国领土的延伸或继续，即其在海下的发展。”“划界应通过协议，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以使每一个国家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向海中和海底自然延伸的全部大陆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另一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sup>②</sup>

####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的出现

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除引文和小标题外均简称为《公约》）中设立的新制度，是由各国在实践中建立的“专属渔区”和“渔业养护区”概念和非陆缘国对大陆架资源开发的利益发展而成的。

1930年前，渔业管辖权一般作为领海主权的一部分。1930年以后，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扩大了渔业管辖范围，建立专属渔区。如1938年巴西颁布《渔业法案》建立12海里的专属渔区；1934年厄瓜多尔为了渔业目的宣布15海里领海。渔业养护区最早是美国于1945年紧随第2667号著名的《杜鲁门公告》，在第2668号《关于公海上某些地区沿海渔业的美国政策》总统公告中提出的，该宣言规定“在美国公民惯常捕鱼的地区，美国有权建立保护区。……邻接美国沿海的公海区域内的一个养护区……属于美国管理和控制。”<sup>③</sup>

其后不久，没有自然意义上的真正大陆架的南美洲国家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更进一步于1952年发表了《圣地亚哥宣言》。他们宣布了对自其海岸200海里距离内的海底和底土的完整主权及其上覆水域和上空的主权。<sup>④</sup>但这遭到其他国家的普遍反对，并没有构成有效的国际习惯法。在实践中，专属经济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主要是一个上覆水域的

<sup>①</sup> 196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三卷），第31页，转引自Tomas H.Heidar:《大陆架界限的法律问题》，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9页。

<sup>②</sup>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sup>③</sup> 转引自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

<sup>④</sup> Tomas H.Heidar:《大陆架界限的法律问题》，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8页。

渔业权利。

60年代数十个亚非国家获得独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在政治上与其他国家同处平等地位，在经济上真正独立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们反对实行“海洋自由”原则，主张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进行国际管制，并应造福于全人类。

而同时，拥有宽大陆架的国家深受1958年《大陆架公约》可开发性标准的鼓舞，又得到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对“自然延伸”的确认，其拥有一个极宽无比的大陆架的野心简直没有任何约束，随着深水钻孔技术不断发展提高，其野心不断得以实现、备受鼓舞。一个显然的趋势是，新技术将把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越来越远地向外扩展，并且最终导致沿海国将整个海底宣布为其所拥有的大陆架。因此大陆架的外部界限问题与超出大陆架外的深海海底之间的关系也急需规范。

尼克松在1970年联合国大会讲话时坦言，“海洋是否将合理而公平地用于为人类谋福利；或者说，是否将成为毫无节制的开发和据以提出各种相互冲突的管辖权主张之场所，在这样一场角逐中，即使是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国家也免不了成为被损害者。……明显的事实是，海洋法已不适应现代技术要求，无法解除国际社会的忧虑，冲突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当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各国管辖范围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宣称“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底，洋底和底土……是人类共同的财产。”<sup>②</sup>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决定于1973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召开的十年间，由拉美国家积极主张，并通过国内立法不断确立，以非洲国家为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此起彼伏，各类主张层出不穷。1972年加勒比国家通过《圣多明各宣言》，提出建立200海里“承袭海”（Partrimonial Sea），沿海国对该区域内的水域、海床及底土中的一切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从1972年肯尼亚非洲国家海洋法问题讨论会到1974年，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向海底委员会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提出的关于专属经济区（这个名称很快被普遍接受）的条款草案不下7个。这些条款草案互为补充，实际上包含了后来规定在

<sup>①</sup> 袁古洁著：《国际海洋划界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sup>②</sup>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ble Resolution 2749(X X V) of Decemeber17,1970,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and the Subsoil Thereof,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 Jurisdiction.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基本组成要素。

但陆缘国（marginuer）一方面不放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一方面却又强调他们拥有的多处延伸至200海里界限外的大陆架权利，是为其主权所固有的。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其外部界限的具体位置，但他们认为，作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结果的任何公约都不绝应在这个方面后退。由于其中包含了许多强国，如果新的《海洋法公约》想要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就必须考虑这些国家的利益。<sup>①</sup>经过11轮激烈而复杂的谈判，两个集团之间达成了一项折衷协议，大陆架权利制度与专属经济区权利制度、自然延伸原则和距离原则、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与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都被写入了《公约》。就形成了大陆架权利制度与专属经济区权利制度的复杂关系，从纵向的权利内容上讲，包含大陆架权利制度；从横向的权力范围上讲，与大陆架权利制度存在重叠关系。专属经济区是需要宣示的，其权利基础是临近和实际控制；而大陆架的权利基础则是固有的，是地理的。

总的来说，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两种制度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实践上，尤其是在现代国际法中，无疑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大陆架权利制度与专属经济区权利制度的相继出现，是海洋自由与封闭海洋、陆地与海洋、人类与自然关系在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的具体表现形式。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都是基于陆权的海权，两者其实都属于与“海洋自由”传统相对应的“封闭海洋”“海洋占有”传统。笔者认为这种基于陆权的海权更应说是陆权，在现时代，随着人类能力与技术的增长沧海变桑田，早已绝非“天下的水要聚于一处”的自由海洋，在具体划界中需要借鉴陆地划界的一些做法。

海洋权益，除了资源的占有，更重要的，是权利，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大国，其利益必然遍及全球。占有其实是次要的，影响才是主要的。那个大国利益心心相系的自由海洋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洋上，要做大国就要有点舍命开荒的大国意识。

### 5. 以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为标志的习惯法认定的新变化

《公约》对大陆架法律制度做了新规定，“沿海国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架边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

<sup>①</sup> 被认为属于这组的国家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冰岛、爱尔兰、马达加斯加、新西兰、挪威、斯里兰卡、英国及委内瑞拉。美国和苏联也曾积极参加该组国家的活动。

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sup>①</sup>《公约》正式确立了自然延伸原则，引入了200海里距离基准。

关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公约》第83条第1款规定：“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规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sup>②</sup>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中公平概念即“公允与良善”之原则。公平原则主要是由国际法院在仲裁机构的帮助下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sup>③</sup>

大陆架界定方面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200海里之内的海底区域，现在似乎已经并入了专属经济区之内。在该区域内，专属经济区原本是有关渔业的概念，也已经把开采底土矿物资源包括在内。而就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是哪种制度——大陆架还是专属经济区——用于规范沿海国在200海里区域内，对矿物资源的勘探和开采。<sup>④</sup>

国际法院1982年在突尼斯/利比亚案中谈及《海洋法公约草案》第76条第1款时指出，该款包括两个部分，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标准。“按照该款第一部分，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是主要标准。在该款第二部分，200海里的距离在某种情况下是沿海国的权利基础。因此，建立在‘台地’(species of platform) 基础上的大陆架的法律概念就被这一标准修改了”，就“距离在某些情况下是沿海国的权利基础而言，它摆脱了自然延伸是唯一的权利基础这项原则”。<sup>⑤</sup>1984年加拿大在缅因湾案中主张自然延伸只有在200海里以外才具有实际的相关性，距离原则是渔区和专属经济区惟一的权利基础，是200海里以内的大陆架的充分的权利基础。<sup>⑥</sup>但这一主张被国际法院分庭看成是加拿大试图把等距离变成一项真正的法律规则而加以拒绝。

<sup>①</sup> 新华资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目，第VI部分，[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04/content\\_2784208\\_6.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04/content_2784208_6.htm)。（最后上网时间2012年4月22日）。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国际法院的判例包括：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1982年突尼斯/利比亚案、1984年缅因湾案、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1993年扬马延案、2001年卡塔诉巴林案、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仲裁法庭的判例包括：1977年英法大陆架案、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1992年加拿大/法国仲裁案和1999年厄立特里亚/也门仲裁案。

<sup>④</sup> Shigeru Oda:《从国家实践角度检视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命力的疑问》，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一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sup>⑤</sup> 《国际法院突尼斯/利比亚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sup>⑥</sup> Canadian Memorial, para.294 或 Canadian reply, para.375. <http://www.marineservices.gc.ca/eng/menu.htm>（最后上网时间2012年4月22日）

①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的仲裁法庭认为“距离……规则没有违背自然延伸规则，但却……缩小了它的范围。因此，存在着两个规则，它们之间没有先后之分”。②

在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中，利比亚认为自然延伸是大陆架的权利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主张，由于划界地区存在的一个包括一系列深达100米以上深海槽的“断裂区”(Rift Zone)构成了两国大陆架之间的根本中断，因此该案应当按照该根本中断的一般方向划界。③另一方面，马耳他不仅否定该根本中断的存在，而且主张尽管自然延伸的说法仍是对的，但已不再根据自然和地质特征来界定这一概念，而是用对海岸的一定距离来界定它。因此，“现在可以从自然延伸的法律概念，主要是从海岸的距离中找到大陆架权利的法律基础。”④邻近和距离成为了大陆架的权利基础。这样，国际法院在该案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根据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对海洋法的发展来阐明大陆架的权利基础。

国际法院明显无意对两个互相对抗的自然延伸论据做出判断，法院并没有直接解释第76条，也没有破坏对“北海大陆架案”中形成的原则。国际法院首先强调“法律是不断变化的……就目前而言，海洋边界一般在200海里范围内划定……专属经济区是规定边界自然延伸、地理地貌特征的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⑤接着从考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关系入手，认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两种制度在现代国际法中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可能会有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大陆架，但却不可能没有相应大陆架的专属经济区”。⑥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大陆架的概念已为专属经济区所吞并，但这确实意味着必须对从海岸量起的距离这种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两个概念所共有的因素赋予更重要的意义”。⑦

① 《国际法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② 《国际法院利比亚/马耳他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③ 同上，第182页。

④ 同上，第174页。

⑤ David A. Colson:《论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之间外大陆架化解问题》，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9页。

⑥ 《国际法院利比亚/马耳他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⑦ 《国际法院利比亚/马耳他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法院在稍后明确表示：“至少只要这些区域是位于从有关海岸量起200海里以内的，作为大陆架而提出权利主张的任何海床区域，其权利只能依据提出权利主张的国家从其海岸量起的距离来决定，而这些区域的地质或地貌特征是完全无关紧要的。”<sup>①</sup>这样，国际法院对自然延伸原则的态度就从1969年将其作为大陆架的惟一权利基础，到1982年作为大陆架的主要权利基础，转变为1985年的由距离标准代替自然延伸成为200海里范围内大陆架的权利基础。此案的判决也就将我们带入了等距离法盛行的判例时代。自然边界论据逐渐消亡，法庭上各方不再强调以往案件中司空见惯的地质、地貌类型的论点。而每当法院援引其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判决时，它总是先说明200海里内的划界情形与200海里以外外部大陆架划界情形是不同的。<sup>②</sup>那时等距离法在判断基于距离而形成的海岸200海里内区域的权利主张争端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sup>③</sup>

但国际法院并不想把自然延伸这一概念从大陆架权利制度中排除出去，在200海里内，通过改变自然延伸的内涵将其同距离标准结合起来。法院指出，尽管“由于法律和实践的原因，距离标准现在必须应用于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但“这并不表示自然延伸的概念已经为距离的概念所代替，它只意味着在大陆边没有扩展到从海岸量起200海里的地方。自然延伸，不论在其整个历史发展中怎样由最初的自然状态变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法律概念，其内容部分是由从海岸量起的距离决定的，而与下面的海床和底土的自然性质无关。因此，自然延伸和距离这两个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两者都仍然是大陆架法律概念中的基本要素。”<sup>④</sup>在近二十年的13个划界案例中，其中有4个不涉及大陆架或共大陆架，而有7个根据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做了调整。

<sup>①</sup> 同上，第185页。

<sup>②</sup> David A. Colson:《论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之间外大陆架化解问题》，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9页。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国际法院利比亚/马耳他案判决书》，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 二、 中日东海划界

### 1. 我国划界情况与东海

除与印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划分已全部解决，多数地区的边境勘察和立碑工作也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但不管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还是 90 年代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视角观察，基本应视为一政治事件，其解决是在特定政治形势背景下，以特定政治任务为指导完成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条约对象国继承和使用了英法俄等国遗留的大量条约和相应的国际法条文。在海洋划界方面，目前中国没有与任何一国就两国海洋权益和划界达成完全协议。就地区海域而论，也仅与越南就北部湾海域达成协议。但相比陆地划界，我国海洋划界有着远为有利的条约基础和科学依据。具体到东海问题，邓公八十年代花血本大搞海洋调查，到今天，可以说我们掌握的水文、地质、化学等海洋资料数据之周密翔实，已经不弱于日本。今天可以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全是靠人命和金钱堆起来的实力后盾。

东海是一片由中、日、韩三国领土环绕形成的半封闭海域，西接中国、东邻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北濒韩国济州岛，和黄海相连，以台湾海峡与南海相通。海域东西宽 260~520 公里，南北长 550~750 公里，总面积约 77 万平方公里。海底地貌主要包括大陆架、大陆坡、冲绳海槽和琉球西侧岛坡等 4 个部分。东海大陆架东西宽 167~360 公里，面积约 54 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约 70 米，最深处为 140 米，占东海总面积的 72%。中日东海划界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琉球群岛相向海岸之间进行，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中日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部分重叠。

### 2. 相关研究综述及中日划界立场

我国学人关于中日东海划界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可能由于口径限制，多数研究应景而生，毫无价值可言，误导性较大。目前最重要的研究是赵理海先生卸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后于 1984 年通过其著作和文章阐述的东海划界六点原则。<sup>①</sup>这基本也是我国东海划界磋商的官方立场。但由于，

<sup>①</sup> 赵理海先生提出的东海划界六点原则：1.大陆架应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通过有关国家的协议来划定；2.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础；3.等距离中间线是用以划分大陆架区域的一种简便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更不是主要方法；4.海岸的长度是测算一国大陆架权利的一个客观标准；5.冲绳海槽是中国大陆架与日本岛架的天然分界线；6.在以往的国际实践中，面积很小的小岛或岩礁对划分大陆

国际法的性质,无论从国际法的起源还是其实际运作的特点来看,都属于英美普通法系的判例习惯法。虽然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现,为海洋法增添了成文法的性格,但总的来说,海洋法依旧偏向于英美普通法系的判例习惯法。这是我国海洋法学界疏于认识的一点。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赵理海先生观点提出一年后,1985年海洋法庭利比亚/马耳他案判例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了新的习惯认定,且此习惯认定得到后续判例的广泛征引。近年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李令华研究员对此一国际法新趋势做了大量引介。<sup>①</sup>由此引起的学术争论增强了我国相关学术研究的学术性和实用性。<sup>②</sup>部分注重案例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开始在文章理论部分予以论述。近年来,部分在国外受过教育的青年国际法学者,如中国政法大学的高健军、清华大学的张新军,他们的论文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强调自然延伸作为其大陆架权利基础,明确提出其东海大陆架延伸至冲绳海槽,冲绳海槽构成大陆架天然分界线。强调公平原则作为其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主张。

日本外务省则在2006年11月发表的《我国关于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中,反驳中方并全面阐述其法律立场。<sup>③</sup>日方在其“立场”的第2条之(2)指出“……自然延伸理论曾在1960年代时的有关相邻国家划定大陆架界限的判例中被使用,是过去的国际法中所采用的观点。如果按照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及其后的国际判例的话,在相向国家之间距离不足400海里水域的界限划定问题上,自然延伸理论没有被认可的余地。并且,冲绳海槽(海底的沟)那样的海底地形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所谓大陆架能够主张至冲绳海槽的观点,按照现行国际法缺乏根据。”<sup>④</sup>

---

架往往不起作用或仅发生有限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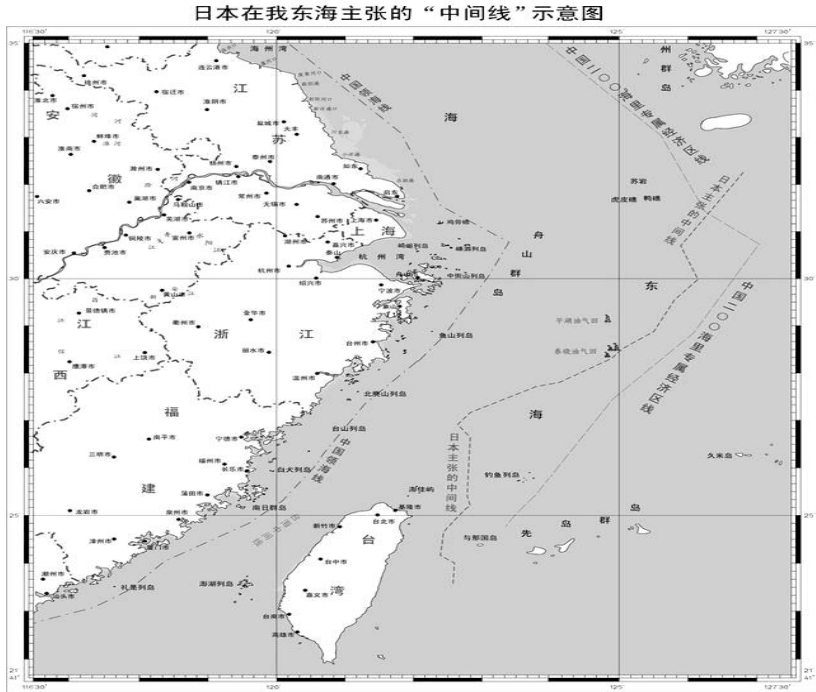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可参见李令华:《中国海洋划界与国际接轨的若干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海洋划界中的成比例概念及相关案例》,《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国际海洋边界划定理论和方法的新进展》,《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年第4期;《关于最终解决东海划界的基础理论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sup>②</sup> 可参见清华大学张新军副教授在《中日东海争端中自然延伸原则的重要地位》一文第四部分中对此学术争论做的介绍。

<sup>③</sup> 日本外务省:《東シナ海における資源開発に関する我が国の法的立場》,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sgshi\\_shina/tachiba.html](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sgshi_shina/tachiba.html). (最后上网时间 2007年12月24日)

<sup>④</sup> 日本学者针对此方面的研究有,田中则夫「国際法からみた春暁ガス田開発問

日本政府强调距离基准作为其大陆架权利基础，认为冲绳海槽只是偶然凹陷，马里亚纳海沟才是大陆架的终止。主张以等距离方法划界，并希望通过国内立法强化其中间线划界的立场。



1996年6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规定：“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向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为200海里的线以内的区域，包括海床、底土和上覆水域（不包括领海）。如果专属经济区外部界线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是一条其每一点同日本领海基线的最近点和与日本海岸相向的其他国家的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线），中间线（或者是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线）将代替那条线。”“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日本的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底及其底土。如果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任何一部分超过

題】『世界』2005.8, 20-24 页；三好正弘「海洋の境界画定」国际法学会编『日本と国際法の100年 海』三省堂（2001），163—187 页；水上千之「大陸棚境界画定の法理の展開」山本草二，杉原高领编『海洋法の歴史と展望：小田滋先生還暦記念』有斐阁（1986）291—335 页；中村恍「排他的經濟水域と大陸棚の關係」山本草二，杉原高领编『海洋法の歴史と展望：小田滋先生還暦記念』有斐阁（1986）36—68 页。其中代表思想是突尼斯-利比亚案中 小田滋法官长达 121 页的反对意见。

了中间线，中间线（或者是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线）将代替那一条线。”<sup>①</sup>

应当看到，不同沿海国基于国际法所规定的权利基础而对特定海域的权利主张之间产生重叠是导致产生海洋划界问题的原因。著名国际法学家威尔（P. Well）认为有关对特定地区的权利是否存在重叠是海洋划界和陆地划界的一个区别。陆地划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存在重叠的主权区域，因此当发生争端时，划界的标准是看哪一方能够提出更令人信服的权利证据。而海洋划界则是一个对当事国权利发生重叠的区域（area of overlapping entitlement）加以公平划分的过程。<sup>②</sup>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相向沿海国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400 海里的地方，自然延伸的主张大大地被减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的国家（如日本）机械地拥有以中间线作为划界基础的权利。

海域划界的唯一原则就是公平原则，直接利用《中日渔业协定》分界线作为划界基线，考虑到一切情况，做出最终达至公平的调整。具体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相向岸线长度比例原则。根据国际法院所宣称的“陆地主宰海洋”的原则，海岸线的长度应该是测算一国专属经济区权利的客观标准。漫长的海岸线总比一个孤零零的点具有更大的效力。在习惯法认定中，成比例概念已被视为与海洋划界有关的每一个判例中都加以考虑的事实。国际海洋法法庭最近就孟加拉/缅甸海域划界案即是采用这种方法。<sup>③</sup>“我国杭州湾北纬 30 度以南东海海岸线（包括台湾在内）达 900 公里，日本琉球群岛面向东海的海岸线总长度为 380 公里。如果把成比例原则适用于北纬 30 度以南地区，中日两国排他性经济水域（笔者注：专属经济区的不同译法）的比率为 64.3:35.7。”<sup>④</sup>因此，鉴于双方有关海岸线长度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需要根据海岸线的事实情况，向划界基线东北移动。

（2）从法理上说，根据《公约》121 条第 3 款，小岛在海洋划界中的法律地位在减低，在国际实践中，面积很小的岛或岩礁对划分大陆架也往

<sup>①</sup> 《排他的經濟水域及び大陸棚に関する法律》（平成八年六月十四日号外法律第七十四号）第二条，转引自袁古洁：《国际海洋划界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版，第 188 页。

<sup>②</sup> P. Well, *The Law of The Maritime Delimitation-reflections*, Grotius Pub.1989, pp.48.

<sup>③</sup> 可参见国际海洋法法庭网页：[http://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16/1-C16\\_Judgment\\_14\\_02\\_2012.pdf](http://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16/1-C16_Judgment_14_02_2012.pdf)（最后上网时间 2012 年 8 月 27 日）。

<sup>④</sup> 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9 页。

往不起作用或仅发生有限的效力。所以企图以岛架平分陆架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且日韩在 1974 年达成的共同开发区协议中开发区的大部分位于日韩假想中间线的日本一侧，其中最近处距离日本九州和鸟岛不足 24 公里，而距离韩国领土超过 250 公里，这一事实说明，日本同样认为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当考虑陆架相对岛架的不同效力存在。

(3) 人口原则。相向海岸以此海域为生的人口数也构成对划界基线做出微调的历史因素。

但由于海洋法的特性属于英美普通法系，所以每一件划界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件划界案都在创造性的应用和解释法律，以使法律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同时鉴于篇幅和主题所限，钓鱼岛归属问题、韩国涉及部分和中华民国政府涉及部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也正是这些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构成了中日东海划界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 3. 划界从本质上讲是一政治事件

划界从本质上讲是一政治事件，划界是由谈判来具体达成的，谈判并不是技术性活动，而是重要的政治高层协商的过程。<sup>①</sup>由此看除了国际海洋法以外，一国的实力、能力和当时的形势规定了谈判的方向。

就目前来看，中日双方都缺乏解决东海划界的政治意愿。中日东海划界实质是对三种权利的划分，渔业权、大陆架矿产权和一定的海域管辖权。关于渔业权，中国和日本在1997年签署了《渔业协定》，并于2000年开始生效。同样于2000年，中国和大韩民国签署了《渔业协定》，并于2001年开始生效。<sup>②</sup>这两个《渔业协定》虽然是相关成员间的临时协定，但基本可以认定东海渔业权已不存在争议。那么，大陆架矿产权和海域管辖权就是目前争夺的焦点。东海油气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东海大陆架坳陷带、钓鱼岛陆架边缘隆褶带以及冲绳海槽坳陷带。<sup>③</sup>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技术调查报告(埃默里报告)中明确指出东海大陆架可望成为世界

<sup>①</sup> John Norton Moore:《对联合国海洋法大会谈判的综述》，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三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4页。

<sup>②</sup> 刘振民：《中国在协商解决海洋争端中的基本立场》，收入《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1977—2007)》(第四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页。

<sup>③</sup> 杨金森、高之国编：《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版，第32—34页。

上油气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sup>①</sup>我国的春晓油气田也已于2005年10月竣工，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而海域管辖权在当前更多的意味着法律义务，诸如紧急救援、环境保护等。但根据海洋法发展的趋势来看，不能排除其权利内容向领海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潜在的海洋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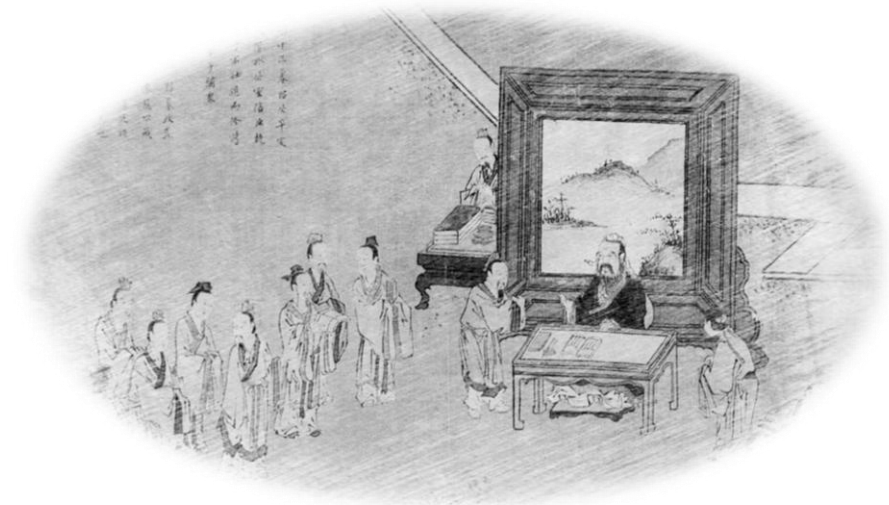
最后，套用邓公的一句名言“日本离中国也很近”，笔者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日东海问题的实质是日本问题，是怎样涵纳日本的问题，或者说也可以说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是一个问题——美国问题。

（责任编辑：周生升、孟维瞻）



<sup>①</sup> 转引自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岛列岛与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6版，第28—29页。

## “孔门高第”专题



**【编者按】**：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颛孙师、仲弓。政事：颛孙师、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仲尼弟子列传》）本专题将向大家介绍孔门弟子，本期是冉有与子贡。

## 冉有之辩

叶小娇\*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sup>①</sup>夫子之道，在天，为理；在人，为仁。苟能一日用力于仁，夫子未见力不足者。然孔门弟子三千，唯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sup>②</sup>冉求盖闻夫子美颜回之贤，喟然叹其力不足以臻颜回之境。

\* 叶小娇，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感谢邱立波老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的宝贵意见和认真指导，受益匪浅。

<sup>①</sup> 《论语·雍也第六》，《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宋]朱熹撰，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87 页。

<sup>②</sup> 《论语·雍也第六》，《集注》，第 86 页。

夫子谓其画地自限，若以颜回行迹观之，诚哉斯言。然以孔门其余诸弟子观之，则愚以为与其责之画而不进之过，不若考其“力不足”之实，察其胸中之纠结，庶明进德之方；倘冉求之资终无以入道，何若退求其次，励以“闻斯行之”。

冉有，名求，与子路同为孔门政事课高弟。二子性格迥异：子路“兼人”，其言不让，近乎狂。冉求“退”，言辞谦逊，近于狷。冉求长于“艺”，然自谓仅以养民，无以教民，<sup>①</sup>此亦谦退之证。刘氏《正义》曰：“果者能任事，达者能明事，艺者能治事。”<sup>②</sup>冉有谦退有余果敢不足，遇事多禀命而行，于其所当为者逡巡畏缩<sup>③</sup>，是以无以任事，仅能治事。愚以为冉求之艺足以治千乘之国，然其果能治千乘之国乎？不能也。何也？“退”也。以其退用其艺，故仅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为量也。苟其艺用于为恶，斯害甚矣。纵无不善之心，然无止不义之勇，亦恐为邪恶裹挟，欲守死善道而不能也。

时三桓共执鲁政。季氏四分鲁地有其二<sup>④</sup>，权势最大。其歌雍、舞佾、旅泰山，俨然以天子自居；厚赋敛，工杀伐，实为不仁之君。冉有仕季氏，朝而宴，<sup>⑤</sup>夫子问。冉有曰“有政”，夫子正其名曰“事”。凡朝，无晏退之礼。凡公事，无私议之礼。按称冉有为政事课高弟，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职其事者。斯盖微言以讥季氏专政之辞。<sup>⑥</sup>季子然（季氏子弟）以由、求为大臣问孔子，盖俨然视季之家为鲁之国矣。夫子显揭大臣之义，抑由、求以仅备臣数，正所以抑季氏。<sup>⑦</sup>季氏旅泰山，孔子讥泰山不知礼；欲伐颛臾，孔子责冉求，均所以深疾季氏也。

季氏旅泰山而冉有弗能救，是其不肯用力，抑或实弗能救与？《集注》引范氏曰：“冉有从季氏，夫子岂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圣人不轻绝人。”<sup>⑧</sup>《读四书丛说》：“季氏既专鲁，则凡鲁当行典礼皆自为之，……，冉有

<sup>①</sup>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论语·先进第十一》），《集注》，第130页。

<sup>②</sup> 刘氏所指分别为子路、子贡和冉有。见[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2页。

<sup>③</sup> 《集注》，第128页。

<sup>④</sup>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以下简称《集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5页。

<sup>⑤</sup> 《论语·子路第十三》，《集注》第144页。

<sup>⑥</sup> 《集释》，卷三，第915页。

<sup>⑦</sup> 《集释》，卷三，第794页。

<sup>⑧</sup> 《集注》，第63页。



诚不能救也，欲正之，则必使季氏复其大夫之旧，鲁之政一归于公然后可，此岂冉有之力所能？”<sup>①</sup>二说均谓非冉有之力能救之耳。余观冉有所言“不能”二字，推测：抑或季氏专断不可谏，抑或冉有谏之而弗听。对照季氏将伐颛臾而终不行，则知前解不若后解合宜。季氏伐颛臾事不见于经传，抑以夫子之言而止与？<sup>②</sup>愚以为是也。

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仲尼。仲尼不对，私冉有。弗听。十二年正月，用田赋。<sup>③</sup>夫子绝冉有，使门人声其罪以责之。范氏以为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为不善之如此，由其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身，而以仕为急故也。<sup>④</sup>《朱子语类》云：“人最患资质弱，刚如子路，虽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气英风尚足以起顽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sup>⑤</sup>余以为朱子疾之已甚，《左传》“弗听”之述，或与季氏旅泰山而冉有弗能救情形相同，亦为冉有谏而季氏未纳其言而已矣。范氏责冉有心术不明或有理据，然语其“以仕为急”则与情实不符。以冉有谦退之个性，未必以仕为急；实则夫子之急仕反有过于求者。<sup>⑥</sup>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虽卒未成行，孔子事功之急切可知也。

以冉有之退、侍夫子侧时侃侃<sup>⑦</sup>之貌，窃以为其于夫子之言无不听也。季氏僭天子，坏礼乐，厚赋敛，冉有皆弗能救，貌逆夫子之志，实因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夫子亦明季氏之不可救也。夫子泰山之叹，绝求之辞，均为警冉有以深疾季氏也。冉有以政事之才，虽贤不及颜回，亦为孔门之明达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夫子之道，一以贯之，于人伦日用之间，冉有盖尝得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之理。故当夫子责其“危而不持，颠而不扶”之时，盖亦自惭形秽也已矣。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sup>⑧</sup>不笃信，则不能好学；然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

<sup>①</sup> 《集释》，卷一，第 152 页。

<sup>②</sup> 《集注》，第 171 页。

<sup>③</sup> 事见《左传》，转引自《集释》，第 774 页。

<sup>④</sup> 《集注》，第 127 页。

<sup>⑤</sup> 《集释》，卷三，第 776 页。

<sup>⑥</sup> 《集释》，卷三，第 777 页。

<sup>⑦</sup> 侃侃：《集注》中解为“刚直”，与“行行”义相近；《正义》和《集释》均解为“和悦”。前解与冉有的个性不符，故取后解。

<sup>⑧</sup> 《论语·泰伯第八》，《集注》，第 106 页。

不守死，则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则亦徒死而已。<sup>①</sup>孔子美南容之“免于刑戮”、宁武子之“愚”、颜回之贤，蘧伯玉之“君子哉”，盖许其笃信好学之功、守死善道之效。若史鱼之直，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则亦徒死而已。以“守死善道”衡之，冉有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天下之大，何处有贤君？何处可行夫子之道？孔子圣贤如此，尚不见任用，辗转列国，赖诸弟子之权位方保其生活与安全。冉有德行文艺皆不及孔子，其欲守死善道，则必效法南容诸贤。南容能免祸于乱世，宁武子卒保其身以济其君，蘧伯玉邦无道则卷而怀之，非其“愚”不可及，是其知之不可及也。冉有性情谦退，遇事多禀命而行，于当为义处，禀夫子之命则难免获罪于君；禀君之命则难免害其道也。故以冉有之资，与其以“画”责之，不若以“进”勉之，励之以好学，使闻义智为，兹为入德之方也。

## “赐也，尔何来迟也”

### ——漫谈子贡士商之道

陈安龙\*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仗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已，莫能宗予”（《孔子世家》）。

春秋，大争之世。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君侯谋国，庶人谋食。逢此原道已塞之乱世，多有贤者辟世无为，以逃避举世滔滔之世界。孔子则秉持一种“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的入世精神，明知

<sup>①</sup> 《集注》，第106页。

\* 陈安龙，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感谢业师邱立波为本文的写作提供的宝贵意见和认真指导，受益良多。

不可而为之，重辟大道，以期再就周公“补天”之业。然不容于当时当世，“累累若丧家之犬”。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天不遂人愿，夫子最终光荣的失败了。弥留之际，有一位弟子让他分外牵挂，不惜带病负仗于门，悲叹“汝来何其晚也”！此人便是子贡。太史公《史记》曾浓墨重彩地分别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中为其大书特书。

行货殖之道、家累千金的是他，让“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的是他，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的也是他。但不知为何，其后世却罕有知音。后世儒者对其经商颇有微词。宋代大儒程颐曾试图为子贡开脱：“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世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先进》）。但这也有勉强子贡就我范中的意味。

子贡兼具士商双重身份。“士”乃“四民”之首，“商”乃“四民”之末。“士魂商才”的子贡在重义轻利的孔门中显得格外突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是夫子对两位爱徒的评价。千百年来，学者多以为这是在“褒颜回，贬子贡”，张文江先生则在《〈史记·货殖列传〉讲记》（收入《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月，页42）中为子贡辩护。颜渊、子贡皆是孔子得意弟子，代表了孔子思想中的两个方向。在物质和思想上不断“屡空”的颜渊，是一个一心往内走的人，对人心有很大的好奇，非常想看看自己内心有什么东西、可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条“内圣”之路。惟其如此，方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子贡走的则是“外王”之路，尽展所长用于当时当世。

《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货。常相鲁、卫，家累千金。”《货殖列传》称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货殖之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且君子富，好行其德，与大道无违逆之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子贡不仅“家累千金”，且“富而好礼”。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贡以货殖之业显于当世，

借财力布扬夫子之道，富者交焉，贫者贍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载其德。

商道乃属经济范畴，经济在中国，本就是指经世济民。但大争之世，礼崩乐坏，天下共主的和平格局已被打破。各诸侯国忙于变法，变法之要义在于富国强兵，富国为了强兵，强兵则为了征战杀伐，霸诸侯、王天下，遂堕入无休止的春秋无义战。在这种状况下原先和平共主下的“国民经济学”堕为“备战经济学”，发展经济非为交换而为战争。由此，兵家崛起，兵道盛行，用铁和血解决问题，血气张扬。孔子深恶之，遂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孔子世家》），为未来可期的新帝国立法。而深明夫子之意的子贡似乎也为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国”勾画了方案——以士商之道替代兵道。

以士商之道代替兵道其要义就在于将原先需要在战场上解决的问题置换到商场、谈判桌上，使动乱的世界得到管理，重塑天下共主的“新周”。

子贡乃孔门“言语”科高弟，辩才无双。《孔子世家》曾说他“利口巧词，孔子常黜其辩”。孔子问子贡之志，子贡答：“得素衣缟冠，使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问子贡之愿，子贡答：“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而事实也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但不幸的是子贡所奉行的透过“言语”、“货殖”，流通天下、使于四方的策略最终抵不过那以战争为导向“翻手为云，覆手变雨”的纵横之策。

或许子贡自己也清楚在这“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那番构想也只能成为“有灵魂没身体”的“理想国”。享有“贤于仲尼”美誉的子贡最终没有去寻求大国霸主的支持，反而退而仕于卫。历史大势无法改变，那就在小国寡民中实践自己的政治实验。子贡曾问孔子：“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治国安邦之大器。当时之为政者在孔子眼中则皆是不足算也的“斗筲之人”，而子贡则是“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的治国之士。士者，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贡问政，从夫子学得“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富乃教之”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为政之道。《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常相鲁卫”，曾为两国执政之臣。惜乎史阙有间，如今很难找到子

贡在鲁卫两国为政的细节。不过，子贡即使不能如夫子所云“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应该虽不中不远矣吧。

孔子没，子贡声誉日隆，甚至有“子贡贤于仲尼”之言，但子贡却每每挺身维护夫子，反击诋毁者。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韩诗外传》卷八记载更详细：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臣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所誉得无大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直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其无损亦明矣。”难怪清人崔述赞道：“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

子贡乃夫子晚年最为得意并且寄予厚望的门生。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皆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假惺惺的鲁哀公对待夫子“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而且庐于冢上，为夫子守丧六年。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但是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独缺子贡一派。

“不受教命，唯财货是殖”的子贡最终长相鲁卫，投身实际的政治、经济运作之中，卒终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齐国。

（责任编辑：陈安龙）

**“美国建国思想”专题**

**【编者按】**这个组织起来的国家耳聪目明，关心大众疾苦。她不是为自己而生，而是作为上帝管理人类的长官，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权利和自然法则而生。（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国之初创，英才辈出、思想争鸣……

## 汉密尔顿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起源

杨紫翔\*

历史总是不能给已经长眠的人片刻安宁，尤其当这个人对于历史的塑造来说足够的伟大。对于美国，这个历史不长但延续性很强的国家，其对外政策的兴起与演变，可以从建国初期的脆弱邦联里去探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是那个伟大时代中被今人议论纷纷的长眠者之一，历史关于汉密尔顿主义与外交政策形成的讨论至今绵延不息，而汉密尔顿作为合众国的缔造者之一，受到的肯定与非议交织在一起，注定了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特殊影响。

“你要狡猾如蛇，又要老实如鸽。”一句圣经格言，与其它格言的不同在于它曾被如此多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家引用，从马基雅维利到康德，甚至汉密尔顿。与其他格言的相同之处则在于，听起来是那么合理，而做起来却极为困难。关于这个类比，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作了近乎经典的阐释：政治家应当以狡猾毒蛇的复杂实用主义追求自己的目标，但其目的应当与鸽子的传奇特点一样仁慈而和平。

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考察中很多学者都会发现，蛇和鸽的特性在外交政策层面是交叉而充满集合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历程中，不管是孤立主义还是全球主义，我们都很难将美国在任何时期的任何政策划定为自由主义的或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很难找到一条显著特性，来判断对外政策更倾向于鸽还是蛇的特质。这或许是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能够引导国家航母不偏不倚地行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回溯到联邦党人时期会发现四种影响美国初期外交模式的重要思想，汉密尔顿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杨紫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传统的汉密尔顿主义被误解为现实冷血的投机哲学，被等同于经常把“国家利益”和“均势”等词挂在嘴边的大陆现实主义。实际上汉密尔顿眼里的国家利益迥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决策者们，军事安全这种零和博弈的产物让每一个大陆国家惴惴不安，小心提防，而美国的首要国家利益在汉密尔顿看来，显然是自由贸易。与英伦岛国不可解除的渊源使得每一个汉密尔顿主义者天然就懂得航海与贸易的可贵，就在欧洲大陆国家玩弄均势外交的时候，英国人已经下决心打造一支无敌于世界的舰队来牢牢控制住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企图崛起并打破均势的国家，大西洋是英国的大西洋。

从思想来源上看，汉密尔顿主义无疑受到了这种英国对国家利益界定的深远影响。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注意到，英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地缘政治位置优势突出的国家，因为处在大陆炮火不能到达的欧洲角落，无论是军事上的协定还是宗教上的覆盖，对英国的影响都相对较小，这让随时更换战略盟友和建立国教、否定教皇权威对英国来说简单而理由充分。红白玫瑰战争让英国传统贵族受到了致命打击，取而代之的新兴贵族不再是军事派别，而是商人阶级，他们打算利用地缘上的优势，把英国的财富聚集推向极致，然后用财富收买大陆的盟友，保证英国的安全，再用遍及世界的贸易打造经济繁荣。汉密尔顿看到了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天壤不同，因此按照他的对外政策理念，美国处在更加有利的地缘位置上，以商业性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将会决定美国与欧洲国家本质的不同。

从政策优先级来看，汉密尔顿致力于打造的美欧关系，首先是商业的关系而后考虑其他。他相信两国关系如果首先呈现出商贸性质，那么军事的作用就会被放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去考虑，他相信哪怕是心理最阴暗、最容易使用武力的人，也会因为自私和贪婪而不肯放弃业已到手的商业利润，因为武力的滥用会破坏这一切。所以，美国很多政治家害怕宣布使用武力带来的政治后果，而和他们不同，汉密尔顿主义者不担心宣布使用武力会带来侵害商业利益的战争，而对战争工具尤其是海军保持了高度的兴趣。这无意中影响了后来的门罗，在汉密尔顿对于商贸关系的揭示、启发下，反对欧洲国家插手西半球事务的叫声更加响亮了。

除了商业的主导性，汉密尔顿主义者还对美国注定繁荣昌盛充满了希望和乐观精神。这样的精神即使在美国宣布独立后最艰苦卓绝的十年战争与混乱、贫乏与孱弱交织的日子里，也不曾被彻底摧毁。按照汉密尔顿主

义传统工作的美国外交官能够心存慰藉地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如果美国能够挺过去，它注定会繁荣昌盛。（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2003年，北京：中信出版社，页111）这种精神主要来自于汉密尔顿主义者对美国优越地理位置的肯定和推崇，汉密尔顿认为，在欧洲只有地大物博的俄国可以不用时常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这里并不等于认为美国应当去军事化，而是认为，美国应当在不忽视建立强大海军的基础上，尽量更开放地、以互利为目标地同其他大国建立关系。汉密尔顿主义的这一外交政策理念一改欧洲传统风气，这种“五月花号”式的精神成了美国向着全球自由贸易进军的推进剂。

从国家利益的偏向来看，独立之初从来没有哪一位领导人对国家海上贸易的安全与自由如此重视。汉密尔顿始终强调一个强大联邦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海上力量壮大和获得航海自由的不懈努力。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海上自由与第二大国家利益紧密相关。船只和货物享有国际水域通行权是不够的，美国的货船在目的地港口也必须拥有与其他国家货船一样的权利和特权。对美国货物开放门户与对美国船只开放水域一样重要。（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2003年，北京：中信出版社，页114）汉密尔顿成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论提出者，而其对动用武力的不排斥和对海军在航海贸易上巨大作用的信赖，使得后来的炮舰政策不再是英国的专利，事实证明，美国在太平洋贸易上对这个的运用，显然比英国更得心应手了。

汉密尔顿主义者把太平洋贸易的开拓看作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贸易走向的重大转变。美国这样一个两面大洋的特殊国家，如果说，大西洋的贸易对象是欧洲，那么比起这样老练的对手和善变的朋友，在太平洋对岸，美国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蒙昧的世界。美国的太平洋贸易史基本上沿着这样四个步骤展开来：重视太平洋贸易、设立远东军事力量、与东亚国家签订协议、打开东亚国家市场。帝国主义时期的美国的确没有太多领土的野心，但始终有着强烈的商业欲望。按照汉密尔顿的思路，联邦政府关心市场开放是天经地义，通过适当的贸易体制让联邦繁荣起来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这构成了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政策的核心。

在关税方面，汉密尔顿秉承联邦党人传统，似乎更倾向于保护主义。美国在19世纪是共和党人获得压倒性优势的世纪，而这时期的关税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汉密尔顿起初的保护主义来自于互惠政策的不被普及，



随着互惠原则被理解，汉密尔顿主义者也才开始了从保护主义到关税自由主义的转变。美国开始意识到，即使他国不以开放市场作为回报，美国也还是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利。当然，重商主义中一些旨在打开他国市场的途径牵扯到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汉密尔顿主义在美国国内因为被理解为和重商主义走得最近，也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抨击。

最后，不管在任何时候，汉密尔顿主义者都会把航海贸易看成对外政策的天然构成部分，把商业利益当作两国关系的第一考察要素，认为商业可能成为和平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始终强调一个有力量的联邦政府，对美国命运与前途的重要性。正如汉密尔顿本人的解释，“海运国家有力量利用我们各方面的无能，来规定我们政治上存在的条件。……他们多半会联合起来用实际上造成破坏的方式来扰乱我们的航海事业，而且限制我们只能从事依赖外国船只的进出口贸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 2007 年，《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55 页）从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联邦党人对海军的建立和航海自由如此看重，而这一切都要在建立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汉密尔顿主义者这样呼喊，并且他们做到了。

总之，由于美国外交政策从建国伊始到现在的连贯性，说不大可能把汉密尔顿及其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彻底总结，也不为过。到一战发生的时候美国已独立 141 年，这 141 年的时期是汉密尔顿主义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期，美国在英国殖民霸权的逐渐衰落下，确定了自己在全球的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明确表述出来，并“通过既非孤立主义、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途径，也不是业余浅薄的外交手法来推进这些利益”。

汉密尔顿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联邦政府建立者和联邦宪法起草人之一，其外交理念和治国方略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也影响了整个全球贸易体系的运转。汉密尔顿对外交政策有一条原则性的认识：在贪婪人性构成的国际关系里，自由贸易是成为和平最充分最有可能的理由；同时，不要轻信贸易本身的和平面孔，而要时刻让大炮跟随其后。此后的美国正是乘着这样一种信条打开了拉美贸易市场，并逐渐迎来了强大与繁荣，舰队也随着商船遍布了海洋，奠定了帝国贸易体系的基础。

## 分裂与抉择：白头鹰成长的烦恼

朱承璋\*

国之初创必伴随合适的兴邦策略，两百多年前的美洲大陆上，围绕美国的建国方略和治国理想，掀起过两次思想大碰撞：第一次，是亲英、亲法之争，第二次，是自由、奴役之争。随着第二次争端以战争方式宣告了国家的成熟，美利坚合众国就此浴火重生，一飞冲天。

### 首次争端

在罗伯特·卡根看来，这次争端并非为了使美国的大政方针最终向“英”或者向“法”靠拢，而是服务于国内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并非‘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美国自由主义愿景之间的斗争。”

#### 愿景 1

**设计者：**联邦党人，以华盛顿总统及财长汉密尔顿为首，推行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国家债务……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将大部分资金置于一小部分（多数是东部的）商人和金融家的手中。”（汉密尔顿的政策）“是‘进步主义’和‘国家主义’”。

**思想层面：**“对他（汉密尔顿）视为世界上已知的或者将可能存在的最为成功的自由派政府（英国）一种强烈的亲近感。”汉密尔顿认为“这种混合型政府是人类历史上能够提供自由和稳定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如果说杰斐逊和麦迪逊深信革命的目的在于与英国和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决裂，进而建立一个新的、独特的共和主义制度，汉密尔顿则争辩道，美国人投身于革命只是‘作为被侵犯了先前所享有的权利和基本公民权力的避难者，而不是自愿地寻求对现有的政府进行一次彻底的、完全的改变，以追求一种新的基本公民权力和权利。’”

**政治倾向：**英式自由主义，改良（改英国的良）型治国理念

**对外政策取向：**亲英

**帝国愿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与英国共进退”“一个强大的国内制造业，一个健康的世界贸易和一支为了保卫对外贸易和国家统一的海军

\* 朱承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舰队” “甚至和其他海上帝国一样，将拥有海外殖民地”（和英帝国建制很相似，海上帝国）

## 愿景 2

**设计者：**反联邦党人（共和党人），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首（南方种植园主阶层），推行共和主义政策：“希望与英国的分离‘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而且——最为首要的是——还是道德上的’”，“建立一个新的、独特的共和主义制度”。他们计划实现这种分离，通过限制与英国的贸易，并扩大与其他国家，如法国之间的贸易，来开启一个新的经济与道德独立的时代”，“对与英国的商品买卖设置歧视性的关税。”

**思想层面：**“曾目睹英国军队毁坏他们的庄稼，并使他们的奴隶获得自由。”因而，对“英国的整个商业和财政体系都怀着心酸的记忆。”“基于对在美国自身反抗英国的斗争中法国所给予的援助的记忆，美国人对于法国的友爱之情，就像对英国人的敌意一样，油然而生。”“他们深信，从政治上以及尽可能从经济上与英国分离，对于国内的兴旺和共和国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杰斐逊和麦迪逊说的更多的是将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的危险。”

**政治倾向：**“自由派共和主义体制”

**对外政策取向：**亲法（看重法国大革命对防止美国“沦落为那种半途而废的英国宪政的体制”的作用）

**帝国愿景：**“一个巨大的领土扩张的帝国”，“要顺着落基山脉的西部斜坡一直扩展到眺望墨西哥比河的广大区域”（隐隐感觉是陆上帝国，强调领土扩张）

**这种斗争的实质在对外政策上体现为：**“汉密尔顿准备在一段时间里增加美国对英国的依赖，以使国家最终将变得足够强大而在未来呈现甚至更加有力和完整的状态，并且也使得美国的社会和经济能够更多效法英国的演化模式。”而杰斐逊“准备接受的是对法国更大的依赖，从而获得他认为的对英国的更为重要的独立，并且避免复制他所痛恨的英国制度”，“他们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判断主要是由他们对于美国应该成为怎样一个国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愿景所决定的。”

所以，当法国大革命逐渐“开始与自由背道而驰，出现了对自由的任意剥夺、不受法律约束的断头台审判、恐怖笼罩一切”时，所有人都开始担心“法国专制主义的出现”会影响美国政治路线的选择，故在对外政策

方面，华盛顿提出了“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企图同“专制法国”彻底撇清关系，一味亲法者受到了打压，“如同后来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情形一样，一个具有被视为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相敌对的和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国家所构成的威胁，导致了镇压其在美国国内所谓支持者的偏执的极端行为。”（自由压倒一切）

在自由主义信仰的原则下，抵制恐怖专制法国的扩张，与亲近“具有类似的成见和爱好”的英国，便成了外交上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依附性的，在国父们看来，它仅仅是成就美国“伟大使命”国家的一种手段。

## 二次争端

随后近半个世纪里，君主制欧洲，始终把美国当成“使欧洲各国君主的宝座如同遭遇地震袭击后摇摇晃晃而无法坐稳的那些政治原则得以传播的首要原因”。1812 年，同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在海上打平之后，作为身处君主制年代的共和国，美国必须采取各种手段，不仅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天堑，而且通过执行门罗主义，寻求最大程度的实力自保，和最大程度的自由主义理念扩张，因为，门罗的“咨文不是一种西半球孤立主义的宣言。从重要的方面讲，它是象征国际共和主义者团结的一个声明”。“实际上，门罗咨文的真正目的不是划出地理上的界线，而是划出意识形态上的界线。”“从此以后，美国人会认为在西半球灌输专制主义是‘危害他们的安全’”。

就门罗宣言本身来看，似乎纯粹是美国建国初期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但如果把它同国内局势联系在一起观察，尤其是国内的蓄奴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是帝国愿景斗争升级后的必然结果。“门罗相信，扩张将是与国家利益相违背的，不是因为德克萨斯没有价值，而是因为美国政治的分裂性质使其难以消化。”在蓄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对外扩张领土，因为一旦扩张，国内便会就在这片土地上蓄奴与否争执不休，甚至走向分裂（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购买就打破了南北平衡）。“美国不能扩张，因为它无法决定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是无法逃避的抉择，“美国一诞生就具有一种性格分裂症：一方面是对《独立宣言》中体现的人类平等和自然权利的原则性

承诺；另一方面是对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蓄奴制度予以保卫的现实承诺。”南方蓄奴州和北方自由州之间的分裂，似乎从政权诞生伊始，就注定会成为这个国家从青少年迈向成年的道路上，必经的一道坎。外交上，加勒比地区奴隶制国家（海地、古巴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美国南部庄园主的神经。一旦外部奴隶制状态解除，可预见的未来，被解放的邻国黑人将对蓄奴州的奴隶施加巨大的观念影响，势必会动摇蓄奴州的政治基础。如此一来，“对于南北双方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问题与围绕蓄奴制的地区冲突是不可分的。尽管这场冲突的进行常常越出美国边界之外，但每一方追求的胜利却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从围绕德克萨斯兼并的辩论，到这个 10 年后同样激烈的围绕墨西哥领土割让的争吵，再到 19 世纪 50 年代兼并古巴的斗争，北美大陆，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岛屿，都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这些斗争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描述成两个地区之间的一种帝国竞争。”

一方是国际反蓄奴制运动——背后的推手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社会和最强大的帝国”英国——推动下，“当代人类、自由民主的资本家们的世界孵化器”；一方是贵族式的奴隶制社会，本质上“永远不能完全吸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分裂的帝国愿景——自由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环加勒比奴隶帝国——之争，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实质上的国家分裂，内战打响，美国人用最为激烈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责任编辑：朱承璋）

天下/World

## 奥运这一年，世界看英国

**【主持人语】**四年一度的奥运狂欢在英国伦敦开幕，光荣与梦想弥漫于英伦三岛，全世界的目光也重新聚焦于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伦敦奥运的一幕幕悲喜剧，也带领我们对东道主英国作一个蜻蜓点水式的回味。

—

7月27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在伦敦碗激情上演，在开幕式的“快乐与辉煌”环节，观众们可以看到在白金汉宫拍摄的一段影片，在影片中，英国女王与007登上了一架直升机，直升飞机很快飞到了伦敦碗的上空，在空中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涌向奥林匹克球场。直升机在空中稳住后，只见女王从飞机中跳出来，在半空中打开降落伞！007也跳了下去，护送英女王到达现场！熟悉的007音乐在奥林匹克球场奏响，英国国旗打开，女王出现在现场。

这神奇的一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今年正值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英国女王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 国王的意义

但在英国女王钻石庆（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这天，除了欢呼声，还有一大群共和主义者将聚集在终点伦敦塔桥，对君主制说不！这是英国自1897年以来的唯一一场女王钻石庆，但也将是有史以来共和主义者组织的最大规模一次游行。当女王习惯性地摆手，这些示威者也代表着英国五分之一的人，他们继续反对温莎家族，要求英国走向共和。同时，在许多英联邦国家要求共和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共和主义运动”成立于1983年，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场竞选游说组织，有2万多成员，其宗旨很明确：废除君主制，实现共和制。根据最新

的民意调查，英国有五分之一的民众反对君主立宪制，主张改制共和。共和主义者主要观点为：

君主制是有害的，它和民主制度矛盾，削弱了议会的作用，也违背了人们可以选择国家领导的基本权利。

君主制很昂贵。王室每年花费至少 1 亿英镑。英国每个成年人每年要为王室付出 62 英镑。

君主制让英国看起来“更落后”，成为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遗留，并非现代国家代表。

但在英国，“共和主义”并非主流。英国主流的三大政党——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在主流价值观上均认可君主立宪制。而且 2007 年澳大利亚曾举行公投决定君主制的去留，结果仍是同意保留君主制的民众占多数。

此外，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君权”在英国已经大幅缩减，更多成为政治和文化的象征。但君主在英国宪政体制中起着其他政治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

首先，英王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英国人依然把君主看作是国民道德感情的表现，是国家的象征。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英王原来的姓氏是德国汉诺威家族的萨克斯·科堡·歌特公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为“自古以来的英国姓氏”：温莎。这一姓氏的更换更加体现了英国作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女王万岁》被定为英国国歌。英王的生日是英国法定的国庆日。英王的登基、加冕、结婚、寿辰等均视为全国、全民族的节日。英王代表英国主持对外对内重要庆典仪式。正由于此，1976 年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竟有 81% 的英国人情愿保留君主，而只有 10% 的人愿意要总统。显然，英王在英国宪政体制和政治统治中所起的精神支柱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此外，英王的象征作用还表现在英联邦关系方面。战后在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背景下，英国为维护它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建立了英联邦。至今英联邦有 49 个成员国。英国国王是英联邦的元首，同时兼任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 18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英王通过任命总督代国王在除英国之外的 17 个国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英王及王室成员经常对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出席两年一次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和一年一度的英联邦国家财政部长会议，并参与英联邦国家一些重要的庆典活动，以此作为维系英国本土与英联邦国家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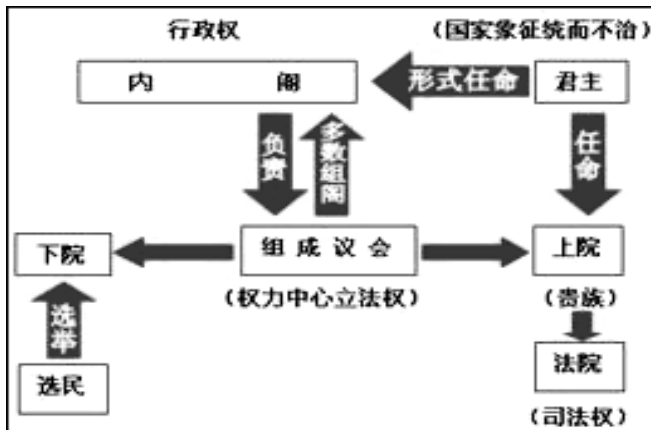
其次，英王是国家宪政体制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体现和保证。马克斯·韦伯曾说过，单是君主的存在就保持了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因为一切决定都是以他的名义做出来的。王位世袭制使国家权力在现代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政府的条件下在形式上得到了连续性的体现。君主与政府的联系，赋予了政府尊严和正统性，从而加强政府体制和政府运作的合法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英国宪政体制的稳定性。

再次，英王是英国政党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协调者和缓解器。在实行政党政治的现代英国，政党之间围绕国家政权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冲突威胁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在实行多元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英国，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分化和整合日益明显与剧烈。在政党冲突和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秩序和宪政体制时，英王作为超阶级、阶层和集团、超党派的“中立人”，出面调解这些冲突和矛盾，从而在“国家利益”的形式下使这些冲突和矛盾得到协调和缓解。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1931 年的政党政治危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工党麦克唐纳政府陷入了政治危机。乔治五世出面斡旋，建议组成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三党联合政府，并主张仍由三党中处于软弱地位的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留任首相。三党中最大党的领袖鲍德温接受了国王的劝告，从而平息了这场政治危机。

最后，英王通过咨询、鼓励、忠告等形式，对内阁的执政活动做出实际影响。英王以其世袭、长期任职的地位，通过调阅内阁文件和其他文件的特权以及听取首相、大臣报告政务的机会，为掌权者提供一些经验。通过咨询、鼓励、忠告，在现代政党政治过程中保证政策的理性与效率。据《英国政事，1900—1979 年》一书的统计，1909 年至 1977 年间，国王在特殊情况下参与政事的情况有 14 起，其中 6 起与任命首相有关。

 **链接：英国政治结构**





此外，英王在保障民主宪政制度、避免专制统治中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在英国，实际上最有权力的人是首相，因此，最有可能走向专制，危害民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是首相。但英国首相行使的大部分权力名义上是国王的权力，首相要推行专制首先面临如何摆脱国王这个障碍以解决名实相符的问题。国王在英国地位最高，但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下，国王要恢复其原来的专制权力已经决不可能了。但这样一个虚位的国王却能非常有效地屏蔽首相，遏止首相走向专制统治。事实上，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谋求专制统治的首相必定危害国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甚至有可能领导人民共同抵制一个专制首相。一直以来，人民摆脱专制统治的最顽固的敌人就是君主，而如今，经过英国式的改造，国王甚至可能成为捍卫民主制度的一个可靠力量，真是让人感到奥妙无比！

## 二

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女王的表情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因为整场开幕式人们没看到女王笑过，表情都很严肃，就连宣布奥运会开幕时都不怎么高兴，这就引起了中国网友的调侃，网友在女王的照片中配了这样的字幕：“Look at all these countries I used to 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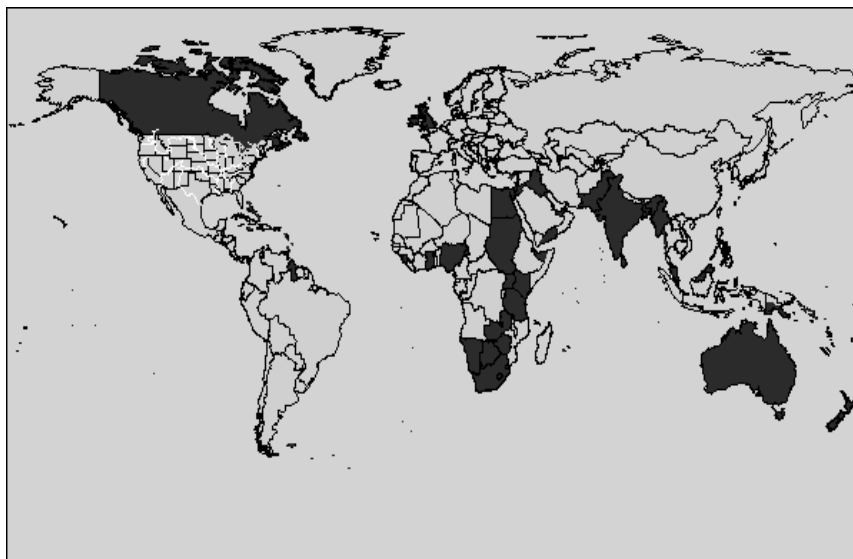
这样的调侃刺中了这个“没落帝国”的痛处，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英国曾经的辉煌。



自 1588 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新兴的霸权国家，开始不断扩张海外殖民地。之后，英国相继在英荷战争和七年战争中，打败最强劲的对手荷兰和法国，夺取了两国的大片殖民地，确立了海上霸权。1815 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又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国际政治、军事强权地位，工业革命更让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经济强权。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步入了鼎盛时期，当时，全世界大约 4—5 亿人（也就是当时全球人口的约四分之一）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领土面积则有约 3000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20%，从英伦三岛蔓延到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亚、香港、新加坡、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 24 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英国出版的大英帝国全球地图，通常用红色把帝国的领土标出，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 1865 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地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 三

开幕式前进行的伦敦奥运会首场比赛中，英国女足获得胜利，这让英国媒体合不拢嘴。本次东道主临时组建“英国队”，一度引起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3家足总的不满，因此并不是很配合英格兰足。本届奥运会女足阵容中，仅有两名非英格兰球员。英国女足的新闻通稿，将英国女足直接写成了英格兰女足，居然写成了“英格兰女足已经上路”，遭到了大不列颠其他地区的抗议。

大不列颠各个地区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 英伦四地：傲慢与偏见

英国的中文称呼是习惯，但并不正确，我们所泛称的英国其实是不列颠(BRITAIN)，或者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这是一个由四个行政区域组成的国家，总人口5800万左右：英格兰不到5000万、苏格兰800万左右、威尔士300万左右、现在的北爱尔兰不到300万。

没有和平统一，万心归一的神话，只有征服与反抗，讨价还价的历史。英格兰是大家所知道的英国的大部分，他们是主体民族，其他是少数民族，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其实其他民族的本体语言曾经也很发达，但随着英格兰的文化入侵和强制剥夺，现在使用越来越少。如今的米字国旗就是有英格兰国旗(红十白底)和苏格兰国旗(斜蓝十字)混合而成的。

先讲一下威尔士，位于岛屿西南的一小块，他们的祖先是凯尔特人，以放牧和矿产著名，和英格兰人打了几百年仗，历史上的国王和王子们被英格兰人杀完后，大概十三、十四世纪英王爱德华一世册封自己的儿子为威尔士的王子，这就是后来英格兰的王储称为威尔士亲王的来历。英格兰为了实现彻底统治，沿边界线修了一系列漂亮的城堡，又漂亮又结实，组成一个铁圈，以体现英王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今天是大家的主要观赏景点。英人为了消灭他们的文化，改说英语从娃娃抓起，学生在学校不能使用威尔士语，在教堂要用英语的圣经，否则就要体罚，这个法令一直到了 1960 年代才取消。威尔士人很倔，少部分进了北部山区成了山匪，坚持游击战，而普通人则采用自己的方法，经过二战后的几代人的努力，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罢工和警察的冲突，以及全球民主化的推广，威尔士人从 1970 年代争得了自主权，可以在公开场合使用自己的语言，有本民族语言的电视台，有自己的议会。而且如今的法令规定，在公共场合、交通标志、店铺招牌可以单独出现威尔士语。不过由于历史原因，靠海岸的南部发达地区，地区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英语，当然有浓重的本地口音和用词，有北部还坚持着自己的语言。今天的本地议会还管理着所有威尔士地区的内务，只有外交和军事、全国性的法令由伦敦的威斯敏斯特负责。不过由于历史的移民以及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虽然还有少部分人提出独立，但这已是不可能的镜中月了。

苏格兰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电影《勇敢的心》也讲得不少。苏格兰在 9 世纪大致统一，在 11 世纪开始学习英格兰的习俗，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也开始把法国的习俗带到苏格兰。14 世纪后大约有 300 年时间，英格兰与苏格兰进行战争，主要是英格兰要征服苏格兰，但在战争中苏格兰保持了独立，但也因战争而贫困。1603 年，经苏格兰詹姆士六世同意，英格兰和苏格兰均归入英格兰王朝。此后还有不少纠纷，并发生两次大的苏格兰高地百姓起义，最后一次 1746 年的起义失败很惨，战争十分血腥。战争结束后，高原清洗就开始了，大量佃农被驱逐，大规模的苏格兰人向殖民地移民。由于民族情绪高涨，伦敦政府在 1979 年答应如果苏格兰全民投票投过 40%，就给苏格兰自己的议会。1999 年，苏格兰议会通过普选产生，英国议会的一些权力便下放到了苏格兰议会。这是经过 292 年后苏格兰再一次有了自己的议会，实际上，除了国防、外交和税收三项权力在英

国议会之外，其余政府事务都在苏格兰议会。这之后，独立主义者高呼：“下一步是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当然，独立苏格兰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了。



关于北爱尔兰的部分，大家知道，全盛时的大不列颠是包括了整个爱尔兰岛的。由于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利益之争等原因，爱尔兰一拨又一拨地进行军事起义、恐怖袭击，爱尔兰为了独立几乎求遍了所有可以利用的列强，终于在 1949 年换来了大半个独立。虽然在爱尔兰说本民族语言也已成了上层的一种时尚，但大部分普通人都还是说着英语，这个出过王尔德的民族可以夸耀的竟然是：我们的英语说的比殖民者的英语还要棒，当然王尔德也是用英语来写作的。但为什么就不能让北爱尔兰也和爱尔兰统一或独立呢？因为在英国政府在数百年的殖民中，大量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移民到北部爱尔兰繁衍生息，使当地的人口成分有了巨大变化，现在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在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而部分爱尔兰人改信新教，大量从大岛迁来的人口控制着更为重要的经济命脉。英国政府又如何能抛下自己当初迁去的百万子民，因而英国仍然掌控着鸡肋式的北爱尔兰。

（责任编辑：朱永福、崔攀）

## 指点江山

在世界舞台上，奥运会恐怕既是最能体现超越民族的国际大同精神的舞台，也是最能体现体育爱国主义和文化爱国主义的舞台。伦敦奥运会究竟留下了什么？每个人、每个国家，恐怕各有各的理性分析与褒贬不一的情感记忆。清点伦敦奥运会的得失，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一本经，没有必要非得谁说服谁。对我来说，最难忘记的是在伦敦奥运赛场内外异常丰富的人的故事，是赛场上运动员洒下的汗与泪，是闭幕式大屏幕回放的一张张真情洋溢的脸庞。男子 4\*400 巴哈马逆袭绝杀美国，女子 4\*100 美国完爆牙买加打破尘封 27 年的世界纪录，刀锋战士终偿奥运会决赛愿望，女子 5000 米决赛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三对三的巅峰对决……看过伦敦奥运其实我们会发现奥运的真正情怀不完全是更好、更快、更强，还有奥运宪章的第一句话：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王心志

2012 伦敦奥运，让英国在短短的半月时间里，重新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这个曾经的帝国，辉煌早已不在，如今似乎只能靠奥运一搏世人之眼球。英帝国已经远去，但是英帝国自光荣革命以来的文明遗产早已像散落的珍珠，有些在世

界各地结出硕大的果实，有些则正在生长。作为世界中心的英国，不复存在，但作为现代文明中心源地的英国始终存在。伦敦奥运会，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思考英国与现代文明关系的机会。

——吴途勇

从伦敦奥运会看英国，不免产生“日已落帝国”的感慨。不论是开幕式、赛场上的比赛，还是后勤的基础设施，感觉和北京奥运会无法相提并论。当然，英国人很乐于看到奥运会的低碳、节约。曾经自豪于“世界工厂”的英国人，如今能坦然地接受本国政府“中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定位。国家定位的转变带来国民心态的调整，我好奇于这种调整。英国国会曾激烈讨论，是要以牺牲公民的福利维护昔日帝国的“尊严”，还是放弃所谓的“帝国尊严”以保障公民的幸福。显然，辩论的结果是后者取胜。我更好奇的是，虽然它已无意东山再起，但英帝国的贵族传统仍延续至今。这与中国的情形迥然不同。中国历经近代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炮火洗礼，贵族传统连同贵族已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中国人最终接受了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但中国人从

未忘记中国是个帝国，不论是政治意义的，还是文化意义的。因此，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人骨子里激烈的情绪又开始浮出水面。暂且不管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以何种身份行事，我关心的是，中国人能否从英国人的国民心态中受到一些启发？比起英国人，中国人过于激烈。英国人的“合理自私”使得他们能理性地看待国家利益和国际定位，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过于“爱国”。我甚至想，如果我们说自己不再是帝国，又会如何呢？中国人会因此而变得不幸福了吗？

——叶小娇

今年的奥运会已经是第三次降临“雾都”了，这足以说明英国与奥运会的渊源之深，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的努力，现代奥运会的形成可以说离不开英国的努力。不仅在体育方面，英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宗教改革和通行世界的语言，足以使这个国家成为人类文明曾经的车头。虽然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作了重新分配，但英国文明的影

响至今还是无处不在的。2012 奥运会的举办，相信能使这位“没落贵族”的光辉再次照耀世界。

——朱永福

在本届奥运中出现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一场“斗嘴”，法国人讽刺英国人对欧盟态度的若即若离不情不愿。但英国人从未承诺过对欧盟不离不弃，最初对欧盟的设计框架走向超联邦路线不满，又出于其一贯的外交政策，隔绝与欧盟之外。此后又因为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曲曲折折加入欧盟。加入欧盟时，欧盟处于上升状态，英国现出困境，英国暂时将未来走向问题搁置一边；而如今，欧盟危机重重，而救治办法却是建立一个更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盟，此时英国人“抽身而退”的念头重又燃起。岛国观念、主权观念以及欧盟的发展状况是英国人态度摇摆不定的原因，英国人不会退出欧盟还不好说，但英国人到目前为止都不希望受到欧联邦的制约。

——崔攀

话语·幽默 / words humour

I 这是我们的岛屿，你们捍卫着这片领土，我希望你们成为这片土地和环境的卫士。

——李明博登上韩日争议的“独岛”时对岛上居民说。

II 若干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奇观，年轻人无法就业，每天逛公园，老年人没法退休，每天上班。于是每天早晨的时候，老太婆就喊了：

“孙子，你上午去公园遛鸟之前，先扶你爷爷去单位上班！”

——当有人问白岩松对于推迟退休年龄有何看法，他这样回答。

III 我向国民议会移交宪法权力，从现在起，国民议会是利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利比亚历史上第一次权力移交，对全体利比亚人民而言是历史性时刻。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完成使命，主席贾利勒向年龄最大的议员穆罕默德·阿里·萨利姆移交权力。

IV 京东挑起与苏宁的价格战，跟周鸿祎对垒雷军的小三之战颇神似，都是“破坏性入侵”。

——8月15日，京东商城与苏宁电器宣布进入价格大战之时，FT中文

网专栏作家程苓峰如此评价道。

V 在中国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愤青，但是你一到国外，都表现得特别爱国。这么多年的集体意识，是逃脱不了的一个命运，在文化上不自信，这是根儿上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威尼斯获奖电影《人山人海》导演蔡尚君在接受采访时说。

VI 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行动导致地方政府纠错，渐成“模式”。其对解决具体问题见效之快，比自上而下的调整还要迅速。有人认为，这些一个个具体案例，构成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它们改革的不是体制，而是重塑权力的边界、权力与民众的关系等根本性元素。

——《环球时报》在湖南永州取消了对唐慧的劳动教养之后评论说。

VII 这几天一直在想好奇号探测火星，会不会惹火星人不爽？

——在人类迈出探测火星的历史性步伐之后，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幽默地说。

VIII 《明报》解读高层礼遇知识分子，《凤凰网》披露北戴河专家甚至感激涕零“这些菜都没有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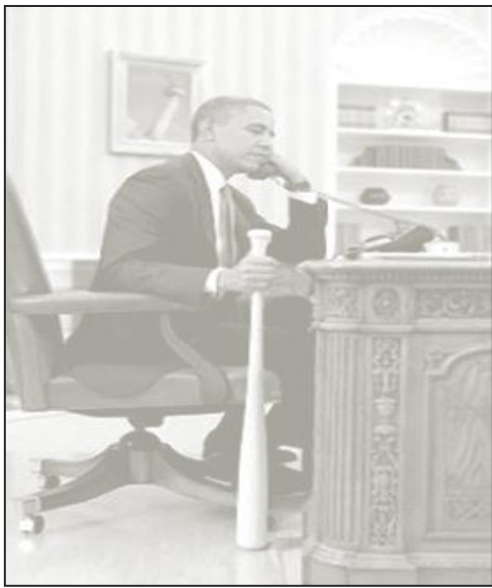
过”，略显夸张。但此次高层会晤专家，无疑是十八大之前的吹风。而外界更关注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治会否走向更加开明，具体而言就从见专家、公布三公经费、官员财产公开走前几步。谨慎乐观！

——凤凰网《有报天天读》栏目主持人詹晟说。

IX 从已过去的奥运来说：悉尼奥运很棒，但伦敦是从过去成功举办的奥运中吸取了诸多经验，我们的奥运，向悉尼学习了，也向北京学习了。

——有人问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至今悉尼还认为悉尼奥运会是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那伦敦坚持自己是史上最牛掰的一场奥运，该如何解释？约翰逊如是答复。

X 以拯救欧元为由主张推动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论点毫无说服力，政治联盟既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亦解决不了欧元区当前的危机。——欧洲央行前执委会成员奥特马尔·伊辛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时写道。



照片中奥巴马手握棒球棍，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通电话，商讨叙利亚危机。土耳其政客批评埃尔多安已沦为“傀儡”。白宫发言人称“我们发布的目的只有一个，突出总统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密切关系，并提起对叙利亚局势恶化谈话重要性的关注。”



## 夏日香气

崔攀\*

热辣辣的盛夏，阳光炙烤大地，一切氤氲起来，是一场各种气息、味道、风景交汇的盛宴。

其实夏天的气味从梅雨就开始萌发了，当雨季退去，属于盛夏的阳光大行其道时，夏天的气味已经在肆虐了。走在路上，会闻到土壤被烤焦的气味；夜晚的河边，阵阵晚风中携带丝丝的鱼腥气；回到家里，花露水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晚上睡下，竹席的青涩气味萦绕鼻尖，夏天已经占领了每个角落，与你切肤之近息息相闻。

但或许属于盛夏的气息还未浓郁，耳朵已经招架不住夏日的第一波袭击。初夏的清晨早起，或许最先听到的声音是蝉鸣。盛夏来临，夏蝉已经嘶叫了好久，久到反而没有了存在感。春天走在河边的树下，有明黄色的花，背景音是叽叽喳喳更显幽静的鸟鸣。进入到夏天，一切显得不淡定，夏蝉成天的用单一的调子聒噪。

关于这个原因我忽然想到一个关于夏蝉的冷笑话。蝉太太性子急，蝉先生反应慢。夏天早晨，蝉先生临出门，蝉太太连珠炮般叮嘱：出门小心热；挑棵好树；多喝水；别被晒着；不许找外遇……蝉先生一声不吭，听完走了。蝉太太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很难过。黄昏时，蟋蟀先生来做客，说：你家蝉先生，今天奇怪得很，爬到树上，忽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开始连珠炮念：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知了……

或者可以把蝉想成某个得罪了天神的人，就像西方神话里提到的那个因为挑战雅典娜而被变成蜘蛛的织女。但似乎中国神话里很少有类似的情况。中国的神鬼异志里都是妖鬼之类拼命想变成人，人则是修身炼药拼命想变成神，神则是整天无所事事，时不时谴责一下那些想变成人的神。很少有神或者人被变成动物一说，除了投错胎的八戒。

\* 崔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蝉鸣之外，夏日里触目所及的是大片大片的明艳照人。春天的花开透着清新的生机，夏花却绚烂得有种轻熟女的气质，明艳艳地挂在树上临水近照，微风吹过的时候轻轻摆动。有一种生命已经开到极致的绚烂感，这一刻是泰戈尔所说的“生如夏花般绚烂”，但等不多久天凉风起，又是另一种落英缤纷的景象了。岸上花明柳绿，而河里莲叶已田田盖住水面，荷花如箭如盘出水俏立。

当台风过境，大雨如注。河上水汽升腾如烟，雨水击地哒哒作响，偶尔也可以看见路上几只青蛙愣愣的找路，惊险地躲开飞驰而过的汽车。忽然想到天气预报上常说南方有雨，当时无感，后来身临其境看雨洗的绿树灰墙白瓦，才觉得“南方有雨”这个词充满了烟雨清新的画面感，并且在它后面泛着只属于夏天的清凉感触。

不过关于这些全都是一瞥之下的风景。夏日里没有人闲闲地走在路上，抬头望见的也不是蓝得不像话的天，而是墨镜后灰茶色的天空，或者是五颜六色的阳伞。之前看到有形容人的词语是“夏日可畏，冬日可爱”。盛夏的太阳有让人躲之不及的热情，从外到里渗透到每一个毛孔。

所以夏天最想要的是冷气，而在逼不得已出门时，各种关于夏天的气息、味道、风景扑面而来简直招架不住，逼得人急急从日光浴中脱身，寻找下一处避难所。到了室内才能真正享受到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味道里有冰冰的绿豆汤，有西瓜，有葡萄，有冰激凌，还有游泳时不小心喝下去的水，全都是微凉的感触。每当手起刀落，西瓜应声迸开，汁水四溢，红绿鲜明地刺激视觉，我就觉得我的夏天就快圆满了。将其放入冰箱，过后拿出来用勺子毫不客气在半个西瓜碗上攻城略地，这时的夏天才真的是圆满了。

回想起从前很小的时候，街边路上有卖刨冰的小车。就是《艺伎回忆录》中 Sayuri 在桥上哭泣时，渡边谦买给她的那种。大大的冰块被机器旋出碎碎的冰花，满满盛一杯，浇上五颜六色各种味道的果汁，再放一些葡萄干和几颗腌制的樱桃。而樱桃一口咬下去，连吐出的核都是胭红胭红的。味道是杂乱的，把各色的果汁全兑在一起，出来的颜色却特别的不亮丽，是种深深浅浅的棕色，这样一来颜色也是杂乱的。具体味道当然是想不起来了，应该是很粗糙的，唯一鲜明的是的记忆是舌尖森森的凉意。

夏天的有风的傍晚，或者有点凉意，但把手抚上墙壁或石头，仍是有热气蒸腾上来。就像《边城》里提到，翠翠的爷爷不许她坐在被烤过的石

头上，因为可能会生病。沈从文描写的湘西的夏天还有一种甲虫的气味，汪曾祺说这是很特别的，因为你见过谁写过甲虫的气味。而我觉得这岂止是特别，我连闻都没闻到过，简直是“无中生有”。

乡下的夏天的夜晚可以幕天席地的睡觉，有满天的星斗，有半夜的鸣蝉，有柔柔的风贴面拂过。睡意席卷过后，或者会有凉凉的雨滴忽然落下，接下来一阵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大雨就随后而至了。

（责任编辑：叶小娇）





## 自由的子尤

尹汝涛\*

之前一些日子对一位叫做子尤的小作家突然产生了兴趣。可能之前在对于几乎同龄作家方面我显得较为孤陋寡闻。他只有 16 岁，而且就像一部电影名字那样，是“永远的 16 岁”。

以前根本没怎么听说过他，只是某次听一位师弟说起的。与其说师弟的介绍吸引了我倒不如说是子尤的那首《相信未来》吸引了我；师弟对于他的介绍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少年诗人”与“英年早逝”，而在模仿食指的同名作《相信未来》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他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思想与特性。

李敖说：我可以感觉出来他的原创力。他还说，子尤聪明、字漂亮、也很有文采，就是发型糟糕了些。

看了子尤的一些文章，虽说还没看他的《谁的青春有我狂》，但是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原创性，我把它称之为“用自由的文笔描绘现实的种种”。

---

\* 尹汝涛，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人人都在追求自由，可又能有谁能够在世俗社会中真正做到自由呢？子尤崇拜李敖在某些方面的独到与独特，他评价李敖说他写出了很多虚伪面具下的荒唐；他发表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痛斥周国平虚伪的“父爱”，文笔犀利、见解独特；他被好多人误认为是比“80后”作家们还蹩脚的孩子，可能只是由于一句“二十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或许还有许多能够证明他桀骜的例证，但我认为所有这些并不是他愤青的表现，仅仅只可算作深入思考引发的自由宣泄吧。

子尤只有16岁，可他却能够以一个年龄稍大者才应有的思维去发现探讨这个社会或者只是他身边的种种。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或许他的一些见解有失偏颇，但无论怎样，读者阅后稍稍会有些启迪与震撼，引人深思也是在所难免，就像他说的那一句：由我的肿瘤想到学校的肿瘤。

我也知道一个孩子、或者我们说的一个学生不去好好学习而过多地思考社会似乎有点不妥，但如果当孩子们都在深思现实，那么这个社会是否也到了该去自我反省的时候呢？

子尤的思想和文笔都是那种似有似无的天马行空式的自由，看似有些意识流，但却是形散神不散，可能称为用蒙太奇式来表现内心比较好吧，他的跳跃我们不得而知，他的辩证他的思索却会在不经意间为我们发觉。

对于他我了解得还不够多，但是仅仅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控制不住了，是为他的英年早逝吧。子尤患上了“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一种常人都不曾听说过的病，而从患病到离世的日子里，他所表现的坚强亦是我们所不曾想到的。在他的博客上我看到了好多如同季羨林写在病榻杂记中那些感觉的文章，大多是思考人生和自我的，也有对于病情描述的，但也只是只言片语。临终前几天他写了一篇名为“让暴风雨来的再猛烈些吧”的文章，我想他终究是坚强而又勇敢的。

“昨日此时，星光璀璨，子尤化作星星飞上天空。”这是子尤的母亲在子尤告别人世第二天，在他的博客上写下的。子尤的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或许要继续儿子的思想，用文字传递着儿子的一言一行。

“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这是子尤的临终遗言。读后难免唏嘘慨叹，命运虽不可更改，然仍谓天妒英才。

（责任编辑：崔攀）

# 空谷幽兰


 专栏 / Column

信，  
或不信，  
皆在你自己

——《It's a Wonderful Life》影评

许子兰\*

“上帝啊，上帝啊，万能的天主，我并不常祈祷，如果你听到了我的祈祷，请给我指引一条出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主啊，请指引我一条路……”这绝境求生的声音是如此震撼，如此触动心弦，主人公 George Bailey 眼泪横流，失

魂落魄……

于是他绝望地，想离开这个给他太多束缚的世界。

George 的一生都被贴上了责任的标签，他一直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可每次都无奈地在现实面前妥协。高中毕业追求自己的旅行梦，却因父亲去世，不得不肩负起摇摇欲坠的小公司；将自己的大学学费让给弟弟 Henry，盼望着弟弟学成回来继承家业，等到 Henry 衣锦还乡，责任却又一次使 George 为弟弟的幸福铺路，而将自己的苦闷哽在喉中。“I wan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满怀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只能落寞地顶着责任的重担困在小镇上，心酸地听着高中校友谈论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自卑地看着曾经不如自己的玩伴 Sam，如今在外飞黄腾达，还朝自己心爱的女人调情；弟弟参军并名扬天下，他羡慕的同时又怎能不黯然神伤？他苦心经营着为小镇穷人谋福利的贷款&建筑公司，却因粗心的叔叔将公司 8000 美元现金弄丢，再加上一直视其为眼中钉的大财阀

\* 许子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Potter 的落井下石，公司陷入绝境，George 也面临牢狱之灾。他一直在命运的不公中挣扎着，梦想，他无奈地一次又一次隐忍；家庭，他羞愧于难以提供富足；他痛苦压抑地为别人而活，最后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满含泪水看了又看他的人寿保单，这是他唯一弥补 8000 美元亏空的办法，他决定在平安夜跳河寻短见。

影片虽虚实结合，派天使来解救 George，但并非用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只是借天使的角色向 George 呈现了一种虚拟状态。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在他要自杀的时候，派天使带他进行了奇妙的人生之旅，穿梭到没有他的世界：没有他，他的弟弟在小时候因掉进冰窟窿里没人救而淹死了；没有他，药房的师傅因配错药没有人纠正药方而琅琅入狱；没有他，George 妈妈因身边没有一个儿子而变成了一个苛刻的老太太；没有他，镇上许多穷人因没能住上物美价廉的公寓而饱受牟利商人 Potter 的欺压；没有他，他的妻子 Mary 因没有遇到值得爱的人而变成了一个孤苦古怪的老处女；没有他，小镇尽被势力商人控制，充斥着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他像做了场噩梦似的，没有他的世界原来是如此恐怖悲惨。

George 重回有他的世界时的那份欣喜若狂，是如此感人至深，那种重燃希望的激情，是如此震撼人心。他对他生活的小镇说“Merry Christmas”！对路上的行人说“Merry Christmas”！甚至对妄图置他于死地 Potter 也说“Merry Christmas”！还向在家里等待的检察官和查账员说“Merry Christmas”！他深情地亲吻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并非不知道等待他的仍是牢狱，他的梦想仍然实现不了，然而他却以未有的勇气和信心直面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片子只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罢了，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天使来救你，所以只能是无数个 George 悲惨地自杀了。当然必须承认，我爱这部影片，根本是因为我认同这种真善美、这种好人终归有好报的价值观，我虽不信仰上帝，但我敬畏冥冥之中某种惩恶扬善的力量。这也是我喜欢影片结尾的原因，看似是天使帮助了 George，让小镇上的人慷慨解囊，但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 George 本人种下的善果，是他自己救了自己。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吗？重要的不是天使，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George 体验没有他的世界，这难道不是我们自我反思的过程吗？或者说也可以出现一个恶魔安排不一样的人



生之旅，没有 George 的存在，他的弟弟也被其他人救了而且过的很好，他的妻子嫁给了有钱人生活富裕，药店老板根本没配错药，镇上的穷人虽被大财阀垄断，但他们相安无事、各取所需……我们其实一直在与自己对话，遇到挫折时，你可以灰心沮丧地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但也可以鼓励自己，成功就在不远处召唤。人对于他生活的世界，不只是简单的自我存在，更有他存的意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塑造着一个人的世界观。“Each man's life touches so many other lives. And when he isn't around, he leaves an awful hole.” George 其实一直都不满他的生活，但他一直保持着他那可贵的品质——责任、爱心、信誉、勇气，而且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这种品质有多么可贵，他对于他存在的世界有多么重要。

影片借理想主义的手法，其实

更传达了现实主义的理念。那些能够追求并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是幸运的，但现实中有很多人像 George 一样，只能无奈地放弃自己的梦想，而为各种责任、压力所累，每个人的生命中也都会有无助、彷徨和沮丧的时刻，生活其实并不 Wonderful。但即使自己的梦想无法付诸现实，也不要把那股未得的怨恨倾泻到当下。你可以放手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实在无力实现时，不妨停下来，看看眼下的自己，珍惜所拥有的，更是一种大气与睿智。

其实想想，也真是可怕，人与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不是家世、金钱、地位、相貌，而是你的内心。生活的确不美好，但不相信有美好生活的人，他的世界总有黑暗。

当你看不到人生的色彩时，更要看看这部 1946 年的黑白影片。

（责任编辑：崔攀）



# 笑谈人生

书评：《苦涩的结合：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出离婚戏剧》，[荷]里奥纳德·包乐史著，杨立新、冷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Jacob Coeman 绘制的 Cnoll 一家，左四为 Cornelia

## 两性视角下的巴达维亚

高笑红\*

1998年，包乐史决定将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改写成书。该书一经面世，佳评如潮，并被授予荷兰当年的“金猫头鹰奖”。而

\*高笑红，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促成这一切的，乃是一名女子——作者的研究对象——柯尼莉亚·范·尼恩鲁德。

柯尼莉亚，是一名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与日本艺妓之女，1629年出生于日本平户。父亲去世后，作为“公司的孩子”，她被带到巴达维亚生活。她23岁时嫁给能干的公司高级职员彼得·克诺尔。二十年后丈夫突然暴病离世，她成了寡

妇。第二任丈夫是一名脾气暴躁的荷兰律师约翰·彼特。婚后半年，柯尼莉亚终于无法忍受贪婪而暴虐的另一半，展开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离婚拉锯战。包乐史借由这起法律诉讼案件，考察 17 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地教会以及旧荷属殖民地的法律体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性别、秩序、等级诸类议题。

## 两难的巴达维亚寡妇

“性别”这一议题在当今的东南亚社会仍是意义非常，诸如劳动力结构、家庭生活、社会制度，乃至与跨国人力移动，都绕不开“性别”。Anthony Reid 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1988）第一卷中已清晰地指出，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东南亚妇女在商业交往上具有更多的自由。<sup>①</sup>巴达维亚妇女在财富方面绝不仅限于被动的继承角色，她们还是各种各样商业的积极参加者。她们拥有雄厚的资本，也具备灵活的商业头脑，但殖民地法律却成为她们发展独立经营的最大障碍。

柯尼莉亚并不是圣女贞德式的人物，她仅仅是十七世纪巴达维

亚社会中的一个平凡女子。继承亡夫的巨额遗产后，她开始着手筹划自己的未来生活。同约翰·彼特的结合，与其说是爱情的力量，不如看作是蓬勃的事业心的驱动。她的前夫彼得·克诺尔是巴达维亚城堡的第一大商人，也是地方民团领袖，于是年轻的柯尼莉亚很早就进入这个等级林立的殖民地社会的高层社交圈。豪车宝马、奴仆成群，她在第一段婚姻中享受着倍受尊敬的贵妇生活。然而，富有的巴达维亚寡妇并不能达成，她需要一个合法的、可靠的男性监护人来重新恢复原有的社会地位。根据荷兰的法律，妻子的财产很大程度受到她的丈夫的支配，荷属东印度亦不例外。

婚前，柯尼莉亚要求彼特签署财产协定，并隐瞒自己的财产范围；婚后，她跃跃欲试地以自己的名义对中国商人投资，缔结契约，打理财富。显然，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投机者侵吞她的财产。然而，新配偶坚决不同意她成为一名“公开的女商人”，并开始贪婪地掠夺她的财产。于是家庭战争逐步升级。彼特策动奴隶反对女主人，在朋友面前羞辱她，甚至实施暴力，柯尼莉亚的处境跌落谷底。这不仅意味着柯尼莉亚重回巴达维亚上流社会的美梦落空，也将两人脆弱的婚

<sup>①</sup> [澳]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吴小安、孙来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81—191 页。

姻赤裸裸地曝露在殖民地喧嚣尘上的舆论当中。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财产，柯尼莉亚选择了抗争。

## 混乱的殖民地秩序

以教会强制实行训诫措施形式来进行社会控制，是国内和海外的荷兰社会的一块基石。但是在东印度群岛发展起来的新教教会，并不具有这种权威，总督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自 1609 年后，总督由公司 and 国会派遣，负责东方的经营，代表公司理事会进行统治。在政治上，总督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拥有颁布法令、指挥军队等一切大权。因此，两人的婚姻拉锯战中，宗教式的调解注定失败，而借助于已故丈夫的官员同僚，柯尼莉亚在巴达维亚的抗争暂时处于上风。当时彼特决定把战火引向荷兰本土，利用自己的本土和专业优势，把案件提交荷兰法院审理。这对柯尼莉亚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而宗主国与殖民地在司法权限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变得暧昧不清。在未来的几年中，这段“跨国婚姻”斗争在巴达维亚的公堂和生活中轮番上演，并愈演愈烈，成为一个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于是，殖民地当局最终选择切除这个棘手的恶性肿瘤——遣送回荷兰处理。离开巴达维亚的土地，柯尼莉亚的人生注定以悲剧

收场。

可以看出，17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处于一片混乱当中。殖民地的高压统治和以商业掠夺为目的的粗糙管理，难以建立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此外，私人贸易之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负面影响，亦可窥见一斑。公司原则上严厉禁止私人贸易。如柯尼莉亚的父亲，死后被发现在日本期间积聚了巨额财富，因此被认定是“通过不正当的交易手段或者通过控制非法贸易”而来，公司下令全部拍卖充公。而彼特第一次被召回荷兰受审，也是因为“走私钻石”的罪名。因此在 18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走向没落，除了英国的竞争，及欧洲政治激变等外部因素之余，公司垄断性经营与管理上的不当造成弊端的丛生，职员的贪污、盗窃、走私与行贿屡禁不绝，也加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垮台。

## 小说、传记还是历史著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依据通行的图书分类法，本书的属性被认定为小说、传记类，而非历史著作。或许包乐史本人并不介意自己的作品如何被归置，毕竟那本书仍然可以保留在图书馆的架子上。但这

似乎意味着，一旦采用“说书式”的历史叙事手法，作品的严谨性就必然遭受损害。其实不然，叙事史学的复兴，同样传达历史学家的睿智和见识。很多历史作品发掘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却一味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动辄普适规律，组织晦涩的语言以阐发自己高明的见解，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使得史学越发束之高阁。然而，本书的作者却并不打算浪费这些珍贵的档案，他选择以“戏剧”的形式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将一桩曲折的离婚案件娓娓道来。他发掘利用大量可靠的法律档案、教堂文献、书信，包括日本、旧荷属东印度以及荷兰本土，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在既有材料上进行合理分析和想象，时刻提防过度诠释的危险。而且微观的史学研究，能够细致地刻画人物的生命轨迹及其生活时

代的特征，增添了本书的魅力。

同样，作者并不打算写一部关于柯尼莉亚的生平传记。他试图以一桩保留在尘封的档案中的离婚案件，来透视荷兰的海外商业殖民，荷兰教会在殖民地的作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下的亚洲及亚欧混血妇女的地位。作者也并未对殖民地生活过多地着墨，而是集中展示荷兰人、欧亚混血儿在亚洲的生活图景（然而，欧亚混血家庭的成长背景对于柯尼莉亚而言产生了何种影响，作者并未作出阐述。）长期以来，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焦点一直集中于政治和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十分匮乏。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面向的东南亚社会，不止于香料贸易和瓷器航船，还有鲜活的女子和风云变幻的巴达维亚。

（责任编辑：朱永福）



# 智圆其说

## 读《光与影》<sup>①</sup>之随想



曾乔圆\*

在政治哲学类排得满满的书架前，我一行行扫视着各个书名。“光与影”三个字配着深蓝色背景印入眼帘，光看这名字估计是一本教授摄影技巧方面的书，我习惯性地挑出这个“异类”。整本书拿在

<sup>①</sup> [哈萨克斯坦]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光与影》，弓为东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 曾乔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手里沉甸甸的，硬纸板的封面封底装帧得精美而简洁。略略翻了翻白色的书页，居然密密麻麻爬满了文字，偶尔夹着几页彩色照片，都是各国领导人的合照。再翻到内页，完整的标题呈现了，“光与影——哈萨克斯坦政治家随笔”，作者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我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中亚国家的出版物，于是果断地借下了这本书。

个人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此书作者，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他生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旧都阿拉木图市，1979年至1983年间，在苏联外交部从事苏中关系问题研究；1985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托卡耶夫常驻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可以说，托卡耶夫是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并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从书里作者谦逊的词句中看出来）。1992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他被任命为哈国外交部副部长，两年后升任外交部长，此后领导外交工作直至2007年，本书的故事也便终结于这一年。

接着简要勾画《光与影》一书

的轮廓。此书主要记录了哈萨克斯坦建国与发展的外交历程，但也有不少介绍其他国家政治人物的篇章。首章“总统就职”，通过描写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2006 年就职典礼，回顾了这位资深政治家为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所作的努力，以及如何应对所遭受的怀疑和挑战。下一章题为“三位要人”，介绍了作者在参与外交事务中对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我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以及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个人印象，以及他们的重要活动。第三章“总统外交”描绘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外交人员与世界各国政界要人的交流过程，从而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各方面交流，并获取对这个新独立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第四章“政治家与外交家”可看作国际重要人物的小传集，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新加坡共和国创始人李光耀等国家领袖，以及科林·鲍威尔、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钱其琛等著名外交家。最后一章“政治嬗变”，简要介绍了与哈萨克斯坦有着重要联系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包括由纳扎尔巴耶夫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哈萨克斯坦为发起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哈国国际活动方向之一的欧盟，

最后重申了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及其对现代国际局势的立场。全书页数不多，但内容丰富而生动，一路读来只觉意趣盎然。

正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说，“总统是站在笼子里对人民讲话的”“政治家戴着镣铐跳舞”，政治家和外交官，他们的行为不再是个人的行为，而代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 and 成千上万名对他们寄予厚望的人民；他们一人的成败得失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荣辱存亡。每个人光鲜表面的背后都有难以为人所知的艰难故事，他们的奋斗历程都足够写一部厚厚的历史，而托卡耶夫这部《光与影》则是这一部部人物历史的导读，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为读者蜻蜓点水般描写了一个个鲜活人物与众不同的方面。

恰如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平衡、多边性特点，《光与影》的内容编排也鲜明地体现这一特点。尤其在“政治家与外交官”一章，几乎涵盖了除南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区的著名人物，近至中亚五国各位总统，远至南非总统纳逊尔·曼德拉。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是客观中立的，既没有过分溢美之语，也没有刻意贬损之词，我想即使让作者笔下那些名人自己翻阅此书，也会由衷地喜爱。内容的丰富多边性不仅提高了此书的可读性，更提高了



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的可能性，从而得以将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向外界宣传。

对如笔者一样的外国读者而言，《光与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陌生的新独立之国，在一群如此书作者托卡耶夫般兢兢业业的政治精英的探索和努力之下一步步走向坚强，一步步崛起。这是一部国家成长的奋斗史，它向全世界日益发出她洪亮的声音。由此令人想起中国的对外宣传，也许此书有诸多借鉴之处。

由政治实践者们亲自撰写一些专著或随笔，将其经历过的国际事件、所接触的国际要人用自己的视角阐述出来，形成文字，对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学习者、研究者来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阅读、研究材料。如果将专著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就成为向外宣传我国政策的一项十分有效的、容易被人接受认

可的工具。比起耗费巨资拍摄一部短短十几分钟的宣传片，出版十几万册书籍的费用就低得多了，效果却更持久深刻。另一方面，也向外界展示了我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对提高我国的国家形象事半功倍。

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角度来说，多多阅读这一类政治家的随笔或专著，对我们扩大眼界、新增学术思考角度，甚至提高职业素养，都大有裨益。在此补充一句，《光与影》中作者用了不少笔墨教导青年人如何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以及如何在各种不同场合坚持立场、维护国家形象而又不损害对他人的尊重。因此，《光与影》又是一部外交职业辅导书。倘若我们读过多本这一类的读物，就能发现指导性是这类作品的共同点，读者自己可随喜好各取所需。

（责任编辑：武亚宁）





## 院系来音

## 第二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专题报道

2012年7月5日至10日，为期一周的第二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在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举行，主办方是该校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我院师生共15人赴莫斯科参加了本届暑期学校的活动，包括冯绍雷院长、余南平老师和杨成老师。此外，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三位研究生和博士生也一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5号上午，中方成员按时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下午在俄方人员的带领下游览了莫斯科城。6号上午举行开幕式，我院冯绍雷院长、国立高等经济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 S. Karaganov 院长以及国际发展办公室主任 M. Batalina 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当天下午暑期学校的课程正式开始，第一堂课由俄方的 Sergei Karaganov 教授主讲，主题是“在当代世界的‘实力’”；接着是中俄学生旁听“瓦尔代论坛”的辩论会，以“是迈向大洋还是走俄罗斯新全球化道路”为主题；随后冯绍雷院长为学员们讲授了一堂精彩的课程。

7号白天共进行了三堂专题课程,分别是 Natividad Fern ández Sola 教授讲授的“在全球挑战面前的欧盟与俄罗斯”、余南平教授的“21 世纪的资源与战略——基于中国发展的分析”、Oleg Barabanov 教授的“俄中合作”。当天晚上,举行了欢乐隆重的“俄罗斯文化之夜”,既缓解了课程学习的紧张气氛,又开阔了中方师生们的眼界。

8号上午,俄方邀请到俄罗斯新闻社国际项目与政治评论部主任 Pavel Andreev 为学员们做了主题为“媒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专题演讲。下午主办方组织中国学生游览了莫斯科城市风景名胜,学生们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俄罗斯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气息。

9号白天恢复了紧凑的课程学习,先后有 Timofei Bordachev 教授的“俄中的亚太地区战略”、杨成副教授的“从中国的视角看中俄油气资源合作中的风险管理”、以及 Tatiyana Mitrova 教授的“21 世纪的能源”三节课。晚上8点,俄方安排了由中方成员展示才艺的“中国文化之夜”,学员们表演了民族服装秀等具有中国风味的精彩节目。

10号上午,本期暑期学校的最后一堂课由 Dmitriy Suslov 教授主讲,题目为“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对俄中关系的暗示”。随后是暑期学校的结业和闭幕仪式,学员们以课题展示的方式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和深化。

11号,全体中方成员离开俄罗斯回到中国。至目前为止,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和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联合举办的暑期学校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双方都将努力把它继续办下去,从而为中俄学生学术思想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此次中俄暑期学校也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下是部分学员的活动感言。



# “俄罗斯之行”感言

## 俄罗斯之行的不同篇章

李沛\*

**触摸篇** 一望无际的树木、平原，点缀着少许建筑——我用眼睛触到了莫斯科！经过繁琐的手续，从谢列梅捷沃机场出来——我用脚触到了俄罗斯这片土地！见到等候多时的 Michail，与他热情握手——我用手触到了俄罗斯人民！……初到莫斯科，在触摸之中，一切都如此美好！

**知识篇** 在暑期学校收获最大的就是知识。这里有世界顶尖的俄罗斯问题专家，那些以前只是“传说中”的专家，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给我上课！他们的每场讲座都十分精彩，每场都提供新的知识、新的见解！“瓦尔代论坛”的辩论会，尤其令我激动，不同专家的见解使我增加了新知！此外，与俄罗斯同学的交流也获得了新的知识——他们对于中俄学生共同探讨的话题的见解和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

**文化篇** 在俄罗斯，每一方土地都饱含俄罗斯文化！阿尔巴特大街上，普希金故居和雕塑令人神往；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塑让我不敢相信我真在他面前；克里姆林宫威严地矗立着，让我激动不已；

莫斯科的地铁站，就如艺术殿堂般让人着迷！甚至，莫斯科的普通民居也会雕刻上精致的图案，让人看到文化的积淀……一切的文化都是这样的深厚！



莫斯科之行，另一项重要收获是友谊。一同前往的中国学生，在前期准备过程中通过频繁接触和密切交流，大家由陌生走向熟识。同时，俄方学生的热情和专业也使我们难以忘怀，短短一星期的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间的友情。

我满怀憧憬和期望，和着如7月火红的太阳般的热情，进入俄罗斯这个充满吸引力的国度；然后，带着新知识、新文化和中俄友谊，离开了莫

\* 李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斯科。花会凋谢，燕会飞走，杨柳会枯萎，就像我们一样，匆匆走来，又匆匆离去。但是，花儿还会再开，燕子还会再来，杨柳还会再绿，每每想起俄罗斯的这段日子，一切美好的回忆还会再来，就犹如昨日那般清晰……

## 感悟俄罗斯之行

许善品\*

七月五日早晨，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莫斯科凉爽宜人的气候一扫旅途疲劳。一位朝鲜裔留学生在机场等候，我们倍感温暖。当天下午俄方就安排我们游览莫斯科城，并向我们详细地讲解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在莫斯科街头，我们都被浓郁的异国风情吸引，为深邃的俄罗斯文化所折服。这里生活着不同肤色的民族，装束各异，语言不通，顿时感觉到俄罗斯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这种民族特性一方面给俄罗斯带来了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和人文风情，另一方面为俄罗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制造了难题。



暑期学校的课程主要由中俄双方知名教授的讲座和中俄学生的 Workshop 组成。教授们都进行了精心准备，所授课程极具理论深度和前瞻性，中俄双方学员们与教授通过问答进行了充分互动。在学生的 Workshop 讨论中，我们被分成五组，分别选定题目 make presentation，大家选择了中俄双方共同关心的如全球金融危机、中俄能源合作、软实力等议题，并进行了友好而又激烈的讨论。俄方学生的英语十分流利，后来得知他们在日常授课中都采用英语教学，而且大部分学生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还具备十分专业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模型。俄方学生很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中国势必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也认为中俄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合作，相信中国的发展将给俄罗斯带来机遇。

暑期学校的最后两天分别举行了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夜，我们从活动中感受到，俄罗斯民族热情奔放和勇敢无畏的精神特质中隐含着忧郁、伤感而又坚强的基调。最后一天在观赏俄罗斯画廊时，我们被精美而寓意深刻的油画所震撼的同时，也领略到俄罗斯民族由于遭受深重苦难而形成

\* 许善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的勇敢、自由的民族精神和强调受难意识的宗教情怀。

## “痛”并快乐着——记莫斯科暑期游学

程艳阳\*

在经历了近 10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我带着雀跃的心情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其实，过度兴奋的我早在飞机降落前的一个小时就已默默挪到了一个靠窗的空位上，想要早些看见这片憧憬已久的土地。伴着初升的朝阳，透过厚厚的云层，目所能及之处尽是无垠的森林和山脉，其中稀疏散落着一片片村庄，一如书中所述的广袤富饶。于是，“好多树”就成了我对俄罗斯最直观的印象。



地处高纬度地区的缘故，莫斯科的白天显得特漫长，夜里 10 点多钟返回宿舍时总会给人一种刚刚黄昏的错觉。十二车道的超宽马路、沿路古旧的苏式建筑、气势恢宏的红场与各式教堂、美味的草莓汁 Kavac 和红菜汤……第一天的行程就在大家对莫斯科建筑的惊叹和对俄罗斯食物的新奇中悄然而过。

此次暑期学校的日程被安排地丰富而充实！除常规讲座和中俄文化之夜以外，高等经济研究院的老师们还为大家开辟了小组讨论环节，每天一次的小组讨论不仅让双方学员对彼此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有了深入了解，同时也让组员们从完全陌生到彼此熟悉。

暑期学校的“痛”纯粹来自这几天发生的一连串小插曲。或许是因为时差、水土不服及对食物的不适应，再加上连续几天的疲劳作战，代表团里陆续出现了若干病号。团长李沛洗冷水澡受了凉，何文婕肠胃不适大吐了一场，朱玉冰好几天断断续续发烧，活泼爱闹的个性全然不见了；子兰也因过度疲劳而生病，一张小脸烧成了两片高原红；自诩精力充沛的我也难逃“噩运”，在睡眠不足和迷路司机兜兜转转一个小时的双重折磨下光荣地吐了。幸好这一切都在返程之前被统统丢在了莫斯科。

在这短暂的一周里，我收获了许多美好印象。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人”是旅途中最最重要的因素，你所熟知的人会赋予一座城市不一样的意义，

\* 程艳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也会令你对这座城市怀揣着有别于人的情感。莫斯科,因为有了 Kate, Julia, Misha, Alena……这些高等经济研究院的朋友而变得独一无二。与他们的相处让我不止是走马观花地领略莫斯科的美好,还更深入地了解了莫斯科人的想法。他们对普京的争论、对俄罗斯政治的看法、对中俄关系的见地、对自身欧亚归属的定位……都以最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临行前 Kate 不舍的眼泪更让我对这座城市多了一份留恋!

最后,我想说的是,也许是受我的研究方向——俄罗斯研究——的影响,对于这个国家,我的内心总有一种外人无法体会的莫名情感。于我而言,俄罗斯仿佛远方一位素未谋面的老友。而这次的暑期游学活动终于圆了我的老友梦。我心底那份小小的俄罗斯情结啊,你定会在我今后的生活里弥散,久久不去……

## 莫斯科杂忆之吃

朱玉冰\*

首先非常感谢学院给我们提供这样宝贵的机会赴莫斯科参加国立高等经济研究院的暑期学校。在上海三十六度高温的七月五日,我们一行人从炼狱跑到了天堂般的莫斯科——只有二十来度。透过窗玻璃俯瞰莫斯科,机翼之下一片郁郁葱葱,完全不同于从飞机上俯瞰北京、上海或者纽约的感觉。绿色,童话般地蔓延开来,配合疏朗的天空和稀稀落落的小房子,难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此迷人。

第一天我们就被带到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的 mymy 餐馆吃饭。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像草莓汁一样的果汁,味道真是摄人心魄的好啊!之后陆续喝了很多次,味道甜蜜到让人恨不得淹死在里面,配合周董的那首《甜甜的》,脑补一下吧。仅有一次在俄罗斯的跳蚤市场里喝到的这种果汁,虽然颜色相似但比较酸。经过我事后详细地考证,比较有可能是马林果汁。马林果就是名曲《红莓花儿开》中所唱的红莓花!在照片里,红莓花泡到饮料里之后,看起来挺像草莓。

阿尔巴特大街是充满文艺气息的商业步行街,画摊在街上随处可见,酒吧和餐馆也很多,工艺品商店更是琳琅满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店铺里的套娃,做工非常精美,令人称叹。纪念俄罗斯摇滚天才维克多的涂鸦墙和普希金故居都位于这条大街上,故居门口还有一个帅气的俄罗斯小

\* 朱玉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伙在弹吉他。



(左上角就是红菜沙拉啦，右上角是最爱的果汁，左下角是罗宋汤，中间是鱼，右下角是牛肉)

为期一周的暑期学校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教授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为了结业前的大 Presentation 与对方院校的同学一起进行了紧张激烈的分组讨论。这里我又要讲到吃了。我们用餐时间如下：早饭 9 点或 9 点半，午饭下午 2 点，晚饭晚上 7 点。每天都有两次 coffee break，分别在十二点（没错，十二点是 coffee break）和下午 4 点，但 coffee break 不是只有 coffee 和茶，还有各种俄罗斯特色小吃。这些小吃，可说就是伪装成面包的包子，外表类似面包，里面包着肉或蔬菜。对于大部分发扬“酒精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品格的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下的同学，我真心佩服！而我自己，在一天五顿饭的持续轰炸下，终于倒下了。莫斯科七月初的气候依然非常宜人，只是早晚温差较大，尤其因为莫斯科已经有点极昼现象了，晚上十一点才濛濛天黑。不少同学由于一时难以适应气候和饮食而生了病，鄙人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错过了不少的活动，甚为遗憾。在此提醒明年将赴莫斯科的同学们，千万要注意身体。

说了这么多好像都是关于吃，其实莫斯科那些举世闻名的景点自不待言，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莫斯科“艺术殿堂”般的地铁站等等，就留待大家自己去感受啦。

## 2012年第三届两岸青年学术交流论坛纪实

2012年6月28日，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学术交流论坛在我院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未来的两岸关系”，由我院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与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共同主办，两所共13位学生做了专题发言，我院包承柯教授、淡大潘锡堂教授在场聆听学生发言并作点评，我校校长助理郭为禄教授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交流共分经济、文化、政治三个主题。



### 主题一 未来的两岸经济关系

#### 朱天豪（淡大）：从台湾金融特色中谈与大陆的互惠合作



2010年签订ECFA之后，两岸经济交流正式从货物贸易深化至服务业贸易。但目前两岸银行对外资仍存在各种限制条件，比如中国大陆对外资银行类型、设立分行资格、业务内容等方面作出了细致严格的规定。台湾银行也在努力发展两岸特色金融，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承作人民币业务的范围、允许大陆政府发行的多样化金融商品及特定授信担保品、辅导建立两岸网路交流平台。但台湾需跳出“台湾本位”思维，从两岸双赢的大格局出发，主动与大陆协商金



融分工；“两岸特色”不能排除国际经验，两岸应携手加速国际化，大陆可借鉴台湾金融在自由化与在地化方面的经验。

### 朱永福：后 ECFA 时代陆资入台的现状、障碍与前景展望

2012 年 5 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台湾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第六位跌落到第七位；与“亚洲四小龙”其他各国相比，台湾贸易总额位列末位。在此背景下，台湾开放陆资入台既是其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步，也是消除违背 WTO 规范的歧视性大陆经贸政策的要求。从 1979 年至今，台湾当局对陆资入台政策经历了禁止、松绑到真正实施三个阶段。目前陆资对台投资规模小、发展缓慢、投资结构层次较低、行业分布不均，这源于陆资入台目前存在如下主要障碍和挑战：对台投资的主体及领域仍受较多的限制，双方未签署相关的投资保障协议因而缺乏法律层面的保障，配套措施不完善。关于后 ECFA 时代陆资入台的前景展望，两岸应以政治互信推动经济互信，并把握 ECFA 签订契机及早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最终实现两岸双向投资有序、全面、健康发展。



### 曾庆钧（淡大）：台湾农业——文心兰产销概况

台湾从传统的农业渐渐转入具有附加价值的新型农业，通过人文与科技相结合，创造了不同以往的价值。

1996 年被台湾从亚热带美洲引进文心兰栽培，2002 年起便成为台湾外销量最大的切花。在文心兰的推广和行销方面，已利用整合机制建立了整体台湾文心兰 CIS 识别系统，日本是最大的对外市场，其次是中国大陆、中东、澳洲和韩国。在日本，利用整合机制打通其市场从而稳定供货市场，并以“蓝海策略”导入创造新特色；同时配合花展将新品种介绍给消费者并推广新用途。在大陆市场，强调台湾文心兰的高质量，创造文心兰使用上的定位，寻求台湾特色推广，同样以“蓝海策略”导入创造新特色。



### 宋平：两岸经济合作的特征和效应



通过对两岸经济的量化分析显示，随着两岸间以投资、贸易为纽带而形成的密切经贸往来，台商投资、两岸贸易与两岸经济发展有较高的正相关，使得两岸之间开始呈现协同趋势，事实上进入到功能性合作形态的发展阶段。对两岸经济合作的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两岸经贸交往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逐步形成了良性密切的互动关系，两岸经济上互补互利、合作双赢的合作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现阶段，两岸经济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虽然还有诸多的问题与障碍存在，但机遇大于挑战，两岸经济机制化合作的趋势势不可挡。

## 主题二 未来的两岸文化关系

### 武亚宁：两岸电视开放状况分析

台湾电视节目在大陆接收与放映还处于零起步阶段，但台湾综艺节目在网络平台上被广泛开放与大量传播，主要在于它的娱乐化及未涉及政治的非话题敏感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大陆相关方面的默许；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及各省级电台陆续引进了多部台湾本土剧并大受追捧。在台湾播放的大陆历史古装剧、宫廷剧及金庸剧很受民众追捧，但抗日题材或国共时期战争军团片、反映大陆生活现实的现代剧及偶像剧则反应平平。两岸之间出现这种电视剧集一定程度开放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全球性信息交流扩大的趋势是最根本的动力，大陆对两岸文化交流持积极支持态度，台湾方面无法阻挡民间的交流愿望。



### 吴途勇：历史与政治中的台湾两岸文教交流审查机制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对立的政治生态格局使得台湾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大陆的自我保护制度体系，这套体系在文教领域就是审查机制，主要表现在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行。审查规定具体细致，对出版品、电影片、录影节目、广播电视节目的审查重点对象是宣扬共产主义或从事统战、凸显中共标志

者。然而台湾社会内部在文教管制方面则较为宽松，一般强调不危害公共安全。台湾当局这套两岸交流文教审查机制，从外在形态上似乎与台湾作为一个建立宪政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国不相称，但当将其放入到海峡两岸政治格局及其形成的特殊历史与现实背景就可以理解。但这种审查机制并非不可放开，台湾在放宽审查制度方面可有更多作为。

### 黄泓睿（淡大）：台湾流行音乐对大陆之影响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曲飘过海峡在大陆迅速流行；80 年代前半期，以罗大佑等校园民歌为代表的流行歌曲传进大陆并深受欢迎；1984 年起，台湾歌手亮相大陆春晚舞台，对于传播台湾流行文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多台湾音乐在春晚首唱后迅速广为流行。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台湾唱片市场急剧衰退，于是台湾歌手近几年积极在中国大陆举行商演、演唱会及代言。台湾流行乐在中国大陆的未来，应该会持续扮演华语流行乐重镇。用台湾的创意制作音乐然后再销往国际市场，已成为台湾各唱片公司对未来的期许。



### 周生升：走出城邦——从两岸交流史说起



本次发言主要从两岸关系史出发，以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海洋中国与陆地中国（或黄土中国）两个角度来浅析中国人的城邦问题。从法理上讨论的话，两岸问题永远谈不下去，这就是政治中国，我们永远在用政治说话。但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用中文交流，这就是涵盖政治之上的“文化中国”。从“中国认同”本身来看，先秦时代是华人形成之根源，夏夷之变——即谁是中国人的问题——在当时就根本不存在于政治层面，而是文化，更确切说是“礼文化”之中，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应该占主流趋势。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海洋传统，虽长期受“黄土文明”压抑，但其在民间却生生不息。台湾作为海洋中国的一部分对陆地中国是叛逆的，主要体现在海贼、对外贸易以及移民现象上。台湾移民又具其特殊性，相比较东南亚移民拥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不受“弃民”观念的

影响；南洋表现出陆海中国完全对立、不同，台湾则体现了海洋中国与陆地中国一定程度的融合。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绝不应该是领土统一问题，更是关乎整个华夏民族精神内核之传承，中国城邦达于四海的问题。依靠某些说法或某些法理来界定两岸问题，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需要 we 们站在五千年华夏历史的根基上，用大智慧去解决。

### 主题三 未来的两岸政治关系

#### 周婉瑜（淡大）：九二共识下两岸和平之展望



两岸关系在恢复交流二十余年来，可说是大起大落又大起。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提出“两国论”，陈水扁时采取的“四‘不’一‘没有’”及后来的“一边一国”论。中国大陆因此认为台湾在搞“台独分裂运动”，并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来压制“台独势力”。近十年，两岸关系则呈现一种“政冷经热”的怪异现象，直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马“总统”把“九二共识”作为重启两岸协商对话的前提。“九二共识”一词是由2000年时任陆委会主委苏起创造，他忧虑两岸前景，希望创造某些模糊概念，使两岸既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得到解套，又能涵盖两岸各党主张。此后两岸经贸、文教人员交流、两会制度化协商，都因有“九二共识”的存在才得以开展。

“九二共识”核心在于“一个中国”原则内涵的各自表达，虽然两岸对“中国”的定义不一样，但对于“一个中国”有最大公约数坐下来和谈协商，这就使双方能够互相了解、减少分歧。

#### 孟维瞻：2012年中国大陆政局的变化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2012年中国大陆与台湾政治有个共同点：都要经过换届。日前台湾大选已结束，马英九连任，而十月份即将召开中共“十八大”。从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角度来分析，两岸的政治关系变化“短期看台湾、长期看大陆”。因为大陆的政策变化非常大，在短期内无法对两岸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对台湾而言，短期内的变化就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而马英九的胜出可说是其两岸政策的胜出，马英九当



选有利于两岸关系，减少了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

但两岸关系发展将遇到的挑战也不能忽视，包括蓝绿关系的缩小、台湾经济的不乐观、以及美国的战略调整。为了实现维护两岸和平、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愿景，大陆与台湾各有责任，仅靠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整体尊严，更多的是台湾人的责任，而扩大民主权利、保障民主人权是大陆方面的责任，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应该少一点指责，多一点反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防止两岸关系的倒退。两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多多相互听取对方的意见，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不无裨益。

### 李洋：九二共识刍议



最早提出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官方文件应是1979年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而不久后的1987年，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以及台商赴大陆投资兴业。两岸的和平发展与大陆文革结束、台湾解严在时间、逻辑上联系紧密。两岸类官方性质的接触与商谈在1991年第一次出现，即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对大陆的访问。1992年8月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所谓“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政策性文件。

经过一系列的相互沟通，确定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石地位。多年来，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确立了基本的政治互信，从而有了台海的和平安宁、两岸外交休兵、实现三通、签署了ECFA，并促使双方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证了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也才有了两岸合作共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局面。

“九二共识”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共识。

## 第12届“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对话举行

5月30日—31日，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太平洋论坛（CSIS-Pacific Forum）以及美国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共同举办的第12届“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对话在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领域的各个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中美关系与地区安全对话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太平洋论坛合作举办，开始于1999年，迄今已经举办了12届。该对话轮流在上海和夏威夷两地举行，是目前美国研究中心唯一定期举行的中美对话项目。

（摘自中国亚太研究网）

## 第三届国际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

第三届国际投资论坛6月3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来自国内产官学界的百余位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围绕“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与培育：理论、环境与模式”这一主题展开。与会嘉宾就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业的跨国经营战略、中国跨国公司的特征分析、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等话题作了论述和讲演，分析了在全球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来自企业的代表们介绍了所在公司在海外投资和运营中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克服困难与当地政府和国民建立友谊，取得互信，文化融合等方面举出了具体事例。

（摘自中国亚太研究网）

## 首届年度论坛“亚洲—全球对话（深圳）2012”召开

6月2日，首届年度论坛“亚洲—全球对话2012”深圳会场会议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主题为“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再定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各大银行行长、顶尖商学院院长与教授参加论坛。

“亚洲—全球对话2012”深圳分论坛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经纶

国际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该活动提供了一个全球性平台，让首席执行官、企业家、金融家、决策者和民间社会领袖能就最重大的全球性议题展开对话，讨论这些问题对商业、全球经济和亚洲的影响。

（摘自中国亚太研究网）

### “全球挑战与亚太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6月3日，“全球挑战与亚太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召开。与会代表就“全球面临的挑战与国际体系建构”、“大选年与大国关系”和“亚太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摘自中国亚太研究网）

###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举行

6月30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在国际关系学院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就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影响、亚太地区利益重组与秩序重建、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与对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探讨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来自各高校、研究机构和媒体的近百余人参加会议。

（摘自中国亚太研究网）

### 第二次南海安全战略与强化海洋行政管理研讨会召开

7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海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次“南海安全战略与强化海洋行政管理研讨会”在海南召开，来自全国研究南海问题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对南海主权的维护策略、南海安全战略构建与对策、整合与优化我国南海管理职能的策略、强化南海行政管理的对策、南海能源开发与周边国家关系、南海非传统安全与区域合作、南海历史主权与传统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摘自中国亚太研究网）

### “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2012”学术研讨会召开

5月19日至20日，由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组委会主办的“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2012”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是自

2009年论坛组委会创始以来的第三届会议，以促进北京地区各高校及科研机构政治学领域青年学者的交流与切磋、推动政治学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进步为宗旨，此次论坛有60多位青年学者参会。共分为“政制与革命”、“共和与帝国”、“发展与治理”、“危机与民主”以及“政治学：基础研究与现实关怀”五个主题单元。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 第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圆满结束

世界和平论坛是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此次论坛于2012年7月7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各方共赢：和平、安全、合作”，共有7名外国前政要、来自19个国家的22名外国智库、34名中国智库、三十七个国家共37名驻华使馆大使和代表、三个国家共20名观察员以及外交部、教育部等多位国家部门的领导出席了会议。

论坛主题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安全合作方向、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就世界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国际经济危机中的国际安全合作、宗教与政治改革的国际安全影响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并提出了新的概念、观点和建议。

（摘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网站）

###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全球战略”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全球战略”学术研讨会于6月27日下午在上外虹口校区召开。

研讨会共设“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国际战略”两个主题单元。复旦大学的苏长和教授、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吴寄南教授、同济大学的仇华飞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

（摘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责任编辑：曾乔圆）





# 征稿启事

这是一份学生刊物，  
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我们相信：与天下才俊共闻天下之达道，  
相互切磋、互相发明，已是世间最大的快事。

这是一份学生刊物，  
没有太多的现实功利。我们深知：象牙塔乃真理的永恒故乡，  
与真理为友，学无止境、止于至善，正是学者固有的天职。

这是一份学术思想刊物。

“思想无禁区，学术有真知”，是我们的执着追求。

我们知道，真正深邃的思想与艰深的学术背后，  
无不挺立着强健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或许还有高贵的灵魂和卓绝的胆识。

《闻道》属于年轻人，属于与你我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怀揣梦想，勇于创新，他们嘲笑对过去的迷恋，  
蔑视陈规，反对纠结于历史——因为，未来注定属于他们！

所以我们向你——我们亲爱的朋友，征稿。

我们恳请你惠赐佳作，我们需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我们需要你敏锐的思想与激昂的豪情。

冷静艰深如学术论文，热情饱满如诗歌散文，

快意哭笑如思想、情感杂论……好文、妙文、怪文、奇文，皆受欢迎，

总之我们鼓励学术思想争论，鼓励批判性思考，鼓励心灵情感独白。

当然，对于来稿，我们不得不有所筛选，但我们保证，会认真对待每一篇稿子，

会尊重每一位朋友的文字、思想与情感。


对于学术文章，我们强调严格的学术规范。

若来稿得到采用，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酬劳。

朋友们，请与我们结伴而行！

来稿请发送至：[gwendao@gmail.com](mailto:gwendao@gmail.com)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